

2016年第3期
总第3期

热风学术

网刊 3

专题 _ 作为文化政治的生态议题

陈义媛 严海蓉 陈航英 _ 农民、政府、市场与种子

夏永红 _ 生态文明：一种自治主义进路？

孙佳山 _ 最激进的“保守形态”

沈光铨 _ 试论20世纪革命变奏法节奏分析

吕正惠 _ 大陆版《无悔》后记

蓝博洲 _ “失败者”的战斗与胜利





您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登陆网站阅读本期杂志。

热风学术网刊

主 编 _ 倪 伟 郭春林

学术编委 _ 按姓氏拼音排序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韩国) 滕 威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蔡 博 **编辑助理** _ 徐慧冰 **美术设计** _ toybook studio

编辑部邮箱 _ refengxueshu2016@foxmail.com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 All Rights Reserved

专题

作为文化政治的生态议题



toybook 制图

编者按 _ 在当今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化政治图谱当中，有关生态和环保的各类话语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生态与环保的相关议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太过庞杂，而且牵涉到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所以注定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话题。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而且掌握话语权的阶层也都在利用各种舆论平台表达着自己强烈的环境权利诉求，但稍有理智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些话语目前大多还处在众声喧哗的情绪表达阶段。实际上，生态环保问题不但涉及到全球经济生产结构、可持续经济转型、工业化农业、生物科技等等制约中国环境问题的全球结构因素，而且涉及到中国特有的阶层政治、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公民责任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在地化的因素。由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和纵横建构起来的生态环保话语光谱，呈现出隐显明暗多重闪烁、层层遮蔽的复杂色彩，因此，对这些混杂的话语型构进行政治语境的解读，并对其进行富有说服力的重新接合，就成了摆在中国文化研究界面前的重要任务。本期《热风学术》网刊所刊载的这三篇讨论生态问题和生态话语的文章，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接近这一问题的学术尝试。

陈义媛、严海蓉、陈航英合写的《农民、政府、市场与种子：五省玉米产区的调研发现》一文，看似没有直接谈及生态问题，但实际上从玉米种子的调查入手，直接论及到生物科技、全球资本、政府法规与农业生态之间的复杂联系。从作者们辛辛苦苦调查的数据来看，我国玉米种植户的自留种比例现在仅为1%，玉米种子已经高度市场化，呈现出由大品牌主导的特征，而且种子的成本也因此不断上升而并未下降。文章发现，在国家的《种子法》颁布以后，种子日益走向市场化、企业化，而政府在种子生产、经营监管方面的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弱化，认为这种趋势非常不利于地方政府种子管理站对种子生产过程的监管，导致无法明确追究责任的危险。本篇文章由于主要关注于农业未来走向和农民的长远利益问题，还没有对目前的各种育种、营销和控制种子的国际市场模式（如以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转基因技术）以及这种模式潜藏的人类生态危机进行论述。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认识到，种子问题绝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生物科技问题，或者被简单视为国家粮食主权和粮食安全问题。农业作为最重要的生态产业，决不是生物科技所能承载的，它还涉及到人们对于国际政治、全球资本、生物科技与农业的关联性等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警示：草率的政府决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强势研发营销，很可能对农民和农业带来严酷的威胁，甚至最终很可能导致物种多样性消失这一重大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与种子相关的话题本身也是生态议题，我们期待随后还会有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更多更全面的讨论。

夏永红的《生态文明：一种自治主义进路》考察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中国当代被赋予意义的情况，认为应该抛弃那种将生态文明视为实现现代化文明阶段的那种“去政治化”的倾向。作者希望我们能多多关注这一概念的反现代主义内涵，关注其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工具理性的批判意涵。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更多地去关注生态话语背后的政治关切，关注各种关于环境问题根源的解释以及各种试图解决环境问题的构想所隐藏的政治立场和内在局限问题。作者对从各种角度（制度主义、技术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而提出的解释进行了梳理，突出强调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共享性与原子化个人主义个体设定之间的矛盾，强调了全球资本流动对于在地社群的掠夺问题。文章明确指出，环境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地域性的，但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却是跨地域的，是全球资本流动及产业转移的问题。因此，

作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困境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关涉到我们对社会的总体筹划。因此，我们更愿意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与现存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观察国内有关环境保护的传媒舆论和争论不无参考价值。柴静导演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曾经风靡一时，三天之内被看2亿人次，环保部都发短信向她致敬。一时间，那些身处首都高楼里的中产阶级都无比激愤地谴责北京周边省份的冒烟工厂，于是乎，强大的舆论迫使环保部在几个月之内约谈了好几个城市的一把手，并且很快强制性地关闭了许多家工厂，最终导致大批底层劳工失业。与此同时，这些中产阶级的维权勇士们自己却依然要求享受驾小车上上班和低价石油，并不断要求政府提供清洁空气和水资源……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各个阶层是如何看待环境问题了。

孙佳山的《最激进的“保守”形态——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起源、功能和困境》回顾了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起源，发现这些貌似严肃探讨环境问题的影片中那种看似“政治正确”的普遍话语其实隐含着一种移置和遮蔽人类现实处境的功能，并由此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生态话语自身存在的结构性困境。这套话语将生态灾难归因于人类相对于自然的“原罪”，召唤所谓“原初”的自然和前现代的“美丽”乡愁，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二元对立，将地球毁灭当作“激进的想象”，试图以此惊醒世人。文章指出，这种用现代光影科技辅助建立起来的生态话语模式，其实是大量被新自由主义话语所构建和包裹的中产阶级主体所支撑起来的一种对于生态灾难的虚幻无力的批判。这套生态话语看似“激进”，但由于缺乏对全球资本主义现实运作以及国家、阶级、种族等因素对于环境恶化所承载的复杂责任，尤其缺乏对中产阶级自身消费趣味的勇敢批判，其实相当保守，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制约想象力的“穹顶”！作者不无反讽的说，“对当下的中产阶级趣味群体来说，想象地球的毁灭远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

作为一个矢志不移参与民间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将近20年的普通人，在读完这三篇文章之后，我打算重新思考环保话语的泛滥与中产阶级话语权的内在关联。我们需要警惕现代传媒话语对于普通公众环保认知水准的巨大操控作用，让民众真正理解环保难题的复杂矛盾，并能自觉地为缓解生态问题做出身体力行的努力。✂

农民、政府、市场与种子： 五省玉米产区的调研发现 *

陈义媛 严海蓉 陈航英 **

摘要 _ 当前中国农业的变革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许多地区农业作物种类和种植结构正在转变。在种业市场化背景下，自留种的农户还有多少？国内的种子市场是否存在品牌垄断的趋势？农户对所购买的种子及种子的未来如何看待？种子作为农业的根本，政府在种子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以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为例，以 5 个玉米生产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解析了种业市场结构以及农民与种子的关系，同时回溯了政府在种子生产和经营中管理责任的变迁。本文发现，玉米种植户的自留种比例仅 1%，玉米种子已经高度市场化，且种子市场呈现出大品牌主导的特征，种子成本不断上升；此外，《种子法》颁布以后，种子走向市场化、企业化，政府在种子生产、经营监管方面的能力有明显的弱化，不利于地方政府种子管理站对种子的监管。本文据此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倡导。

关键词 _ 玉米种子；市场结构；品牌主导；政府监管

* 本研究受乐施会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CHN-A0594-01-1414A-S，项目名称：生计与农业可持续性：农户与种子的调研。感谢阮池银、杨光华、汪丽君、褚贤祥等所有参加问卷调查的人员，黄瑜、张慧鹏、阮池银贡献了云南和广东种子站的访谈资料，郭琳参与了河北种子管理站的访谈，龚为刚在数据分析中给予了大量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 陈义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陈航英，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一、导言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当前中国农业的变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农业和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体现在农户与种子的关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目前中国种业本身正在经受新一轮的市场整合，包括中外种业巨头的强强联合、种业公司之间的收购和兼并。农业的市场化、种子的商品化对于农户是否留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已有关于种业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种业市场的发展以及外资在其中的作用。比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已占领中国蔬菜、花卉种子市场的半壁江山。外资种业公司最早进军的是中国的蔬菜和花卉种子市场。国外公司或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或采取设立办事处或实验站的方式研究中国种子市场，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外资种业公司已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及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且这些企业往往掌握着种子生产的核心技术和专利（赵刚、林源园，2009；邵长勇、唐欣等，2010）。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几大跨国种业巨头控制了世界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这些种子通常与特定的化肥、农药搭配销售，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公司的强烈依赖（尹成杰，2009）。这种竞争给本土的种业公司带来压力。本土种业开始谋求和外资的联合或者成为其代理。

相比较而言，中国种业则面临困境。从世界市场的占有额来看，世界前 10 强的种业企业在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而我国前 10 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世界种子市场销售额的不到 1%（赵刚、林源园，2009）。跨国种业公司通常会认真研究本土的种业市场、销售网络、选择适宜的本地合作伙伴，形成整条商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因此，中国种子企业面临的不只是单个的跨国种业公司，而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化产业链条（佟屏亚，2003）。对于中国种业的问题，有研究指出，政府研究机构主导的以商业化为目的的育种方式、种子企业准入门槛过低、种子监管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是我国种子产业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源（黄季焜、徐志刚等，2010）。

上述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国目前的种业市场状况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国种

业的发展分析多集中在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方面，对于主粮的种子市场状况分析并不太多；此外，对中国种业的关注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在种业市场化背景下，自留种的农户还有多少？国内的种子市场是否存在品牌垄断的趋势？农户对所购买的种子及种子的未来如何看待？种子作为农业的根本，政府在种子管理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本研究将以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品种——玉米种植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户、地方政府与玉米种子市场的关系分析，反应玉米种业状况以及政府监管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在吉林、河北、甘肃、贵州、广西等 5 个玉米主产省区分别抽取了一个县，并在 5 个县城分别抽取了一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完成至少 50 份农户调查问卷，集中在邻近的两到三个村庄完成。农户访谈采取半结构式问卷进行，共收回 258 份问卷，其中，广西 50 份，吉林 50 份，甘肃 57 份，河北 50 份，贵州 51 份。此外，我们也在黑龙江、广东、安徽、云南、河北省各选了一个县市的种子站进行访谈。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揭示中国的种业状况，第二部分主要展现从五省调查点收回的问卷结果，重点呈现玉米种子品牌分布与垄断情况，以及农户对所购买种子的态度；第三部分则主要通过地方种子管理部门的访谈材料，分析政府在种子管理方面的角色转变过程，以及目前遭遇的困境。第四部分以政策倡导作为本文的结语。

二、农户、市场与种子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玉米种植户完全依靠自己留种的比例极低，仅占全部调查农户的 1%，绝大部分农户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种子，而市场上的种子绝大部分都是杂交种子。几千年来，农民自己留种，根据气候变化、需求变化，不断筛选和优化品种，这一农民为主体的种子系统成为维持中国农耕传统的生态根基。在 11 个亚非拉国家的最新调研发现，农民在保护全球 75% 的种质资源（Eurekalert, 2015）。然而，我们的调研显示，近 30 年来，农民育种实践已经遭遇了几乎灭顶的排挤和颠覆。相比于上述亚非拉其他国家，种子的商品化在中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调查的五省区中，只有广西、甘肃两省区调查点还有少数农户自留种或换种。广西的 50 个样本中，有 6 个玉米种植户有留种或换种，占广西样本量的 12%。广西调查点的农户土地面积普遍较小，绝大部分户均不足 10 亩，土地面积小，可能是农户愿意自己留种的一个原因。此外，甘肃省的 57 个样本中，一共有 4 户农户自己保留玉米种子，其中 2 户既用自己留的玉米种子，也从市场购买，另外 2 户完全依靠自己留种，这 2 户农户的玉米种植面积分别为 3 亩和 3.75 亩。可见，在甘肃调查点，完全不依靠市场获取种子的是种植面积极少的农户。因为农户对玉米种子市场有极大的依赖，因此，后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玉米种子市场的状况以及农户对所购买种子的态度。

（一）五大品牌主导市场及区域分布

当下尽管玉米品种繁杂，全国有数以千计种（佟屏亚，2014），在我们的样本中，五省调研点的农户使用的玉米种子品牌达到 188 个。但是，从我们调查数据分析中来看（见表 2.1），在农户使用的种子品牌¹中，“酒单”、“先玉”²、“正大”、“迪卡”、“金穗”5 个品种就占了所调查样本量的 41.4%。上述 5 个玉米品种各自分别占特定省份调查样本量的 20% 以上。

在调研数据显示的 5 大玉米品种中，“酒单”、“先玉”的使用量不相上下，分别占所调查样本量的 10% 以上。此外，“酒单”、“金穗”为国内自发研制的品种，使用以上两种品种的农户数占观测数的 17.4%；而“先玉”、“正大”、“迪卡”则是中外合资企业所出，品种研发由外资方完成，三个品种合计占所调查样本总观测值的 24%。从我们的样本来看，总体而言，玉米种植户使用外资种子的比例超过使用国产种子的比例，而且据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发展势头将有增无减。

1_ 问卷中，我们请访谈对象回忆出他们近几年主要使用的 5 种玉米品种，但因有些访谈对象只记得某 2 种或 3 种，因此无法获得全部 5 个品种的信息。数据分析时，我们对 5 种品种的数据进行了整合。

2_ 2009 年农业部 3 月发布推介的 26 个玉米品种中，“先玉 335”不在其列。为何还依然有如此大的市场份额，值得思考。参见如下网址，<http://news.qq.com/a/20110407/000787.htm>。

3_ 观测总数高于所调查农户的样本数量，因为观测数是整合了农户使用的主要的 5 种品种总和。

表 2.1 五省调研点玉米种子的市场结构

	甘肃	广西	贵州	河北	吉林	总计
各省观测 总数 ³	117	167	180	171	166	801
酒单	71 (60.7%)		27 (15%)			98 (12.2%)
仙玉				58 (33.9%)	37 (22.3%)	95 (11.9%)
正大		50 (29.9%)				50 (6.2%)
迪卡		46 (29.9%)			1 (0.6%)	47 (5.9%)
金穗	31 (26.5%)		11 (6.1%)			42 (5.2%)
其他 183 个 品牌	15 (12.8%)	71 (42.5%)	142 (78.9%)	113 (66.1%)	128 (77.1%)	469 (58.6%)

2000 年《种子法》颁布、种子市场放开后，少数大品种主导玉米种子市场的结构就已经逐渐成型⁴。以“先玉 335”为线索，可以看到 2000 年以来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的发展脉络。

“先玉 335”出自 2002 年成立的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是由登海种业与美国杜邦先锋公司合作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登海种业控制 51% 的股权，负责产品营销，美国杜邦先锋公司控制 49% 的股权，负责研发和生产。登海先锋公司从 2005 年开始盈利，其最大的功臣正是“先玉 335”。2006 年，在农业部统计的玉米主要品种种植面积中，“先玉 335”还未被重视，到 2008 年，这一品种的种植面积突飞猛进到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第三位（降蕴彰，2009）。

在玉米种子品牌中，“先玉 335”的高价格、高利润尤其引人注目。26—27 元/公斤（在东北市场，经销商价格一度高达每公斤零售 60 元），价格为国内品种的 3 倍以上，利润率高达 50% 以上，而“郑单 958”的售价最高也只有 9 元/公斤，低的时候为 6 元/公斤，毛利率只有 24%；且从长期来看，先锋公司并没有降价的打算（降蕴彰，2009）。“先玉

4_《种子法》的颁布，使私人资本可以进入种子生产、经营领域。

335”的故事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而更多如登海种业这样的国内种业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也将是可预见的事实。对这些跨国公司而言，依靠与熟悉国内种业市场的本土公司合作，无疑是打开中国市场的一条捷径，然而，走高价路线的种业公司一旦领头并逐渐主导中国种业市场，中国的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就会是“新常态”，这一点在后面种子管理站的访谈中有清楚的显示。

尽管几大品牌之间存在竞争，但不同品种的分布却呈现出有趣的地域差异。例如，“酒单”、“金穗”主要分布在甘肃、贵州；“先玉”主要分布在河北、吉林，即东北及华北地区；“正大”、“迪卡”则主要在广西，即西南地区。

（二）品牌的选择与担忧

我们的调研显示，农民选购种子主要受他人示范或广告影响（46.6%），农民也依据自己的经验作出选择（43.9%）（见表 2.2）。此外，就有效样本量（255）而言，农户对自己购买的种子大体满意，平均满意率为 70.2%，认为一般的占到 22.7%，而不满意的占到 7.1%。农民对种子最大的担忧是买到假种子，在 258 个样本中，41.5% 的农户表达了这样的担心。除此之外，农民也担心出芽率、产量、价格等问题（见表 2.3）。

我们的调研也显示，32.8% 的农民已经对种子的未来表示忧心。最主要担心的是种子价格的不断上涨问题，这一选项在 84 户表示担心的农户中占到了 56.7%；另一主要的忧虑则是对产量和种子质量问题。

表 2.2 影响五省调研点农户品牌选择的主要因素

影响因素		频次	百分数	
自己判断（自己认为好）		113	43.9%	
示范或广告因素	因为别人也用	90	34.9%	46.6%
	农资店推荐	18	7%	
	农技站推荐	2	0.8%	
	公司广告	10	3.9%	
其他原因		23	9.1%	
总数		256	99.6%	

表 2.3 五省调研点农户购买种子时所担心的主要问题

	频次 (个)	百分数
假种子	107	41.5%
出芽率	43	16.6%
产量低	22	8.5%
种子价格高	6	2.3%
其他原因	30	11.8%

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对种子没有担心，其中的理由较为纷杂：有的农民觉得政府肯定能提供种子；有的农民认为市场上肯定有充足的种子可以购买；还有的农民则觉得担心也没用。我们在广西省调查点做个案访谈时，一位农户表示不担心未来种子的使用情况，如果种子价格上涨，他打算用从市场买回的种子自己留种。这也表明，对一些大型种子公司正汲汲于申请种子专利，使得农民不能留种的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毫无所知；对于所购买的种子是否还可以用于繁育，农户也无认知。

（三）持续上涨的玉米生产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玉米种子的高度市场化，也隐含了玉米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的危机，而各项生产投入中，种子成本的上升也尤其引人关注。关于五省调研点玉米种植成本的数据收集，吉林省调研点的数据最为完整，其他省调研点的数据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从吉林调研点的情况来看，其玉米的种植成本在 2011-2013 年间连续增长，两年之内每亩生产成本涨了 9%（见表 2.4）。在各项费用中，种子、化肥、雇工费用持续上涨。

吉林省调查点玉米种植成本的上涨，在全国数据中也有类似的呈现。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从 2001 年到 2013 年，玉米种植的各项成本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涨。图 2.1 呈现了每 50 公斤玉米的物质费用、出售价格和现金收益。从图中可以看到，从 2005 年开始——也就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的第 5 年，种植玉米的物质费用⁵便持续上涨；而玉米价格和玉米收益却出现一些波动，且即便如 2005、2008 年的数据所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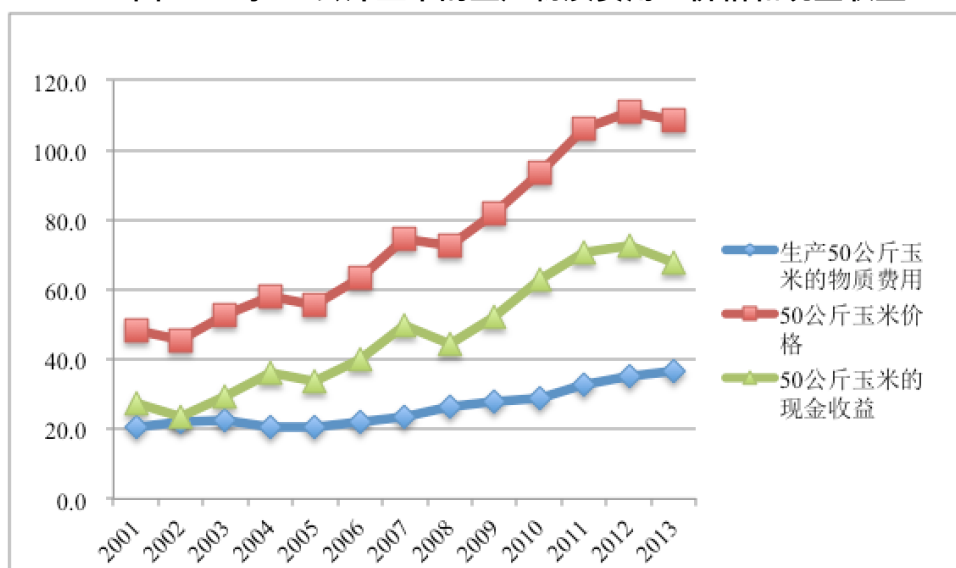
5_ “物质费用”包括：种子、农药、肥料、机械作业、灌溉费用等。

示，在玉米价格和收益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种植玉米的物质费用仍然在上涨，这一趋势在 2012-2013 年再次出现。这种状况暗示着，尽管国家的最低收购价的确起到了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然而这种保护作用正在不断受到农资成本上涨的冲击。

表 2.4 吉林省调查点 2011-2013 年玉米种植亩成本（单位：元 / 亩）

项目	种子费用	农药费用	化肥费用	机械作业费用	雇工费用	总计
2011	66.94	27.11	270.76	36.52	17.62	418.95
2012	67.93	33.76	272.2	39.7	23.97	43.56
2013	71.23	26.12	294.55	38.69	26.71	457.3

图 2.1 每 50 公斤玉米的生产物质费用、价格和现金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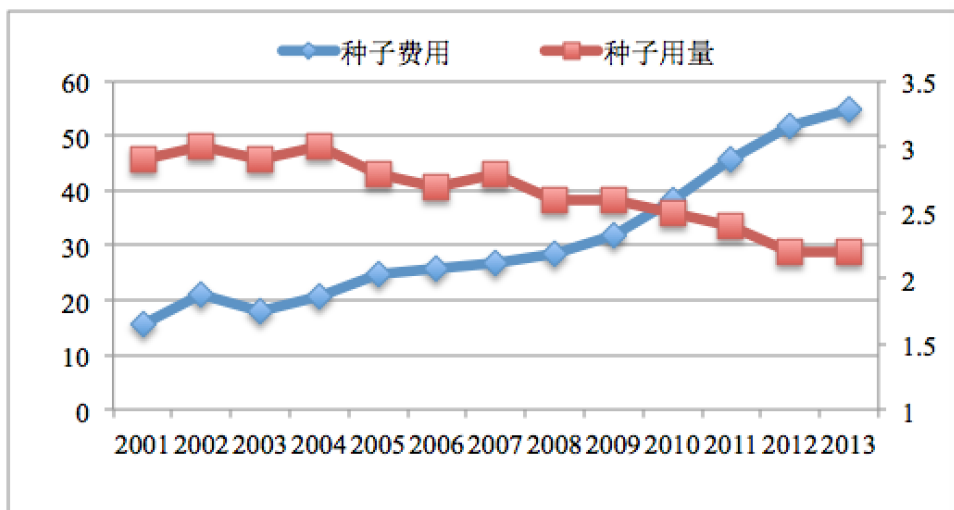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4，2014）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玉米种植各项成本中，种子成本有明显上升。尽管每亩种子的使用量从 2001 年以来有所下降，从每亩使用 2.9 公斤下降到每亩使用 2.2 公斤，但是每亩的种子成本却一直在上升，尤其在 2006 年到 2012 年之间，上升幅度最快，短短 7 年之间玉米种子成本已经增长了 1 倍；2012 年以后增幅略有所减缓，但仍在攀升（见图 2.2）。考

考虑到每亩玉米种子用量的下降，种子销售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比下图直接呈现的要更明显。

图 2.2 2001-2013 年全国玉米种子平均亩成本及亩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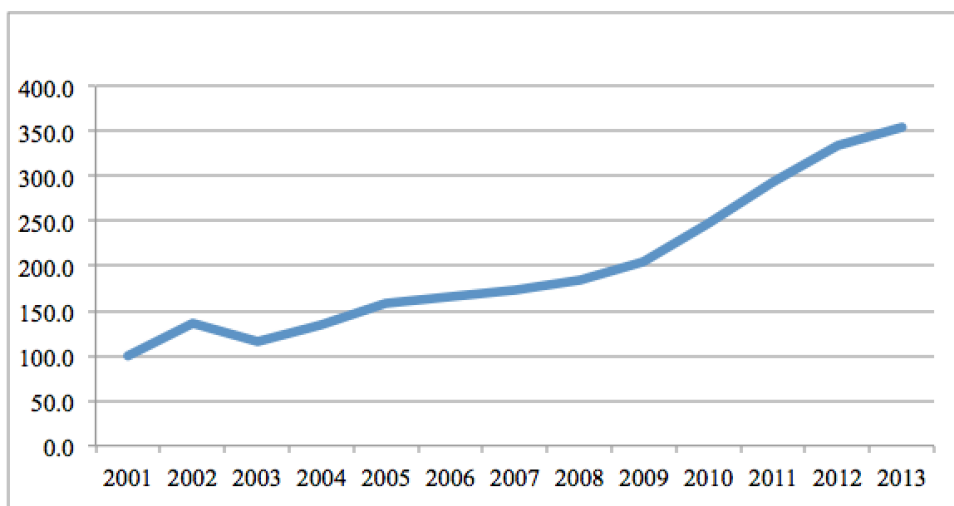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4,2014,表1-8-2.)

2015年4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黑龙江的一种玉米品种价格翻倍,对农户生产造成巨大冲击的新闻(央视新闻,2015)。黑龙江部分玉米主产区使用最多的品种“德美亚1号”价格比前一年骤涨一倍,从500多元一袋,飙升到1150元一袋。这一状况让当地农民始料未及。面对这种突然的价格变化,地方政府物价局介入调查,然而却因种子销售的中间环节太多,无从判断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且种子价格完全市场化,不受政府限制,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地方政府竟也无从下手处理。这一案例深刻地表明,尽管从全国的种子平均价格来看,这些年总体来说还不算太高,农民也许感受还不明显,然而,变化却完全可能突然发生,让农民和政府都措手不及。

事实上,如果以2001年每亩玉米种子成本为基础点(100%)计算2002-2013年这项成本的增幅,可以发现,每亩种子成本的增幅在2001年到2009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翻了一倍,2009年以后增幅更是进一步提升,到2013年时,每亩玉米种子的成本相比2001年已经上涨了2.5倍(见图2.3)。正如上一节河北先玉335带动种业高价位的案例说明,

玉米种子的价格飙升和不断更新换代背后，是种子公司在市场竞争下不断推陈出新以占据市场份额，同时，种子企业追逐利润的方式也在不断更新。

图 2.3 2001-2013 年全国玉米种子平均亩成本增长幅度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4，2014，表 1-8-2.)

综上，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户的玉米种子绝大部分购自市场，自己留种的比例仅占 1%，玉米种子市场也呈现大品牌主导的特征。在五省调查点，“酒单”、“先玉”、“正大”、“迪卡”、“金穗”5 大品牌占了所调查样本量的四成以上；且几大品种主导玉米种子市场的结构在 2000 年《种子法》开放种子市场后就已经逐渐成型。在品牌的地域分布上，不同品牌的玉米种子盘踞不同地域市场的特点也十分鲜明。而对于所购买的种子，七成农户表示满意，但也有 41.5% 的农户担心买到假种子，此外，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开始对种子的未来表示担心。种子的市场化同时也伴随着种子成本的上升，全国玉米种植总成本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尽管国家的最低收购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农民收入的作用，然而这种保护作用正在不断受到农资成本上涨的冲击。

三、政府对种子生产经营的管理变迁及当下困境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种子的市场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政府在种子生产和经营管理上的不断弱化。今天的种子监管体制及其问题可以追溯到2000年《种子法》。可能并非巧合，中国于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种子法》也在这年出台。本节将回顾改革开放前“另类”的种子生产、经营体系，该体系在保证多样性和基层种子自主方面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优势。同时我们也考察当2000年《种子法》改革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后，给当前种子管理带来了什么问题。

建国后，我国的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大致经历了3种范式。

第一种范式，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这一时期公共部门的科研体制与基层农民的育种实践相结合，相辅相成，为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8年4月，农业部、粮食部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种子工作会议，制定了种子工作的“四自一辅”战略方针，即依托生产队“自选、自繁、自留、自用、辅之以必要调剂”。强调社区积极参与育种，政府进行适度调剂。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逐渐建立起专门的种子繁育和管理部门，逐步形成以县良种繁育场为骨干，人民公社良种队（场）为桥梁，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繁育体系，全国范围内也陆续建立起种子机构。在这一阶段，农民自留种、换种的实践非常丰富。我们在全中国不同地区（黑龙江、河北、云南、广东）的调研中都了解到，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往往有自己的良种场，作为本生产队的种子繁育基地。

这一时期，国家和基层（县、社、队）共同参与负责种子的生产、经营和分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这一范式下的成果。从我们的访谈来看，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国家将种子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公共资源，而不是商品，因此，国家财政直接支持种子试验示范、繁育和推广工作、以及对农村基层育种人员的培训。第二，基层是育种、留种的主体，外部调剂是辅助性的。第三，调剂的种子价格由国家控制，种子繁育和管理部门按国家规定价格向生产队提供种子，如果有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第二种范式，1980年代到2000年《种子法》颁布前，是种子子公司自收自支、自负盈

亏的范式。如果说 80 年代前以基层留种为重，80 年代以后，供种的比例逐步提高。这一阶段，种子公司为农业局下属的国营单位，属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种子的生产和经营仍由政府控制，但国家已经不再直接给予财政拨款。这一阶段，种子公司和种子管理站是合属的，生产经营由政府垄断。90 年代，根据《种子管理条例》，种子经销商既需要到种子管理站办证，也要到工商部门办证。当时的种子经销商基本都是各乡镇的农业技术员，每个乡镇基本都只有一家店经销种子，这些经销人员掌握着农业技术，所以当时对种子市场的监管也相对容易。可以认为，90 年代种子是垄断经营的，每个县只有一个种子公司，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事实上是维护种子公司自己的利益，所以当时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积极性也高。在这个时期，既不允许对种子进行私繁滥制，也不允许外面的种子随意进入本地市场，外来种子进入本地，必须有合法手续。就河北调研点的县级种子管理站来看，90 年代，该种子管理站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由种子公司支付。

第三种范式，2000 年《种子法》颁布后至今，种子生产和经营、种子监管都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在经营体制上实行了政企分离，种子站取消了经营功能，成为事业单位，负责种子监管工作；种子的生产、经营则走向市场化、产业化，其最突出的改变是种子的生产、经营从政府控制转变为允许私人进入，种子生产经营的权限被放开。从河北调研点的情况看，在 2000 年前，每个乡镇基本只有一家种子经销店，由于《种子法》放开种子经营，到目前，全县上报的种子经营店就有 78 家（全县一共 25 个乡镇），当地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称，实际数量比这个更多；黑龙江一个县种子经营商有 200 多家。尽管根据 2000 年《种子法》的第五章第二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但第五章第二十九条也规定，“种子经营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可以不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这意味着，只要不再对出厂的已包装好的种子进行再分装，从事种子批发、零售的经销商都可以不必到种子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许可证。这一规定在《种子法》2004、2013 年的两次修改中都没有改变，直到 2015 年修改版中，才在这一条后加上了一句“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

管部门备案”。

2001年《种子法》出台改革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导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监管职能退化，监管人员力不从心；二是种子价格成为纯粹的市场行为，没有监管。而这正分别对应农民忧虑的劣质种子和种子价格的问题。下面分别细说。

从2001年开始，县级种子子公司改制，政企分开，种子管理站与种子子公司分离。《种子法》出台之前，政府部门是对种子生产过程加以管理；《种子法》出台之后是进行种子成品管理，属于事后监管，即只监管种子市场，不再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管。经验丰富的河北种子站监管人员认为，“全程监管更加可靠，事后监管是只有发现问题并查出来才能监管，发现不了就监管不了。”黑龙江一个玉米种植县的种子管理站负责人说，200多家经销商流动率很高，而且2001年后不再需要他们在当地进行资格登记，导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卖，街上蹬倒骑驴的，讨荒的，拿身份证都可以去卖的，谁不行？”因此当地种子管理站对他们无从监管，十分头疼，认为种子经销商几乎已经是无门槛运作，种子监管部门对经销商的基本信息毫无掌握，一旦出问题，在理赔环节往往找不到经销商：

“你现在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省份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商局都可以起执照的，过去外地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外地你得有本地人做一下担保，你把种子劣种卖给农民，农民最后没收成。你卖种子2月，3月份，4月份完了，5月份种地你走了，打电话找不着你，你把老农民坑了，过去这个事情屡屡发生。你到理赔的时候他又不来了，没了，人找不着了。”⁶

2015年春东北地区中外合资的玉米种子“德美亚”一年间价格翻番，导致农民无力购买，成为“疯狂”的种子，数百农民围住省种子管理局，几乎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种子的价格归物价管理局管理，但显然这其中市场发挥了更大作用。在河北的调研，我们也同样看到，合资的玉米种子带动了行业走向高价位。先玉335在河北调查点的种植已经10多年了，价格逐年提高。这些年始终处于高价位，而且也拉动了行业商品的整体走高。据介绍：

“原来种子价格才三四块钱一斤，那时种植方式是撒种子，一亩地需要八斤种子……

6_ 2015年新修订的《种子法》所增加的“备案”这一项，或许增加了一个管理环节，也许是种子市场管理的一个积极信号。

先玉 335 在 04、05 年市场上就有，把价格提高到五六十块钱一袋（2 斤多点儿，按粒算，4400 粒一亩地）。国内企业后来也改头换面，新的品种定价按照先玉 335 的价位走，旧品种换个名字，前些年百姓叫苦连天，现在也都习惯了，现在市场上也找不到三四块钱一斤的种子了，都是五六十块钱这个价。开始的时候，其他品种的厂家还撵不上，老品种一直都是低价，价格不可能马上提高，只能说是新品种，人家卖 65 块，我卖 60。更新换代快，新品种价格能赶上来。”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变迁可以看到，政府在种子繁育、经营、监管方面的角色在不断减弱，种子从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公共资源，变为改革后政府特许经营的商品，在《种子法》推动下最终成为全面开放的商品。种子的商品化过程，伴随着国家职能的退出，是导致目前地方政府在种子监管方面遇到诸多困难的原因。而且种子管理部门往往经费支持不足，也导致种子管理站人员不足、人员流动频繁等问题。黑龙江种子监管人员说“现在是我们的管理，责任太大，睡觉都提心吊胆的，说句不好听的言论，说重视各级实际都是口头重视，你政府既不给增人又不给增设备，又不给增专业的人员，又不给增车，又不给增管理的東西，你说管理啥？”

四、结论与政策倡导

我们的调查发现，一方面，玉米种子的商品化程度已经极高，农户自留种的比例仅 1%，农户对种子市场有极高的依赖，农民育种体系几乎遭到全面摧毁。已经出现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对种子的未来表示忧虑。另一方面，《种子法》颁布以后，政府在种子市场监管方面及其能力方面有相当程度的下降，不利于种子管理。因此我们呼吁国家的种业科研体系建设与农民基层育种实践并进，同时从制度上强化政府的责任和对种子的监管力度。

第一，我们建议国家应建立公共的种业科研体系，同时鼓励和扶持基层的农民育种实践。今天中国的种业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公共的种业科研体系是种子繁育的骨干力量，基层的农民育种同时也应是我国农业的基础。不仅绝不应该放弃和排挤农民基层的育种、

保种实践，政府还应大力加以扶持。完全将种子培育和生产交给市场，必然的结果就是生产的单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而言极其不利，对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内看，小农在保种、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我们呼吁国家从保种、扶贫两个角度对这些小户给予政策支持，给这些保种的小户提供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品种培育方面，从政策上向小农户倾斜。此外，我们也建议以村庄社区为基础，发掘种植老品种，国家需要对村庄社区的育种实践给予支持。这样既支持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小农户也是一个生计保障，一举多得。

第二，扩大政府的种子监管权力。《种子法》颁布以后，随着种子的市场化、企业化，政府在相当程度上退出了种子监管。突出的表现是，种子经销商如果不对种子进行再包装，直接按原包装销售，只需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即可获取营业资格，而不必到种子监管部门登记；这样一来，种子管理部门难以掌握种子经营者的信息，出现假劣种子时，也难以追责。因此，我们建议，应当在《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强化种子管理部门的责任和监管力度，如《种子法》2015 年修改版中新增的条目，种子经销商需要到政府部门进行备案，就是一个好的方向。同时，我们呼吁政府在完善最低农产品最低收购价的同时，也对包括种子在内的农资价格进行调控。在农资市场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最低收购价的弱化必然有损于农民收入。我们的建议是，国家不仅应该强化最低收购价政策，还应该看到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应该对农资价格也实行调控。✕

参考文献：

- 1_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2004（及 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4。
- 2_ 黄季焜、徐志刚等，我国种子产业：成就、问题和发展思路[J]。农业经济管理，2010（3）：5-10。
- 3_ 邵长勇、唐欣、梁凤臣、张晓明、孙伟光，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种子产业发展战略。中国种业，2010（4）：11-14。

- 4_ 佟屏亚, 跨国种业公司兴起及其全球化战略 [J]. 调研世界, 2003 (4) : 17-19。
 - 5_ 佟屏亚, 2014 年玉米种子市场形势分析。农业科技通讯, 2014 (1) : 5-7。
 - 6_ 降蕴彰, “郑单 958” PK “先玉 335” . 农经, 2009, 50-52。
 - 7_ 央视新闻, “疯狂的 ‘种子’ ” : 农民购买困难重。2015 年 4 月 3 日 <http://m.news.cntv.cn/2015/04/03/ARTI1428027314631613.shtml> .
 - 8_ 尹成杰, 粮安天下一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 9_ 赵刚、林源园, 中国种业遭遇外资企业侵入面临重灾。北京农业, 2009 (9) : 3-5。
 - 10_ Eurekalert: World crop diversity survives in small farms from peri-urban to remote rural locations, 2015 年 2 月 13 日 http://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5-02/ps-wcd021115.php.
-

生态文明： 一种自治主义进路？

夏永红*

1983年第4期的《读书》杂志上，赵鑫珊的文章《文学艺术与生态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人与自然处在和平共生状态时，人类的持久幸福才有可能。没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是完善的。”¹这也许是生态文明一词的最早出处。在随后的三十年里，“生态文明”经历了从学界到政界，从庙堂到民间，从海内到海外的爆发式扩散。在此过程中，“生态文明”一词的含义也在中国的去政治化氛围中逐渐变得模糊难辨。

然而，在诞生之初，“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实际上有两种明确而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的领域。这里的“文明”是野蛮的反义词，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精神和物质上摆脱野蛮和贫瘠，而且还要在生态建设上

* 夏永红，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1_ 赵鑫珊：“文学艺术与生态学”，《读书》1983年第4期。

实现现代化，脱离野蛮，走向文明。第二种解释是把“文明”解释为“社会形态”，把生态文明解释为环境友好的“社会形态”。这种理解往往关联着后现代主义、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反现代主义思潮，它强烈地批判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具理性和科层制的种种弊端，并将生态文明构想为替代的社会形态。前一种解释与改革开放时代的现代化话语完全同构，并且也契合了官方全面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向，于是它被点缀上资本主义批判的套话之后，就成为了官方的标准解释。然而，后一种解释要更为有趣得多，它与各种各样的批判思想有更多的联结，有助于我们把握生态文明论背后的政治关切。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生态文明论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对环境问题根源的探讨和对解决方案的构想，来对生态文明做再政治化的处理，呈现生态文明论的政治维度。

环境问题的根源：搭便车问题与游牧问题

关于生态问题的根源，不同的生态文明论有不同的论说。根据已有的文献，可以概括出四种观点。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这种二元论让自然沦为了纯粹的供人予取予夺的材质。而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生态中心主义。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政治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技术主义的理解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仅仅是技术性的，因而也将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得以解决。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论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生态文明只能奠基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

但这些理解都限于宏观层面的讨论，没有切入到环境研究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具体机制的探讨上。换句话说，它们所揭示的是环境问题的远因，而没有对近因做更多的讨论。在此我们将重返环境社会学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来对这些生态文明论说做出补充，并进一步引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论。

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共有物品，对它的利用和治理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一般认为，环境问题是集体行动困境在自然共有物品（commons）利用中的体现，即追求个人最大利益

的理性人，并不会带来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而且很可能因为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最终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奥斯特罗姆归纳了三种共有物品（commons）的治理问题模型：哈丁的公地悲剧模型、囚徒困境模型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种模型可以为我们澄清环境问题的由来。哈丁的公地悲剧指的是，对于一个公共牧场，每个牧人都可以从畜牧中得到直接收益，但过度放牧导致的损失却与其它牧人平摊，因此每个牧人都倾向于畜养更多的牲口。最终，公共牧场因为每个人无节制地增加牲口，将会导致公地的毁灭。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牧人们相当于博弈对局中的理性人，双方之间不存在充分的信息交流，他们之间无法达成有效合作，每个人都会选择背叛策略作为最佳选择策略。而对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言，具有公共利益的群体，并不会自发地去进行促成集体利益的行动。相反，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选择，往往会选择搭便车的行为，因为它同样可以分享到集体行动所带来的集体利益。奥斯特罗姆将这三种模型归结为搭便车问题，在她看来，“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的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作一个搭便车者。”² 当每个人都选择搭便车的时候，就不会有集体利益的产生。这三个模型实际上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个人的自私自利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会自发带来公共利益的增进。当我们将这三种模型带入到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中，就不难发现环境问题的根源。因为自然环境同样是一种共有物品，每个人都倾向于搭便车，不承担合理利用自然环境或治理环境的成本，而倾向于采取背叛策略，对环境过度利用而不治理，最终导致环境的公地悲剧。

然而，奥斯特罗姆对包括公地悲剧在内的搭便车问题的分析仍然囿于西方经济学的原子主义个体的假定中，没有将阶级视野带入到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中。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源于个体之间的搭便车问题，它还来源于那些脱离了乡土的流动资本对在地社群的掠夺，源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在我们看来，环境问题主要是地域性的，但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却是非地域性的，我们可以将这种环境问题的根源称之为游牧问题。因为一个工业项目的物

2_ [美]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年，第 18 页。

理尺度上限制，以及地球环境的自净作用，除了全球气候变化这样的少数案例，任何类型的环境污染实际上都限制在工业项目一定范围的半径空间上。因此，承担环境污染后果的总是工业项目所在地的进行农耕式定居的地方民众。虽然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但如果我们掌握了足够的环境知识，我们会考虑到这些负外部性问题对我们的生命、健康和休闲的权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一个工业项目充分在地化，即地方社群可以自主管理它的生产、管理和分配过程，他们就会在经济利益与生命健康之间权衡利弊，从而有效制约环境污染的产生。

但当一个地方的投资和生产都被国家或大企业掌控的时候，就会引入流动性和去地域化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地方性共同体逐渐消失。在科层制的行政体制下，大型政治和经济机构的决策层完全变成了游离于地方生存经验之上的“游牧者”。这些企业家或政客掌握了巨额财富和权力资源，是真正“没有自己的祖国”的一群人，它们的切身生存体验已经脱离了任何地域，并且可以随意地在全球尺度上任意迁徙，因而也就无需担心工业污染的环境后果。因此他们的决策往往也就从非地域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基于地方民众的切身的生存体验，环境问题这样的负外部性问题就最终处于他们的决策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当地方民众开始保卫家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无力应付繁琐的官僚程序，而在传统共同体解体的状况下，自身也缺乏有效的组织，难于对于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构成有效而持久的作用，于是只能从积极参与的公民沦为被动的消费者，³ 加入资本家和政客所摆置的资本循环之中。“没有祖国”的资本，就像野蛮的游牧民族一样，在一轮又一轮的侵略中，定期收割着农耕民族的剩余价值和环境资源。这种利益集团的“游牧式生存”对地方民众的“农耕式定居”的侵害，是酿成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游牧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和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适用于小型群体之间的理性博弈而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而后者则和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更多的关联。然而，

3_ [美] 科尔曼：《生态政治》，梅俊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72-73 页。

它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根源：缺乏在地社群对共有物品的自主治理，因此唯一有效的路径似乎只能诉诸植根于社群的共同文化和民主参与，来实现对环境共有物品的自我治理。这种小型社区自治的方案，一直是绝大多数现代生态政治思想的共同特征。那么，这种小型社区自治的方案，是否可以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生态文明所构想的政体形式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生态文明的政体形式

在前述所说的对生态文明的四种理解中，每一种都界定了何种要素才是通往生态文明的抓手。唯心主义认为可以依靠观念、个体的力量，制度主义则寄希望于某种制度的创立，技术主义怀着工业拯救生态的梦想，而唯物主义则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但这四种划分主要基于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诉诸的手段的差异，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政体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生态文明继续区分为三种形式：利维坦式的、自由市场的和自治主义的。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为了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通常有两种策略：利维坦式策略和私有产权策略。二者在环境思想中分别体现为生态绝对主义和市场环保主义。前者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案，既然个人的逐利行为无法保证生态安全，就必须对一切自然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和调配，来协调所有人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因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必须牢牢控制在国家那里，并且它可以决定谁使用，如何使用，使用多少自然资源，从而可以对任何违反生态指令的人进行惩罚。这种绝对主义的方案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主导性的潮流，包括奥弗尔斯、哈丁和海尔布隆纳等人，均支持过这种方案。而市场环保主义的方案的代表是朱利安·西蒙。这种观点试图为一切公共的自然资源都确立私有产权，从而划分为更小的区块，而每一个区块的所有者，基于理性的考虑，就会适当而非过度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但暂且不论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对于大多数自然资源而言，是无法以区块的形式划入到私有产权中的，比如我们所共享的空气和水源等。因此，相比于集权主义的方案，市场环保

主义的方案几乎不值一驳。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两种方案虽然存在差异，但都设定了一个基于外部权威设计的最优制度，并且只要将这种制度付诸实践，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她主张超越政府 / 市场的二分法，将不同的权力中心组织起来，进行自主式的治理。她为此动员了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大量案例来证明，成功的治理策略必然是充分依赖与共有物品所相关的社群的自我管理。这种管理致力于将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混合起来，因为极少有制度不是私有的就是公共的，大多数成功的公共治理进路，都是将私有特征的制度和公共特征的制度混合起来。那些要么主张国有化，要么主张私有化的主张，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现实中，公共和私有都是相互缠绕的而非相互隔绝的。这种对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二分法的超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那里也获得了回响。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的生产者的自我管理的观念，实际上和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体系殊途同归。它们都共同挑战了简单的公共与私人的二分法的局限，而构想了一种既非个人化的私人产权体系也非公共产权体系。⁴ 基于这种共同性的产权形式和公共产权的区分，体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共有物品（commons）的区分。在大卫·哈维看来，公共物品是由类似国家这样的公共权力机构生产或创造的，它可以完全脱离在地社群的需求和实践，但共有物品则是基于社群的切身需要而生成的。⁵ 比如，治安、医疗和教育机构，是由国家创建的公共物品，而公共池塘则是一种共有物品。

然而，这种自治主义的路线是否可以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呢？无疑，包括深层生态学、生态无政府主义，甚至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多数激进生态主义思想，都支持通过社区自治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主张。深层生态学主张一种依托乡土的小型共同体的地方自治，这是一种去中心化、非等级制和直接民主式的政体形式；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政体主张与此类似，它们旗帜鲜明地将等级制视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因此强烈地怀疑一切国家管控和计划

4_ Paul Burkett, "Ecology and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17(2), 2003, pp. 241-272.

5_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Verso Books, 2012, pp.73-74.

经济的手段，而主张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生态社会主义虽然没有像生态无政府主义那样对国家持强烈怀疑态度，但它仍然支持社区自治、非等级制等政治组织形式，虽然它将批判的矛头首要地对准了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撇除它们在生态问题的根源、解决生态问题的手段的看法上的差异，单从它们的政体主张来看，这三种激进生态主义都包含了无政府主义的因素。正如戴维·佩珀所言：“当今的生态主义往往是对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重申。”⁶

然而，这种自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是否就是生态文明的终极政体形式呢？未必。它仍然可能会落入四种陷阱。首先，它有可能会转化为一种保守的乡土主义。利维坦式的国家主义方案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建构，因此各种纯正的保守主义实际上都将国家权力、科层制视为机械的、现代的、脱离乡土的，而支持与此截然相对的前现代的地方自治。因此，各种浪漫的、乡土的、反启蒙的生态文明设想，都有落入保守主义陷阱的危险。其次，自治主义也可能掉入新自由主义的议题设置之中。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的过程中，同样支持地方自治的最大化。如果缺乏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警惕和规制，有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化，与之相伴的环境问题也将会进一步激化。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除了在国家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管制之外，现在并无其他更有效的管制方案。对国家权力的盲目反对，非但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反倒会恶化环境问题。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行之有效的环境保部措施都是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和管理而实现的。最后，自治主义本身可能也无力于处理全局性的政治和环境问题。比如，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权力机构的授权，低层级的机构如何保持自身的有效运作？各种地方权力机构如何有效协作和协商，避免落入地方社群意义上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避免落入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大流域的水污染治理这样跨区域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地方性的社区自治，肯定是无效的，建立超越地方的更高层级的协调和治理机构是不可避免的。

6_ [英] 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宋玉波、朱丹琼译，格致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55页。

结语

我们在前面所言的利维坦式、私有产权的和共有产权三种政体的区分，会令我们想起国家主义（凯恩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政自由主义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治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等）三种意识形态群组之间的经典对立。实际上，我们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依附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拉图尔曾经考察了与生态政治相关的四种政体形式，它们分别是本地政体（Domestic regimes）、市民政体（Civic regimes）、工业政体（Industrial regimes）和商业政体（Commercial regimes）。⁷在他看来，现在的所有的生态政治的主张，都可以归结到这四种政治形式中，而不存在真正的生态政体。几乎所有的生态政治话语都可以在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那里找到其原始版本。

这意味着，生态问题的困境并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是关涉到我们对社会的总体筹划。因此，我们更愿意将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与现存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但虽然可论证小型自治社区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首选（虽然并非唯一选项），并且对于激进左派的反资本和反集权立场而言，它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但如何揭示它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如何设计它的具体构架，如何克服它的既有缺憾，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我们澄清。比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马克思语）那么，小型社区自治的社会是否需要新的工业革命的推动？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管理和工程技术都是大企业和大政府导向的，那么如何设计小型社区导向的管理和工程技术？这种转变是否具有技术和政治上的可能？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逾越了单纯的环境问题，而关涉到我们既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讨。因此，自治主义的生态文明论是否成立，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它仍然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7_ Bruno Latour, "To modernize or to ecologise? That is the question", Kristin Asdal, Brita Brenna, and Ingunn Moser eds. *Technoscience: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s*. Oslo Academic Press, 2007, p.252.

最激进的“保守”形态 ——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 起源、功能和困境

孙佳山 *

无疑，科幻题材影片是现代性的产物，正如科幻题材文艺作品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从 19 世纪中期伊始，凡尔纳、威尔斯等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具有科学幻想成分的文艺作品就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而自从 1902 年梅里爱拍摄了世界第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以来，科幻题材也逐步进入到了电影领域。1926 年，在美国出版的《惊奇故事》杂志，创造了“科学幻想”这一名词，科幻作为一个逐渐体系化的现代概念，完成了与启蒙时代之前就有着深远脉络的各类幻想题材作品的分野，具有了继往开来的生产性，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这一概念开始在电影领域普及并成为公认的惯用术语。的确，二战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影视技术的日渐成熟，在大众文化工业生产的逻辑下，科幻题材也在电影领域呈现出相对清晰的题材分类。尽管科幻电影在二战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阶段性、周期性的回旋和曲折，但一个基本线索是科幻题材影片从最初的充满了科技性特征的乌托邦的先锋探索，一步步走向了异托邦文化反思的梦魇呈现，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态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因此，从生态话语切入，将是我们完整把握当下科幻题材影片全貌的强有力抓手。

* 孙佳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尤其是近年来，以《2012》《阿凡达》《云图》《环太平洋》《雪国列车》《地心引力》《星际穿越》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生态话语包裹的当代科幻题材影片在全球的热映并引发了持久的讨论和争议，足以说明这一话题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热度，在这些影片中也充分地暴露出全球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深层次困境和当前全球中产阶级趣味自我想象的边界，同时也佐证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那么，能否深入解析当代科幻题材影片的历史沿革、来龙去脉，能否理清在当下科幻题材影片中已经事实上构成内在叙事动力的生态话语的发展线索？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具体承载着怎样的审美表达和意识形态症候等不同结构性功能？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着对科幻题材影片流变的系统梳理，还将直接影响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发展趋势的判断和认识。

最晚近的“发明” ——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起源

1963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寂静的春天》。在此之前，征服大自然，重新确立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打破中世纪宗教蒙昧的现代性启蒙理性，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合理性、合法性，不仅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甚至有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生态话语也从未出现在人类的任何辞典。在《寂静的春天》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描述了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以春天不再有鸟叫虫鸣为隐喻，在当时惊世骇俗地提出了农药将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旷世预言。这部著作自面世伊始，就强烈震撼了那个时代的广大社会民众，但也受到了美国麦卡锡主义与之利害攸关的垄断资本的猛烈抨击。因为在此前，生态问题从未进入到人类意识，卡森也因此遭受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而且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光景，直到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人类需要有意识地保护环境才正式成为一个问题开始逐步浮出历史地表。此后，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哲学等一系列新兴文化艺术现象和知识学派才得以蝴蝶效应般地陆续产生和发展，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关于昆虫抗药性的第十五章《大自然

在反抗》和十六章《崩溃声隆隆》的部分内容，甚至构成了现在被奉为华语科幻经典的刘慈欣的《三体》中的一个核心元文本，是小说中情节演进的一个关键节点，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也绝非一日之功，这一过程也是足足煎熬了 20 年之久，1972 年出版的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在当时就某种程度的呼应了卡森的预言，但即便它是被国内阴谋论者所热衷的罗马俱乐部出品，在当时亦曾遭到讥讽和驳斥。一直等到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世界各国才开始在政府层面围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生态话语才真正进入到全球性的公共文化领域，但也仅仅是登堂入室而已，形成今天这样的压倒性优势，还是从世纪之交才肇始。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在大众文化领域有着极高的曝光率。2000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则提出了著名的地质学概念“人类世”。“人类世”指的是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继更新世、全新世之后的第三个地质时代，跨度则从 1800 年左右的工业化时期开始至今。在这个地质阶段，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已经取代了自然循环，成为塑造地球环境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人类如若继续肆意妄为，将很可能会引发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特别是近年来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等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大会中，与会各国就全球生态保护问题的市景集市般的讨价还价后所产生的尖锐分歧，更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焦虑。

当然，从科学界到文艺界，比如各类科幻题材作品，对“人类世”这个历史周期可能会引发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预期和恐惧，其实远远早于这个严谨概念的诞生，也早就有一大批科幻题材影片对此进行了几近全景式的想象和书写，甚至比这个概念走得更远。早在 30 年代，《洪水》就通过将自然灾害的发生地点放置在现代都市纽约，试图对现代化与自然的矛盾做朦胧地影射，而 50 年代的《世界末日》和 70 年代《惊恐万状》的科幻想象中尽管还带有某种“创世纪”式的宗教色彩，但生态话语的分量已经开始明显地提升。生态话语对科幻题材影片的逐步渗入和掌控，与全球范围内对生态问题的认识的逐步深入也几乎是同步的。在电影领域，尽管有着 1982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态电影国际观摩、1984 年的国际生态电影节，但是，生态话语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题材、类型，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科幻题材影片开始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更已经是发生在 1990 年代，并且也是到

了新世纪以后，生态话语才在不同题材的类型片中被赋予了普遍性价值，确实几乎所有近十余年来全球热映的影片，都多多少少地涉及到了生态题材。作为非常适应 3D、IMAX，包括已经初露峥嵘的虚拟现实技术的科幻题材影片，在充分消化了当下最为时髦的生态话语后，也更为如鱼得水地讲述着现今时代的“主旋律”。

因此，作为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才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在世纪之交才开始进入到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晚生的产物，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俨然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尤其是在我国，美丽中国、节能减排等概念的提出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也意味着下到娱乐文化消费，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不同层次的审美诉求在这个领域都能愉快、顺畅地达成共识。也的确，生态话语，在今天的大众文化政治实践中，具有着“旗帜”性的号召力量，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审美需求的喷发焦点，任何需求和消费的呈现和表达，只要沾上生态话语，就能立即获得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的“豁免权”。所以，生态话语、大众文化的生态政治，进入到电影领域，特别是以科幻题材电影的形态来呈现，不过是上述时代逻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又一次“终结”

——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功能

《2012》《阿凡达》作为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它们同时也吹响了拉开中国电影百亿票房时代帷幕的号角。两部影片尽管各有侧重，但生态话语无一例外的在其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部影片也代表了受生态话语左右的科幻题材影片中的两条基本脉络：即《2012》所代表的灾难类科幻影片、《阿凡达》所代表的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这两种科幻题材影片的基本类型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延续，并承接和回应着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毋宁说在映像着这个时代的焦虑和绝望。在两部影片中由生态话语所牵引的，与其说是生态灾难所导致的“逃亡”，不如说是在 2008 年之后，后全球经济危机时代，中产阶级所恐慌的，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日常生活”。

《2012》所代表的灾难类科幻影片，在“十部进口大片”时代的《未来水世界》就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在1990年代中期，就把两极融化后，以人类对淡水、食物、资源的争夺等角度切入的可怕后果予以完整地视觉呈现，即便是对于当时的好莱坞观众而言，也实在是太过震撼和刺激，但如前文所述，这也不过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之一，生态话语正是在那个阶段开始具有了不言自明的“先锋”性。因此，到了十年之后的2004年的《后天》，则是水到渠成，甚至已经不再具有太多原创性，从两级融化到两级冰封，仅仅是同一类型的反向呈现，异托邦的门槛在逐渐降低，其寓言性也大打折扣。只是因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同一导演操刀的同一风格的《2012》由于准确、及时地踩到了这一时代节点，视觉奇观意义的灾难类科幻影片才又在这个时代风靡一时，由生态灾难构成的异托邦成了在市场上最“安全”的题材，因此也难免被这个时代所驾轻就熟。

而《阿凡达》所代表的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则接续了从1977年以来的《星球大战》系列，这一系列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几近科幻题材影片标杆的地位，也为《阿凡达》等作品做足了历史铺垫。尤其是当冷战谢幕之后，后冷战时代的《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所探索的外层空间，更是成为了新世纪版本的现代怀乡病的最佳载体，也全都被赋予了超越现代文明的意义，具有了审美上自明的绝对合法性，这一类作品自然也毫无例外地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史诗化风格。但以《阿凡达》为例，其实我们只要稍加聚焦，就不难发现：对《阿凡达》中潘朵拉星球的纳威族，和《与狼共舞》中的苏族印第安部落、《澳大利亚》中的黑人土著人相比，在形象刻画上实则并无二致；而《阿凡达》的灵魂树，和《与狼共舞》中的图腾崇拜、《澳大利亚》中的“奥兹国”，也太过异曲同工。这些外星探索类科幻影片中的星际空间，只不过是《与狼共舞》到《澳大利亚》这一涉及少数族裔脉络的众多影片，所一直标榜的文化多样性的星际乌托邦版本——当地球已经在劫难逃的时候，还有优美的星空可以作为诗意的“远方”。

在上述两种非常主流类型的科幻题材影片中，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与人类社会、人类活动都被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自然和宇宙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能够完成自

我调节的有机体系；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原罪”色彩，之所以会出现生态危机，正是人类社会的过分发展干涉了、打破了原本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自然、宇宙的法则与秩序。这几乎是当前科幻题材影片呈现生态话语的“标准格式”，当下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几乎无一幸免地通过将自然、将宇宙予以诗意的符号化，将现代意义的人类社会、人类活动与自然、与宇宙的关系，以几近二元对立的结构安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而一步步完成对当下身份认同的重构，而人类“现代”的积极意义也因此被无视和遮蔽。所以，真正有价值之处在于，就是在这种对“现代”的意义重构中所刻意遗漏的因素，这些科幻题材影片通过生态话语所呈现的想象性的“再现”关系，是如何被演绎成理应如是的“真实”关系的？也就是说，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在竭力遏制哪些因素？这才是我们揭开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功能和逻辑的秘密的关键所在。生态话语毫无疑问是这些科幻影片中，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相冲突、相矛盾时最为重要的“粘合剂”，但它所试图弥合的世界观、价值观困境，其实也恰恰是这些由生态话语所支配的科幻题材影片的最大症结所在。

无论是《未来水世界》《后天》《2012》，还是《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贯穿于这些不同线索的科幻题材影片背后的，由生态话语驱动的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关系的二元对立式的二分法，其实只不过是在这个年代畅通无阻的全球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文艺“变体”，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一体两面：在经济上，市场和自然、宇宙一样，都是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有机体系，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政治上，国家只能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丝毫不能干涉市场的环境和秩序，就像人类应该遵守自然和宇宙的规律和法则一样。市场、自然、宇宙，在这里具有相同的语义，具有着万法归宗的神谕式效应。

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功力还远不止于此，它还以当下的生态话语为节点，充分消化了在启蒙时代，就已经蕴藏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因素，也就是与科幻题材差不多同时代诞生的，对自然的崇尚和对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抵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例如以在大众文化领域经久不衰的《瓦尔登湖》为代表），而且还完成了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的更进

一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态话语中，自然逐渐上升为具有“神性”的存在，人类在自然面前已经“沦为”只能听命于开始具有“神性”的自然法意义的“原初”生命。这的确颇有些颠覆性效果，毕竟在启蒙时代完成的由人取代上帝作为世界的中心，被自然作为世界的中心所替换——回到前现代的社会共同体之中，恢复传统的等级秩序，这不正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格局下的典型的政治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么？《云图》就是最为经典的例证，由6个彼此形成互文指涉关系的文本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在经历了煞有介事的九曲回肠之后，其所召唤和还原的，正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原初”自由。因此，在这个逻辑下，无论是过去政治意义上的征服大自然，还是后来经济意义上的资本扩张，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某种“原罪”式格调。那么在这些不同层次、角度的“原罪”之外，包括科幻电影在内的各门类文化艺术实践中，如何以“现代”的逻辑，而不是以前现代的逻辑——实质上是人为制造的看似“天然”的所谓的传统的逻辑——进一步深入到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展开批判，进而修正甚至引导大众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最终进入到对现代性逻辑内部，对不同阶段的现代性的历史代价进行有效反思？而不是在表面上对以自然为喻体的星际空间进行诗意符号化，而实则以前现代价值作为这种生态话语的肌理。



电影《雪国列车》（2013）剧照

因为如若以这个逻辑来演进，那么这些由当下生态话语所包裹的所谓的前现代“美丽”乡愁，恐怕只会让以“自然”为名的星际空间，再度被他者化，而且还将离我们越来越远；更进一步的艺术探索，也都只能停留在这“诗意”的抗争姿态中为止，我们也还将再次深陷到大众文化的精神分裂之中。这也是这个时代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支配的大众文化领域到目前为止，尚无法摆脱的时代痼疾。作为最晚近的“发明”的生态话语，在这里，却发挥着上一个年代都没做到的历史的“终结”作用。

没有明天的“清醒”梦境 ——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困境

如果我们想充分讨论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起源、功能和困境，其实离不开对当下以全球新自由主义为表征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和批判。如果仅就价值角度而言，其实《雪国列车》无疑更具代表性。《雪国列车》中“破雪者号”环球列车封闭的列车环境，将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局”。这个“死局”正是理性被推向极致后的“疯狂”，而革命的意义则在这场极致理性的“疯狂”中，仅仅是理性的副产品——革命不在具有任何进步意义，仅仅是理性自我调整的“节拍器”——这即便在异托邦视野中，也是非常大尺度的呈现，革命在最后和理性一起走向了绝境，或者说，革命成为了理性的殉葬品。那么超越性的意义由谁来赋予？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述，无疑是生态话语所操控的“原初”自然，新自由主义正是藉此完成了“狗咬狗尾巴”式的循环论证——我们此刻正陷入在一种最为“清醒”的梦境中。

在《雪国列车》中，人类为了逆转温室效应而向大气层中散播制冷剂反而沦陷为“雪国”的境地，是这个时代由生态话语驱动的科幻题材影片的最为形象的隐喻。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性进步装置，这是现今的一般共识，正如本雅明所言，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在今天的情境下这一切可能恰好相反：也许，革命是火车上的乘客——即人类——去启动紧急刹车而所作出的努力。¹显然，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加速、

1_ [德]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04期。

不再是过去意义的“进步”，而是至少要给现代性的发展减减速、看看路，并以此寻找开启未来历史的真正有效节点。这也直接意味着我们该如何处置在这个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进步装置中的主体位置，也就是在当下的境况下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主体性，才能让这个进步性装置放慢速度，乃至改变方向。然而遗憾的是，在《雪国列车》中，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操控的自然，在取消了已经彻底走向疯狂的极致理性的合法性之后，也连带着取消了革命的意义。影片中柯蒂斯领导的底层挑战强权压迫的革命，最终只被赋予了技术性的价值，他们的反抗和牺牲不过是现代性进步装置中自我调节的“安全阀”和“刹车片”，也就是通过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二元对立设置，取消了这个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进步装置中的主体位置。所以，在今天被新自由主义话语所包裹的中产阶级主体们，就只能被“拘禁”于这种生态话语的“穹顶”下，毕竟对当下的中产阶级趣味群体来说，想象地球的毁灭远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由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操持的科幻题材“艺术作品，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通过象征，将不断的变动固定化的同时又保持其变动性，进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动荡和资产阶级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一个事实上的矛盾被转化成了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使形式合乎逻辑地诞生于其内容的运动，尽管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分裂世界当中，情形完全并非如此”。² 由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所把控的科幻题材影片，就是以这种方式 and 逻辑完成了在当下语境下进退有度的“障眼法”和“易容术”。就像吉登斯所说，“全球变暖带来的风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³ 因此“吉登斯悖论”，对全球中产阶级来说还依然奏效，他们自我想象的边界在这种“精神价值”的指引下，被予以了精耕细作地框定和标识。

以科幻题材影片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早期的以30年代的《未来的事物》为代表的，对科技改变未来式的进化论式的科幻史观开始产生质疑的影像追问，还是二战后以《宇宙

2_ [英] 特里·伊格尔顿《资本主义与形式》，《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人民出版社2011年。

3_ [英]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静悄悄》为代表的反思性越来越强烈的，通过异托邦的视觉呈现来构建的各个角度的文化反思——它们所始终都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前沿性和展望性。只不过这一切，在今天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我们被完成循环论证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牢牢地禁锢在“今天”，这恐怕是远比“囚徒困境”还要难堪的境地，因为我们即便完成《星际穿越》般的壮举，也依然是在“明天”回到“今天”，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最精简训诫，也就是相信“今天”。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打破的枷锁，就是要打破将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的关系置于二元对立式结构的二分法。因为，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开启了现代性进程以来，自然就从来就没有外在于人类社会；或者说，当自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来，人类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更是产生了根本性乃至毁灭性的影响：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人类彻底以人类的方式改造了自然，也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系统。这也构成了“人类世”概念的起点和结论。事实上，我们就是不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调节机制的自然，也是很难客观存在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突变、灾难等事件，才是真实的常态——这其实更接近“原初”意义的“崇高”概念，只不过这显然被选择性无视了。新自由主义的“审美话语的全部任务，就是弥合资产阶级秩序本身所特有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裂隙，这种裂隙在其他地方也体现为该阶级道德和文化领域的壅滞与它物质世界的变动之间的分裂”。⁴今天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下所勾勒和描绘的自然，不过是在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提供“自然”的理由，使新自由主义国家的阶级、民族、性别关系也能披上“自然”的外衣，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式的“原初”秩序权威，一切社会等级关系都因而被披上了生态话语的外衣，呈现出“自然而然”的样貌。这就是推动当下科幻题材演进的新自由主义生态话语的全部秘密，它在我们面前，以一种最为激进的“保守”形态出现，是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和幽灵。

与国外特别是好莱坞科幻题材影片相比，我国的科幻题材影片的缺失还很突出，我们还缺乏真正内嵌于中国社会的科幻意识，本土科幻题材影片至少目前并未为当下中国提供

4_ [英] 特里·伊格尔顿《资本主义与形式》，《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新的文化认同，本土科幻题材影片也并未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荣膺“雨果”奖，中国式科幻题材影片在如今如火如荼、已近疯狂的产业大潮中自然也不能免俗，大致在明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版《三体》势必将掀起一波不会短暂的中国式科幻题材影片浪潮。那么能否表达现代中国的经验与情感，能否为我们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难以名状的集体无意识化境、赋形？如何在当代世界电影的发展与当代文化的结构中把握中国科幻题材影片，它在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和命运？这些都构成了在我国科幻题材影片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密切关注的筋脉式问题。

结语：“看”不见的未来？

综上所述，在今天，生态话语，的确和我们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它也因此获得了接近垄断性的价值感召力，但在这种实则为循环论证式的新自由主义道德修辞背后，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时代所开启的生态话语的前瞻性和建设性该怎样落地？生态话语该如何协调与人类的“现代”的基本价值的关系？生态话语如何摆脱看似激进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态？这些远未被触及的时代症结也为我们理解当下科幻题材影片提供着这样的历史启示：以科幻题材影片为历史标的，在对生态话语的探索和实践，科幻题材影片能不能从前现代的“美丽”乡愁向“现代”风景再进一步深入迈进，在“现代”意义上正面、直面人类的“现代”的价值和种种“现代”的代价的考量和拷问？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具有着世界电影史的意义，对于我们当前的整个文化艺术实践而言，都将是一道关乎着能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挑战——在以生态话语为症候的这些看似最激进的“保守”形态所构筑的新自由主义“铁幕”下，这直接意味着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得见我们的未来，甚至连科幻都很难想象出一个明确的未来，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恐怕都将是一个叹为观止的“奇葩”历史周期 

试论 20 世纪革命辩证法节奏分析 ——以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为中心（上）

沈光铉 *

高瑜 _ 翻译 林春城 _ 审阅 **

一、序论：历史的反复和差异

1989 年以柏林墙倒塌为起点，开始了东欧圈的瓦解。1991 年苏联解体，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暂时回到废墟状态的中国在 1992 年发布了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宣言，这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开始了全面的交流。动摇了整个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落下了大幕。（在后面，针对 1992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这个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个观点也是本文中几个重要命题之一）。1992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开始，以及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浪潮，使得整个地球受到了这股浪潮强烈的冲击，“历史的终言”，“再无替代方案”（TINA）这样的口号标语席卷全球。90 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蒸蒸日上，这一口号在全世界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长盛不衰的世界资本主义直面了 2007-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 2010 年欧洲金融危机，现在正面临着更严重的危机。虽然有些人将这次危机局面看作是大恐慌的开始，但是大部分学者预测危机会立刻演变成世界的大恐慌。因此，知识分子和大众对资本主义的信任急速下降，这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十分相似。也必然会产生“再无替代方案”的口号。

* 沈光铉（SHIM Gwanghyun），韩国艺术综合学校影像理论系教授。《文化 / 科学》咨询委员，韩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著有《Ubiquitous 时代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政治》《兴韩民国》《文化社会和文化政治》《后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研究》等。

** 高瑜，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学科博士生。林春城，木浦大学教授。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不得不面对同一个世纪前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能否通过自身的革新来克服危机，抑或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结果这一问题在一时间成为了被忘却和被压制的“未解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克服没有解决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课题。历史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些用来克服矛盾的革命方法是否适合，这一问题再次以极具戏剧性的色彩回归到世界舞台上。21 世纪的历史和一个世纪前拥有同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表现出的历史的反复看起来是一件有些荒唐的事情。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的一个世纪内产生了许多差异。资本主义与一个世纪前不同，站在全球角度上资本主义完成了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与自然实质上的包容”。相反，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处在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抱有希望，然而社会主义革命背叛了大众的期待，遗留下了很多的噩梦，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因此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和一个世纪前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危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世界史问题的反复，不得不使我们考虑一个世纪期间产生的重要的差异，和‘历史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历史的反复和差异”。

历史是单向的线性发展过程，而‘差异和反复’这种非线性的节奏像波涛一样此起彼伏，冲突着交错着，爆发解体再产生新的节奏，这就是要用辩证法的过程来看待‘差异和反复’的原因。要想解决现今的历史问题，我们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历史进程中内在的辩证法节奏进行充分和详细地考虑。从这一观点来看，20 世纪“历史社会主义”不是完结的废墟的决定体，充斥着成功与失败的多层节奏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这种重叠的方式是辩证法的过程。（沈光铉：1）

历史在反复，又在反复的过程中出现节奏独特的差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体上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所谓历史的反复，一方面是伴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的规律而形成的，一天和四季的交替变化产生的节奏是自然的反复。与此类似的是，世界水平出现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吻合周期性节奏（假如，“M-C”局面和“CM’”局面的反复和差异是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膨胀过程中形成的长期的节奏）。不仅如此，历史在反复中表现出的差异是资本和劳动的地理移动和在此过程中呈现的多样形态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资

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资本和劳动，资本和性，资本和生态界之间的是敌对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重层化的，人类将面临着比自然界节奏反复还要严重的冲突和混乱。按照上述的说法，那么分析历史辩证法的节奏时，关键问题取决于如何把握资本积累的伦理上产生的结构的矛盾，和为解决这些矛盾而产生的人类斗争之间的辩证法。

从这些原因来看，以多元观点对 20 世纪“历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失败进行检讨时，首先要该考虑的问题是复杂矛盾的辩证法节奏相互重叠的局面，下面将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1）第一个角度，地理上有许多不均衡的生产方式，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残留的封建制方式和新兴的方式）就存在着支配力与被支配的生产方式的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众多生产力重合之间的矛盾辩证法；2）一个社会构成体内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3）超越一个国家的范畴站在世界体系的角度上，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对立和相互依存的统一性的世界体系水准间的矛盾辩证法。

以这三个侧面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便是宏观辩证法角度上我们该如何理解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俄罗斯爆发革命当时考茨基和列宁 / 托洛茨基的论争，在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展开的论争和权利争斗，以及共产国际内部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前面提到的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在过去的 20 年里，这个问题作为过去的历史问题已经被解决消灭，从这个视角来看，把过去 20 年看作是《历史的终言》的开始，这种视角是具有支配性的。但是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这样的视角就不具备了说服力。然而过去的 20 年虽然还没有政体性，但是可以被认为是暂时现实化了的某种长期节奏间奏曲，提出这样问题的摸索世界史角度自身的变化更具合理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席卷 20 世纪的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再评价。

代表着第二国际的考茨基谴责这场从 1918 年开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存在巨大的失误。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整个欧洲革命为出发点，俄罗斯大胆地主导了整个欧洲，来试图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来发动起义。”但是这种假想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革命是在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因为西方的社会关系和俄

罗斯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同。考茨基的核心的批判观点如下。

- 1) 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 2) 1917 年俄罗斯社会还不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 3) 通过兵变强制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尝试，这种革命作为杂交社会构成体是不能够存在的，因此必然会宣告失败。
- 4) 这样的杂交构成体无论如何都存在着不安定性，经过短暂的时间即会坍塌。

考茨基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一旦形成就会在瞬间掌握权利，随之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首先没收资本不是单纯的权利问题，虽然不难，但是对相对而言尚未成熟且没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来说，没收资本以后，组织生产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为了捍卫产业，新的管理阶级就要补充上来使用权利承担起统治权。从此以后，摧时毁旧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形态的“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即代替私有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考茨基的批判作出了反驳，反驳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指导者的考茨基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意。强烈谴责并超越第二共产国际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 / 机会主义，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世界化为目标创立了第三共产国际。

此后的历史验证了考茨基忠告的正确性。但苏联没有像考茨基预言的那样“在很短时间内灭亡”，延续了 74 年。正因如此，1991 年年末直到解体之前，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都围绕着苏联的整体展开地理的论争，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堕落的劳动国家”，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不具备任何特别生产方式的杂种构成体。直到今日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从一国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论争有一定的局限性，整理起来不仅有难度而且没有意义。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尔什维克革命和世界革命间的连续性前提的列宁时代，和 1929 年大恐慌之际，从世界革命到一国社会主义转换的斯大林时代差异折射出俄罗斯和资本主义世界体制间关系变化的生动过程。这种情况也可以反映世界的（一国的）生产方式水平上辩证法的复杂关系。

从这种中间观点来看，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不能保障欧洲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和古巴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对西方资本主义中的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得以形成给

予外部的压力这一点，很难得出考茨基对其全面的评价是准确的。再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革命失败后促进向改革开放的转换，也加强了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间的交流，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说明中国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苏联和东欧？进一步来说，这样的问题引发了 1992 年以后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延长线上的疑问。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功过评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领域，李泽厚当属独一无二。1986 年他在一篇论文中批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存在的问题，他的观点与考茨基类似。他认为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没有资本主义历史前提，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以这样的方式勉强进行转换，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结果在文革以后，人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怀念和纪念五·四运动。李泽厚论点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的革命传统是“在长期严峻和痛苦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笔者：1927~1949 年之间的革命战争），“让一切都服从反帝革命斗争，铁的纪律，统一的意识和集体的力量”。李泽厚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借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得以发扬进而反对资本主义”，“主张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每个人都要与个人主义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要像尧舜一样成为道德君子”，最后“将中国意识看作是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途径”。（李泽厚，80~83）

李泽厚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也强调了以后应该拥有的态度。“国家富强依然是中国人的根本任务，然而启蒙和救亡的关系是与军事形势和革命时期不同的。今天已不再是强调领袖统帅意志和绝对服从的战争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时代的任务迫切地被提到了日程表上。”五·四以来康有为－严复－陈独秀－胡适等西方学派主张“全盘西化”，从章太炎到梁漱溟的国学派越过“中体西用”的片面性立足过去和现代融合的“西体中用”（李泽厚，537~538），提出中国应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除此之外，“近代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不是思想教育和正心修身，而强调可以用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这些“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民主和自由，认为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革是必要的。（李泽厚，97~100）

另一方面，对李泽厚关于中国革命评价的批判声音也不少。未经过文化革命时期的青

年学子们对现在中国的现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理想化毛泽东思想，有意识得回避其思想的否定的一面和错误，甚至否定那些毛泽东思想否定和错误的部分。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下层斗争逐渐增多，这些斗争越来越多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指导和旗帜（钱理群：1，427）。关注围绕着评价中国革命所产生的这些对立的局面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评价就是 21 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任务，以中国的方式解决这个任务对东亚地区，或者对世界体系的变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考察该影响是不能与对立局面分开的。

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与 20 世纪世界史的展开紧密相连。多层次多角度广范围的对相关全部历史论争进行系统地再评价需要长期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作为事后的课题被遗留下来，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过渡问题的众多争论中，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步改革和革命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局限性，通过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比较的方法来进行考察，是一项长期的研究。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履行的问题存在种种争论，这些争论中只限于研究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渐改革和革命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比较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方法，为了长期研究需要限定构成方法论的“问题框架(problematic)”(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

(1) 曾左右 20 世纪的世界史方向的两场革命均已失败告终，但是对预测将要到来的 21 世纪的世界史的变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在基础内部或内部和上层建筑之间，抑或一国的情况和世界的情况之间，复杂矛盾的辩证法“战争－革命－改革”间的辩证法节奏反复的问题出现了。这一问题包括了两个必要性，第一，有必要与过程相关联，从新的角度对时间空间和节奏概念进行自身调整。第二，有必要从基本的“历史唯物论”的问题框架向“历史地理生态科学”的立场扩张（沈光铨：2，85~101），对“民族－国家”，“帝国”和“帝国主义”以及“亚洲”这样的地域概念自身进行再评价。特别是所谓“历史地理生态科学”扩充的一些问题，再次反应了在 20 世纪俄罗斯和东北亚地区（韩－中－日）曾出现的多种多样形态的‘革命思想’，并对研究提供了帮助。

(2) 马克思曾预言在 21 世纪将实现“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实质的包容”，完成生产方

式过渡的问题，它不像 20 世纪以“前 - 资本主义 → 资本主义 → 一国社会主义”那样重叠过渡的复杂方式进行，明确地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 → 全球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再定义” (Redefinition) 最接近的理论 - 实践的问题就被赋予了全球的视角。

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一般来说稍显生疏，首先从本文中核心概念“辩证法节奏分析”意义的设定开始论述。

二、辩证法节奏分析的前提探讨

列斐伏尔在《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法语原作 1992 年出版）一书中对现代思想物化的过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批判涉及到形成，运动和移动性的相关研究，列斐伏尔认为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有必要从节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地再分析。他强调“节奏分析”是一种“需要确立的新的科学”。他指出很多人混淆节奏的生成运动与拍子，节奏首先是反复的问题，因为绝对一致的反复只存在于虚构里，反复就会常常产生差异。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明确反复和差异的根据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反复和差异的关系在实际存在的节奏中被发现和再确认。反复和差异的根基不是双重的，而是三重的，即寻找三者之间的辩证法（例如，黑格尔的命题 - 假命题 - 真命题，马克思的经济的 - 社会的 - 政治的命题）：“时间 - 空间 - 能量的三项式”和“旋律 - 和声 - 节奏的三项式”（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5~12）。

这一观点说明世界上惯性的没有节奏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有一切（与我们相关联）都伴随着或慢或快的节奏（列斐伏尔，17）。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和到处呈现的正确连接的能量就是所谓的节奏。以这个观点来看，四季的变化，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臭味和香气，声音，人类的语言和行动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一定节奏的。只因为我们的注意都集中在了目标事物当时的外形，从而忽视了流动着的节奏（列斐伏尔，18）。

列斐伏尔把这些节奏分为“复节奏”（polyrhythmia），“和谐节奏”（euryrhythmia）和“不和谐节奏”（arrhythmia）：

(1) “复节奏, 以人为例, 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 从第一次用耳聆听开始就体现了“复节奏”; (2) “和谐节奏”是健康状态下, 许多节奏统一成一种节奏; (3) “不和谐节奏”是在病态或痛苦状态中表现的分解的节奏(症状, 原因或结果)。

分析这三种节奏不仅要从医学, 历史, 气候学, 宇宙论, 诗等学科进行分析, 还要生产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类似这的多样类型的实践和知识(列斐伏尔, 16)。从这种区别起, 病理学的问题就变得清楚起来, 通过不和谐节奏的介入, 客观目标也更明确了。也就是强化或再确立了和谐节奏。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东方的医学实践比西方的医学更接近于这一节奏。列斐伏尔主张与其说是治疗性的, 不如说是预防性的。特别与社会关系以及连带问题相关的节奏分析也受用。因为如果在时间和空间的发散和能量使用方面, 连带以相异的节奏间的和谐节奏(eurhythmia)为前提的话, 那么纠葛就以不和谐节奏(arrhythmia)为前提。

依据列斐伏尔的主张, 所有事物都是有节奏的, 马克思指出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是自然史的过程, 作为历史过程的主体, 可以假定作为一种独特的节奏(以和谐节奏作为标准, 维持持久性的过程中, 和谐节奏和不和谐节奏呈现出对立的节奏的运动)。因为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从很久以前开始, 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和复杂的机制为媒介而形成, 发现了资本主义固有的一些节奏, 这件事是为了恢复我们身体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病理或病理状态所必须的。列斐伏尔从这些观点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固有的节奏, 资本主义(一切存在: 事物, 人们, 民众等)的生产和(通过战争, 进步与革新, 暴力的介入与投机)破灭的节奏(列斐伏尔, 55)。但是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解释, 而集中专注于日常生活的节奏分析, 解决具体的问题。他断定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发现节奏”(列斐伏尔, 7)。

然而与列斐伏尔的断定相反的是, 马克思曾努力发现资本主义内固有的节奏, 在《资本论》一书中, 超出对资本主义固有节奏的现象的记述, 查明了复杂的内部规范。因此唤起列斐伏尔强调的节奏分析的重要性, 重新在全球视角下, 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宏观节奏和由他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微观节奏之间的关系, 为了找出这些节奏的再调整, 他脱离了停留的支点, 回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和老师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一起著述的《读

< 资本论 >》一书第三部第四章《过渡论的要素》里，对反启蒙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效果的固有节奏的要素做了如下分析。

“让马克思能确立一般性平均利润率的存在和其水平的所有推论依存于如下的共时性 (synchrony, 马克思说成同时性 simultaneity); 将所有资本按部门增加是依靠正义可以实现的。但是事实上，它封锁了圆环，因为导致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在其内形成的机制的是利润率的倾向性下降。资本之间的竞争，即利润均等化和一般利润的产生。……一种倾向不仅仅是所有效果的生产，也包括根据单独的节奏生产效果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结构的发展是结构单独的内部时间性的定义，也是结构自身分析的一部分。(巴里巴尔 Balibar, 371)

马克思对自具有自身内部节奏的资本主义内部时间性的记述如下。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利润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或利润绝对量一直在增长。因此总体上可变资本和利润两者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一致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者的作用，只有在总资本增加比利润率下降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巴里巴尔，引用 327 页，《资本论》第三卷，英文版，219~221)”

马克思所谓的定式是“剩余价值率，即劳动剥削率的上升和结合利润的下降趋势”是矛盾关系的统一，巴里巴尔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固有的局限。对《资本论》的分析中包括对局限的论述，认为使相异的时间连贯起来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相异的时间”- 长期持续，短期持续，连续性，断续性，分割的时间（劳动时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由于资本相异的诸多要素的回转速度是不均等的，表现的许多循环的循环，即复杂的循环。马克思引用了西斯蒙蒂的例子把复杂的循环描写为螺旋运动，是一种时间等的动学。在相异时间的机械构成分析中，把找到的分析经济结构进化的时间便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本质的对象”（巴里巴尔，381），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可能的。这样的解释具有通时性，可以看做是单一线性的时间性。但是巴里巴尔批判这种意识形态解读时全部无视《资本论》内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概念的自身构成样式的解读方式，对此主张“在相异的社会，生产诸多部门间关系的共时结构”就是《资本论》的核心伦理。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考察相异的个别生产循环的编制。（巴里巴尔，380~383）。这种

方法不是经验论，或黑格尔的“历史结构是依存时间结构的”方法，而是“时间性的结构是依存历史结构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时间的综合概念“并没有提出，无非是结果。”（巴里巴尔，384）。从这一观点出发，巴里巴尔提出的生产方式的共时分析形成的时间不是直接的无媒介的历史的产物，以社会的必要劳动和社会的不必要劳动间的区别为基础，强调该时间是劳动时间的诸多相异的时间。

“每个瞬间劳动生产性和社会劳动依存于相异生产各部门之间分割的比率，因此这与劳动者的在劳动过程中通过经验观测的时间不一致。与此相似的是，具有相异的契机（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和固有的诸多效果（货币资本的长期流出，利润率的变化）的资本回转循环的时间也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资本的形态为基础而构成。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倾向的分析也根据同样的方式进行，产生了生产力的进步是依存于资本积累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生产力的时间性的概念。这个运动就能体现我所主张的动学。即运动是结构内部的积累运动决定发展的运动，结构依照固有的节奏和速度而进行，有一定的必然和不可逆的方向性，即使一个结构的特性规模发生变化，也是可以无限地保存的（再生产）。资本积累固有的节奏印刻在了危机的循环中，固有的速度‘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总之，表现了结构内部结合的二者关系的相互制约，这一速度如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加速的舒缓下来。运动的必然方向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消费手段的生产和相关的生产手段生产的增加）。结构所有特征的保存，特别是在市场的扩张中明确地显现出来。”（巴里巴尔，385~386）“这样（生产和消费间）内部矛盾消解成生产的外部场。然而，发展生产性的，越来越依靠消费等条件，这与狭窄的基础构成了矛盾。”（巴里巴尔，386页，引用《资本论》第三卷，英文版，240页）

“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各个部门整体年龄的只属于动学的‘时间’范畴，动学时间能够评价和决定逐渐发展还是后退。”（巴里巴尔，386~387）“以这个观点来看，如像印度这样的非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欧的资本主义接触形成的事件不属于动学事件，只是印度社会的性。”（巴里巴尔，389）

巴里巴尔强调所谓结构共时性的动学的时间，对把握过渡期的时间特性具有危险性。这个事件不是的连续的时间，而是经济结构，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时间之间的冲突，通过一致的契机表现出来（巴里巴尔，389），不过属于原始积累的，如“血的立法”一样的政治事件的介入，与被生产方式的局限受支配的介入不同，产生了将生产方式的局限本身变形和固定的效果。

“（资本主义时代具有的原始积累）几种方法依存于流血的经济力的使用，这些方法无一例外。为了促进从封建经济秩序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快速过渡，缩短过渡局面，使用作为集中组织社会力量的国家权力。实际上强制力在所有孕育着新社会的就社会中被催生出来。强制力是强制的担当者。”（巴里巴尔，395 页，引用《资本论》第 1 卷，英文版，751 页）

巴里巴尔针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如下的解释。过渡期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形态体现了与经济结构相关联的，和逐渐增多的背离运动。在这里出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异的各水准间的非对应形态。诸水准间的对应不存在一般的形态，只存在诸形态的变异，形态的变异依存不同判定等级，如有些依存判定等级的自律性的程度和他们之间的相互样式。因此，过渡期是非对应的状态，具有几个生产方式共存的特征。假设制造商的生产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两个生产方式共存或上下关系。相反，近代的产业是一个生产部门在其他所有生产部门里迅速繁衍。因此，过渡期各种相关判定级别之间的背离反应了在“同时性”里两中生产方式的共存和其中一个对另一个的支配。这也认证了历史的通时性的问题反而需要在理论的“共时性”里来考察。（巴里巴尔，396~397）

“过渡和各种形态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生产方式自身的共时性，包括许多体制和诸多体制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列宁认为处于社会主义过渡初期的俄罗斯是不平等发展的，那一时期有五种生产方式共存，组织支配上下关系）。分析支配关系是为了改进马克思的意见，这也给后来继承者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巴里巴尔，397）

整理以上的论争，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内部节奏，即结构共时性，下面将从结构共时性表现的各时间的一致和冲突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一)所谓“剩余价值率(劳动剥削率)的上升和利润下降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动学,动学从长期宏观的世界体系的水准来看,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分析为长期持续的节奏,也就是在一个地区领导权长期持续的中断,向新的地区移动,产生了领导权移动的最大的节奏。这种长期节奏里包括了很多重叠的小节奏。

“天体一旦进入某种特征运动,与这种运动不停的反复进行一样,社会生产也同样是一旦进入扩大和缩小的交替运动的话,就会一直不停的反复运动。结果是成为了原因〔不断产生自身的条件〕,整体过程的交替使局面获得了长期性的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798)

“发生和下面相同的事情后,就开始了自身永久的反复循环(包括几年内的循环局面,循环常常在一般危机中达到顶点,一般危机不仅是一个循环的终点,也是另一个循环的出发点。)”机械工业被确立,对国内的生产整体产生了支配影响,伴随着机械工业实力的强大,海外贸易开始超越国内商业,涉及世界市场的广大领域,新大路-亚洲-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工业国加入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到现在为止,这样的循环周期为10~11年,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周期是不变的。反而相反我们现在说明的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规律是可变的或逐渐缩小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原著798页,法语版补充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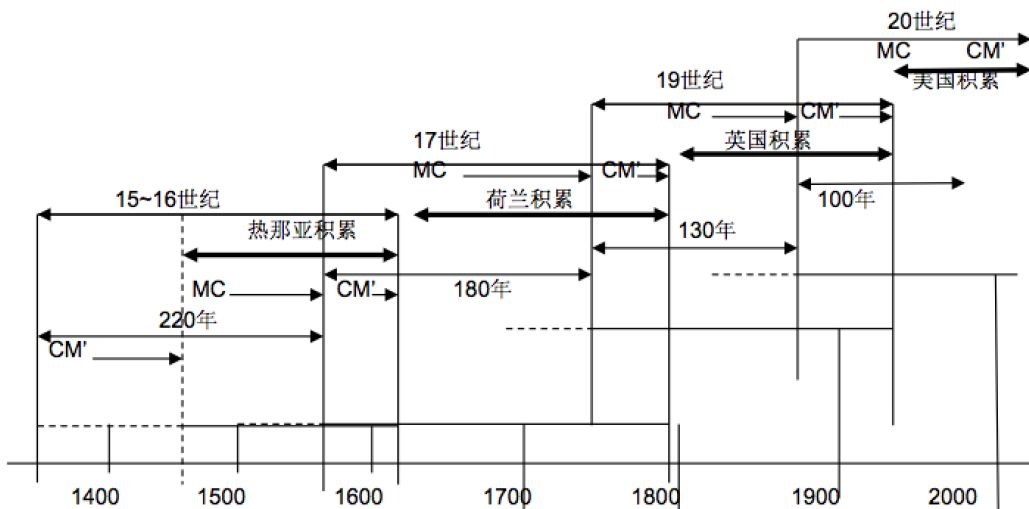
乔万尼·阿里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按照马克思资本循环公式,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研究进行了再构成。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地理膨胀过程中,能找出四次领导权循环的模式。

“马克思资本的普遍定式(MCM')是个别资本家的投资伦理,也解释和描写了作为世界体系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反复面貌。这些面貌的核心侧面是事物的膨胀与金融再生以及膨胀局面(CM')的交替。……这是合成的两个时期,也是两种局面,构成了一个完成体系的积累循环(MCM')。”(阿里吉:1,38~39)

“明确四次体系的积累循环……他们是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热那亚循环,16世纪末至18世纪大部分时期的荷兰循环,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英国循环,和19世纪末至现行持续金融膨胀局面的美国循环。正如蕴含的这种大体存在的时期区分,连续的体制的

积累循环是重复的，虽然持续时间渐渐缩短，但是每个循环都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因此提出‘漫长时期’的概念，这种分期是在分析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中，采取最基本的时间单位。”（阿里吉：1，39~40）

阿里吉对 500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积累循环的描述整理如下：



（《漫长的时期和体系的积累循环》阿里吉：1，370）

通过这样的方法阿里吉成功的预测了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后来又扩散到欧洲形成欧洲的金融危机，这是现在美国领导权的“漫长时期”落幕过程的明确标志。这一过程同前三次领导权交替过程一样，领导权将从美国移向另一个地域，或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退出历史舞台，转换为另外一种世界体系的过程。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原著 2007 年）这本书中，记述了中国可能成为领导权（Hegemonie）交替新中心的理由：（1）中国通过革命，比其他地区更广范的确保了高质量的劳动资源，这样形态的劳动革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2）中国与印度不同，起步开始就将重点放在了农业革命，成功地最小化了内部贫困层的比例；（3）过去，领导权从曾是城市国家的热那亚 / 威尼斯，和领土国家中间阶段的荷兰，到领土国家的英国，之后向大陆规模的美利坚移动，从这个实例来看，拥有美国这样水准领土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领导权国家，中国领土广阔，

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具备成为候选者的资格；（4）历史上领导权的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而中国不以向外部扩张能量的西欧方式来发展，具有向内部紧缩的倾向，正因如此可能会实现权力的和平移动。（阿里吉：2，第12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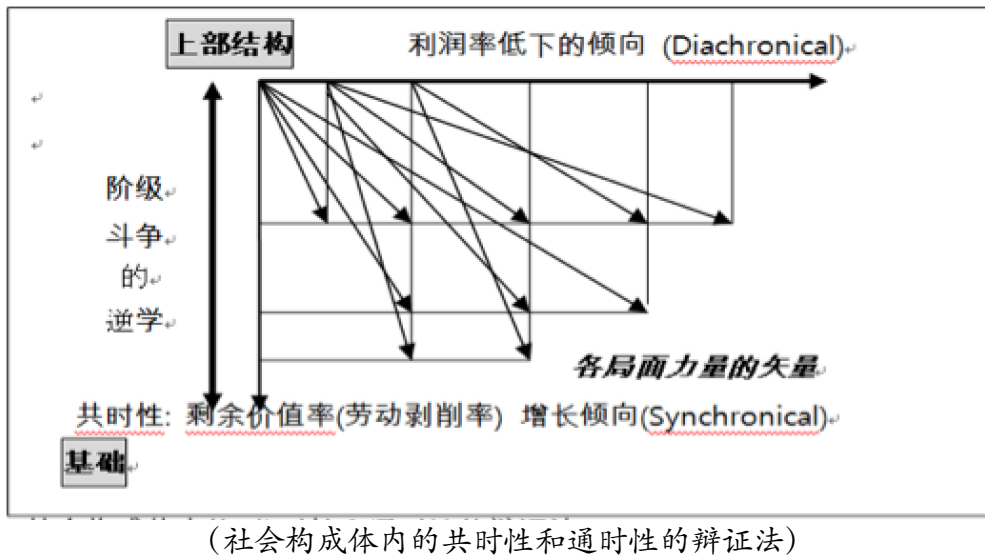
但是美国和欧洲积累的军事和国家力量，他们会不会让权力和平移动，对此还是不确定的。即使有那样的情况，但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依据阿里吉的秩序说，世界经济的持续可能就更加的不确定。阿里吉的剧本是不可靠的，原因如下：他虽然活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公式，但是他立足于将资本主义的实体看作金融膨胀、将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定于食物生产和流通而思考的亚当斯密－布罗代尔的观点，将所谓“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非现实性构图从头至尾一直推行。正如马克思的解释，“布罗代尔和斯密认为的‘透明的市场经济’只是布尔乔亚经济学假定的一种假想。在市场经济良好运转事物膨胀的情况下，利润率的恢复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可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工具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地榨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国家工具通过阶级斗争和统治调节意识形态来实现这种积累。实际上，这个加了‘括号’理论化的积累循环就是阿里吉所提出的问题。”金融膨胀的局面下，由于资本部门间的转移，激化了各个级别的阶级斗争，资本的地理转移激化了国家间的竞争。积累的也造成了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和权力解体的局面。这部分也就是前面拉斐尔所提的生产和破坏反复节奏的具体内容。

阿里吉捕捉了跨越500年的权力解体 and 再形成的宏观长期的节奏，虽然是可视化的，但没有对30多年间出现的权力过渡的中期范围的节奏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现代的视角关注美国权力的解体，这正是过渡期的节奏分析。由于节奏的破坏和建立是重叠进行的，我们只能看到和安定期完全不同的节奏模式。那么怎样找到这种节奏模式呢？首先以20世纪曾出现过渡期的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例来分析，是着手探究这种模式的第一个步骤。

（二）该如何把握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过渡期的固有节奏？因为两个革命都不是奇迹，一下子脱离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段时间内，由于两个社会中渗透着的封建生产方式的节奏和资本主义生产和破坏的节奏重叠了，感受到节奏重叠的痛苦，向社会主义

过渡时，为了克服过渡期内部的抵抗和外部的压力这双重障碍，不得不面临后退和停滞的问题。因此，两个革命过程中，围绕着劳动剥削率的上升出现了经济的阶级斗争，围绕着掠夺和压迫的增加，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些斗争之间一致或冲突必然会形成复杂的节奏。为了分析两个革命独特的节奏，就要从两个角度把握节奏的重合。

- (1) 一个社会构成体内的共时性: 剩余价值率(劳动剥削率)增加和利润低下的辩证法;
- (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历史权力内部的历史地理辩证法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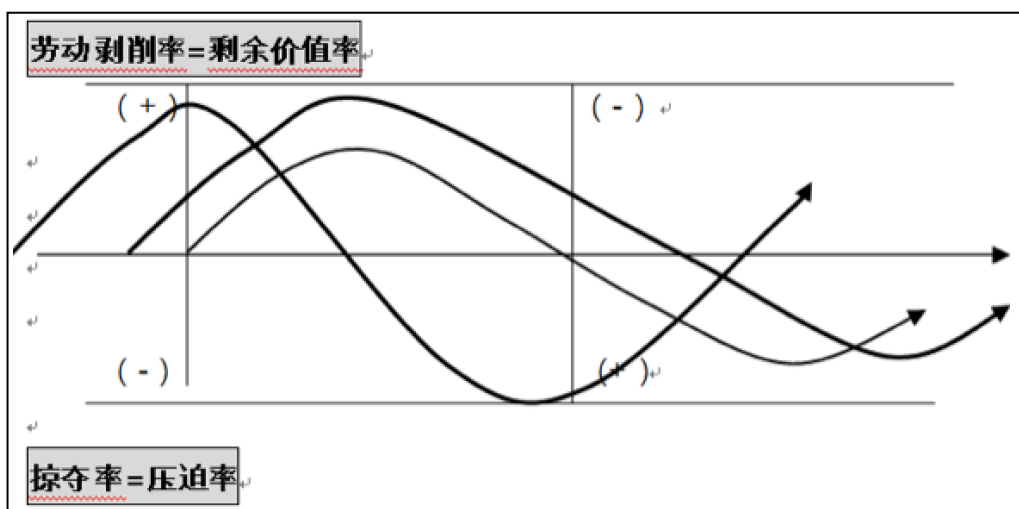


虽然比较两个地区的革命整体过程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是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样的分析可作为以后的课题，这里在宏观水准上，以主要拐点为轴，用计量的发现节奏的方式进行分析。虽然这种计量分析的方法缺乏严密性，但是过渡过程中表现的主要特征不是编年史的角度，反应了许多节奏的共时交替的观点。这种情况下，后面对具体节奏的分析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假设来帮助分析，这种帮助具有“启发” (heuristic) 价值。

三、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爆发性周期节奏分析

1917 年 2 月爆发的俄罗斯革命经过各势力间的角逐战，10 月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权

力，最终建立了苏维埃俄国。苏维埃各国建立以后，1918 年~1921 年间的内战，1921 年~1927 年间的新经济政策期的改革开放，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反对派间展开斗争，以斯大林的胜利告终。1928 年第一次经济开放计划的发布确立了斯大林的一人独裁统治。1937 年大规模的肃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西方的合作，中国革命和韩国战争时期的冷战，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开放，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冷战独裁，经过 1985 年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1991 年末急速解体。这 74 年间，历史没有终结，形成一



(阶级斗争的剥削率和掠夺率的比例变化)

个静态的体系。内部上看，内战 - 改革 - 肃清，一人独裁 - 集团指导体制相异的节奏；外部交替着战争 - 改革开放 - 闭关 - 改革开放 - 战争等一些相反方向，以逆动的节奏进行。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节奏。

中国革命自 1927 年开始，20 多年间，经历了内战和抗日战争后，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1950~53 年，参与韩国战争，1953~1957 年的第一次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时期，1957 年~1961 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中苏纷争，1961~1966 年的经济开发，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和闭关，1978 年的第一次改革开放，1989~1991 年的天安门事件和保守强硬派夺权，1992 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在初期漫长的时间里显现出了武力斗争和经济改革开放这两种相对运动定期反复的节奏。

这样区分开的各个时期可以让我们看到内战，与他国的战争，内部肃清，经济开发时期等多样的面貌。很难将其称为单纯反复节奏，这样能够追踪现象的异质性。（1）为构架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的物质基础，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经济开发）；（2）为追求包括政治的上层建筑再被的社会构成体全面结构的变化，作为阶级斗争级进化过程的革命；（3）找出包括一人独裁、内战在内的国家间暴力的使用的战争单位的话，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具有的“战争 / 革命 - 改革 - 独裁”这三个相异的单位（在强度和范围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内战和国家间战争的差异，思考这些差异 - 也会带来一些列规则节奏的反复。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国家的革命过程如下图所示。

主要局面	俄罗斯	中国
战争 / 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17 年革命→内战	1927 内战 / 抗日战争→49 年革命→韩国战争
改革（1）	1921 新经济→1928	1953 经济开发→1957
独裁（A）	1928 斯大林独裁→1953	1957 大跃进运动→1961 毛泽东下台
改革（2）	1956 赫鲁晓夫改革开放~1968	1961~1966 经济开发
起义 / 独裁（B）	1968 捷克 / 波兰 起义 被 镇压 →1985	1966 文化大革命→1976 毛泽东逝世
改革（3）	1985 戈尔巴乔夫改革→1989	1978 第一次改革开放→1989
起义 / 独裁（C）	1989 柏林起义→1991 俄罗斯解体	1989 天安门事件→1991
体制转换	1992（由上至下的）体制转换→	1992 第二次改革开放（自上而下）→

（表 1：20 世纪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战争 / 革命 - 改革 - 独裁的交替节奏比较）

这里要关注的问题是革命一定是战争 / 内战和战后相衔接的，革命以后改革和独裁交错的节奏反复着，这一节奏主攻经济开发，好似突然引起了痉挛，长期演绎了独裁的情况，这种独裁是暴力的 - 闭关的，形态的革命的独裁（无产阶级独裁；以下称“独裁”），继而再次着重经济的发展。在初期，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时期都很短暂，独裁时期较长，然后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具有改革时期变长，独裁的时期缩短的特点（并没有忽视毛泽东的独裁在其逝世后被邓小平的独裁所取代的事实，压倒独裁的 6·4 天安门事件时期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可以区分其他的时期与其相比是相对开放的时期）。那么区分这样相对的唱节奏和短节奏反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复杂的网络科学对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帮助。

网络科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的研究指出因为人类行动是习惯的反复，预测的可能性非常高，这种越策可能性体现了高斯分布。另一方面，看起来不可预测的行动依照先后顺序的设定表现爆发性周期的幂函数规律。例如，堵车的时间段里，下班回家需要的时间就不确定。根据午饭所吃食物的不同，花费的时间也不是确定的。但是其余的时间内，人们预测移动的时间是相对较为容易的。预测度达不到 80% 的人几乎没有。即使移动距离或交通手段千差万别，但是人们是习惯的奴隶。对行动预测可能性而言，“高斯分布”比幂函数更适用。（巴拉巴西 Barabasi, 282~284）这两种相类型相互不同的预测度观察着人类行动的所有方面。如人们使用电子邮件的模式，根据精细的规律，短暂或漫长的时期混合在一起，吃饭、用打印机、打电话通话、睡眠周期、直到小的移动。观察人类行动的任何一面常常都是同样的暴力模式，即长时间的休息后，在短时间内发生激烈活动的模式，来回反复。（巴拉巴西, 150~155）¹

那么人类的活动为什么表现出这种爆发性周期呢？巴拉巴西认为我们的何种行动，是因为以前或现在的时间不足，只能设定“优先顺序”（巴拉巴西, 200），一设定优先顺序，我们的反应时间就变得不均等了，大部分的工作迅速完成，但是余下少部分的工作就会出现被拖延的情况。（巴拉巴西, 181）这种人类行动或在自然现象里，如果发现高斯分布和幂函数分布相结合形态的一连串的爆发性周期的话，历史过程中，习惯性行动编制在一起形成了预测可能的高斯分布的节奏，预测不可能的利维飞行以及幂函数，可能出现三种

1_ 动物在一个地方犹豫不定然后突然一下子跳起来的方式叫做“利维飞行”（227）。信天翁捕鱼的方式，从尤卡坦半岛的蛛猴、驯鹿、果蝇到灰色海豹，整个动物界存在着利维的轨迹。根据 Viswanathan 和 Shlomo Havlin 的共同研究，当食物供给不足时，最适合的策略是假设以短小的步伐来回徘徊，然后偶尔远眺的组合。除此之外，统治遗传者活动的蛋白质转录（transcription）因子怎样在 DNA 里找到正确的结合位置（如同从纽约至洛杉矶 3961 公里的路程里寻找一个硬币）的方法，以及搜集情报的过程也是运用利维飞行的方式来完成的（232~234）。人类的疾病具有爆发性周期。健康的时间相对长的话，通常去医疗室的时间就很短（334~335）。日本东京大学大学的研究实验表明，人们的活动就像手腕移动一样，连最细小的部分也是具有爆发性的。研究人员对被研究者采用幂函数的规律对手腕不动处于休息期的长度进行实验。25 名研究对象中，14 人在休息期比别人宽度更宽，然而表现出这种模式的研究对象是接受过忧郁症诊断的人。健康的研究对象休息期平均 7 分钟，忧郁症患者超过 15 分钟。幂函数规律的特征是数值（指数值）相互不同。基础科学使用能够用科学的过程是依据历史幂函数规律（340~341）。遗传者们即使扩

分布节奏结合的特定类型的爆发性周期。

前面提到的这种分析适用两国国家的改革和革命的反复，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建立以下这样的假设。如果说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采取了“革命→独裁”的节奏，这种节奏是一种例外的幂函数分布，“革命→独裁”正常预测可能的情况是运用高斯分布的。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独裁”在长时间内经常反复的原因可以看作是为了赋予将社会主义的过渡视为绝对必要条件的“无产阶级独裁”“优先顺序”。在一期间内，社会能量过度集中的高扬和紧张过后，迎来短暂的休止期，然后又是紧张的时期，来回反复。

但是 1978 年以后，中国的情况是“改革”期间变长，“独裁”期间就变得非常短暂，前者呈现正常分布，形成了后者例外的时期的方式。那么该如何解释这样的变化？只在政治体系连续性的侧面来看，只能看作是单纯统一节奏的长短变化。然而因为中国的情况是 92 年以后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和 78 年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内容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可以认为中国 92 年以后从 80 年代开始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国家主导型市场资本主义的转换。下文中经济制度和规模的变化清楚的证明了这一观点。

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和第二次改革开放存在着制度的、量的巨大差异。92 年 1~2 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过 3 月第 7 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10 月的第 14 次党代会上第一次正式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论”。之后 93 年所有制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具有法人财产权的法人企业，股份制法制化，国营企业劳动者的终身雇佣制全部都转换成一般的 1~5 年的合同制。截止到 91 年末，转为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已达到了 700 多个，97 年春这一数字增加到了 9200 个。在股市市场上上市的公司数从 90 年的 13 个增加到 96 年的 530 个（김영진 Kim,Young Jin, 85~129）。资源分配机制的转换也在 1993 年前后得以完成。按照计划工业生产的比重从 84 年的 40% 下降到了 93 年的 7%，93 年依照市场价格交易的比重占农产品拍卖总额的 87.5%，消费材料占消费总额的 93.8%，生产占拍卖总额的 81.1%。开放经济的转换 93 年前后完成，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78 年的 9.8%

大就关闭的时期，也会在进化的过程发现爆发性周期（343）。爆发性是在生命的奇迹里核心的要素，适应生命环境，是为了生存不断挣扎的证据。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化生物学家尼尔斯·艾崔奇和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提出了“断续平衡说”，这一理论说明了在古生物学里发现的急剧进化的变化。

到 94 年超过 40%。（서석홍 Seo, Seok Hong, 131~132）外国资本投资 19 世纪 80 年代不足 200 亿美元，到 2000 年高达 2000 美元，之后仅三年时间达到了 4500 美元，上升了两倍。

王晓明对 80 年代的改革和 90 年代改革本质上存在的差异做出了如下的说明：

就在一九八九年春末抗议示威从天安门广场扩散到全国的时候，先是波兰，接着是东欧其他国家，最后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相继垮台。这一切似乎再次证实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领悟了的那个阴暗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执政党发动政治上的自我改革，最后一定会导致整个政权的覆灭，一切依附于这政权的个人的利益，也必然会随之丧失殆尽。我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高层中间，全盘接受这一类启示的力量占了上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的北京城才会枪声大作，坦克车才会隆隆地碾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帐篷。也正是因为对这启示的领悟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中再次迅速地扩散开来，才导致了“党内改革派”以改革挽救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的最终失败，导致了整个统治阶层在利益原则上的重新统一。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再次发动市场经济改革，立刻获得了整个统治阶层的热烈响应。虽然还是说“改革”，说“现代化”，甚至更大声地说“市场经济”，但在根本上，九十年代的新一轮“改革”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从“联产承包”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自然延续，更与八十年代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不相干。改革的指向明显变了，它所遭遇的各种社会条件更是大变了。在九十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一个以利润为唯一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文化教育……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在九十年代，这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了许多：一九八九年的枪声犹在耳旁，它足以震慑住任何抵制政府决策的社会意向。（王晓明 388~389）

因此在世界整体变动的脉络里，事实上包括俄罗斯和东欧，中国在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所有障碍在 1989 年至 1991 年间一举被解体。可是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行政公开，通过裂开的缝隙的空间，党内改革派的力量在逐渐变大。与从下至上的活跃的大众起义相结合——推翻了戈尔巴乔夫逐步变化的企图，党内激进改革派

与大众起义结合——以一种急剧的方式“上下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相反，处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党内的保守派强硬镇压在天安门的大众起义，压迫的权力结构没有变化，“从下至上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点上两国存在差异。（换言之，92 年以后中国已不是社会主义，意指中国以一种专制政策的开发独裁形式的国家主导型社会，向资本主义转换。）

当然这样的解释存在许多的争论。其中重要的争论是为什么俄罗斯改革开放是与大众起义相结合，最终出现上下崩溃的结果。相反，中国却没出现那样的情况，站在“价值规律”的立场上，是否能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这一问题又与社会主义的“正义”问题相关联。存在多种多样的解释，但是压缩这个争论来看，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即苏联和东欧圈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开始就无法自由，因此阐明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许做出最大的让步就是资本主义的要素和社会主义的要素混合成杂种社会，或者是“堕落的劳动者国家”。然而从某种情况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潜伏在水面以下，或曾文弱的资本主义的要素——潮流比社会主义的要素——潮流变得具有优势，结果浮到水面之上，完成体系转换，事实上没有理论的余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逆转呢？

概括而言，苏联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不能上升到支配性的位置情况下，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安定化，急速扩充物质基础，为应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威胁，就不得不促进过度的武器生产，这一过程的初期通过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达到了高速增长（依据联合国的踪迹，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形成了比欧洲更有活力的发展和增长。）。另一方面，随着长期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的高度化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使苏联社会面临着危机。不仅如此，与西欧不同，作为硬化的官僚计划经济，这次危机通过“资本损耗”和“资本集中”，部门间资本移动这些资本主义的手段，使不能突破的内在局限问题集中起来（하태규 Ha,Tae kyu, 61）。因此在基础自身处于极度脆弱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改革 / 行政公开这种上层建筑的改革使长期化的党官僚体制关闭的空间得以开放，也使积累的大众不满打开升涌的缝隙，党内改革派与大众起义的潮流一时结合崩溃。

与苏联相反，中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结构的持续期间相对较短，因

为与西欧军事竞争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有苏联雨伞般的遮挡，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速度和剩余价值率下降的压力相对苏联而言较弱，改革开放大大提前，主攻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政府在 1984 10 月党的第 12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价值规律”，即有意识的利用市场原理，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式。此外，1986 年国营企业劳动者采用新规定里，把原来的终身雇佣制全面转换成了 1~5 年签约制。[김영진 Kim,YoungJin, 107~109]）强化了物质基础，因此上层建筑龟裂的程度与苏联相比较小。正因这样，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同具有强制镇压天安门示威的充分余力。这以后，通过强力的公钥加密算法(RSA)和西欧资本的结合，去除社会主义的要素，促进全面向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型。

那么就今天而言，把 20 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只看作是“过去的噩梦”？如果对过去的历史只用一个噩梦来评价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世界的变动，就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那么为未来准备，从过去的历史中能得到怎样的教训呢？东欧圈崩溃后 20 多年的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身再次迎来巨大的动荡，分裂的缝隙间对新革命的期待和要求之声越发强烈，渐增的体系混沌运动使曾风靡 90 年代的“历史的终言”，“再无对案”的口号无效化。现体系的解体正在深化，现在要开始以下这些新的议论。修理改善正走向坍塌的现体系能克服体系的危机吗？或使自身处在众多是非中的现体系朝着革命的方向变化前进？种种问题让我们有理由回想起一段时间内曾遗忘的题为“改革还是革命”的一种论争。（未完待续）

愤怒的“雅努斯双面”

——2015年8月@人民日报涉日微博评论研究

李 飞 *

摘要：本文通过对2015年8月@人民日报涉日微博评论的分析，发现涉日报道引起的愤怒情绪具有两面性，一面指向日本，一面指向政府、执政党，笔者分别称为愤怒、反向愤怒，含有两种情绪的评论总体比例为1.585:1。愤怒型评论和反向愤怒型评论在每一条涉日微博下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其比例消长和微博发布时的社会语境、微博文本的表达方式有关。

关键词：微博 @人民日报 评论 涉日情绪

* 李飞，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一、引言

自从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weibo)以来,以“两微一端”为标志的微文化迅速崛起¹,新媒体(信息、社交、知识整合于一体)大有取传统媒体而代之的趋势,以致报刊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网站和电视台也纷纷进行媒介转型和融合。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以新媒介技术为基础的微时代。“微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仅使得人们的沟通更加便利,消息的获取更加及时,也使得更多人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尤其是手机)参与社会议题²。然而,网民的参与并不是理性、审慎的,常常是充满情绪色彩的,尤其是涉及到民族问题时。

学术界对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自2005年就已经开始³(实际探讨早于这个时间,几乎与网络的普及同步),并且成果逐步增多。这些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1)网络民族主义的定义、表现、特征,以及如何引导、规范网络民族主义;(2)对于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研究,如各种钓鱼岛事件、反对日本入常事件等;(3)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宣传爱国主义。学术界的研究已经很全面到位,但是依然缺了一项:新媒体日常民族主义实践。民族主义与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或者说,民族主义是打造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而民族身份写入身体,必须通过日常实践。民族主义情绪会在特定的政治事件中爆发,但是其力量的积蓄必然在日常实践之中。包含民族认同、民族情绪在内的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既包括常规的历史教育,也包括升旗、阅兵等国家仪式,甚至包括影视剧的国家形象塑造。新媒体的日常民族主义实践,包括宣传、纪念、信息报道,建构国家形象等。这些以文字、图片、链接编码的信息自然会嵌入网民的生活(笔者不打算区分“虚拟”和“真实”,网络空间只不过是没想物理空间那样的物质载体,然而,

1_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94亿;截至2015年9月30日,微博的月活跃用户数到达2.22亿人;2015年第一季度,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更是超过5亿人。数据来源于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2015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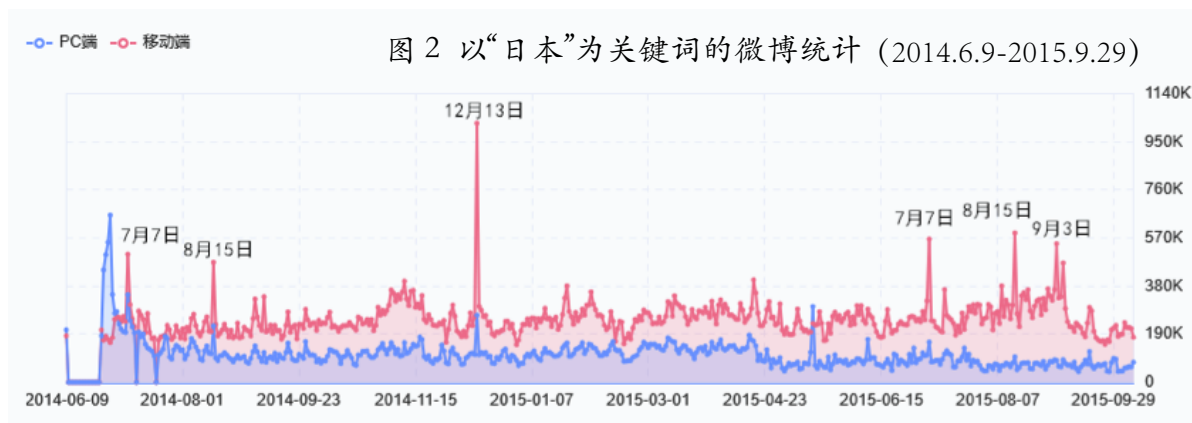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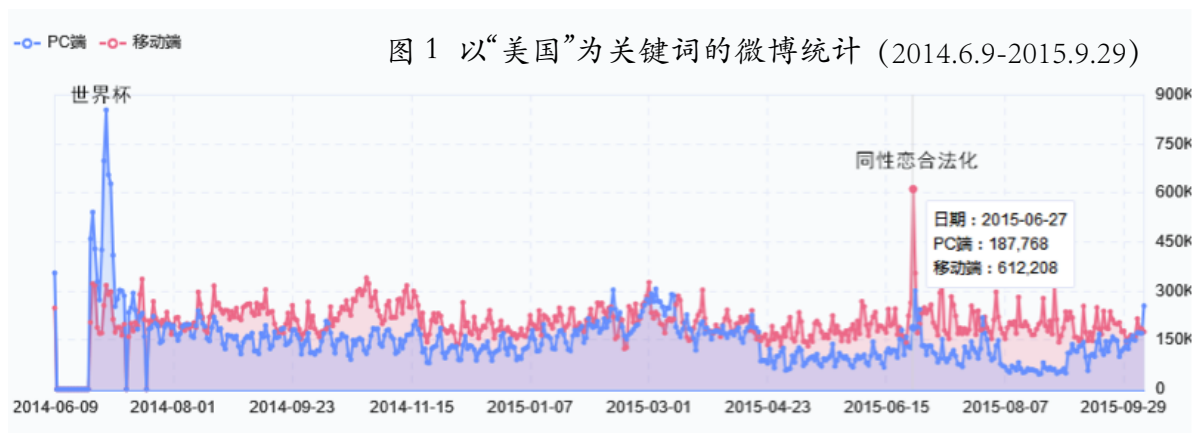
2_据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6.20亿。

3_向洋:《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虚拟》,《世界知识》,2005年第14期。

网民在里面的消耗的精力、产生的情绪都是真实的），成为网民的民族情绪触发点。

媒体引导的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最明显地体现在涉日报道上。大陆网民的民族情绪主要针对两个国家：美国、日本。美国能引发网民的民族情绪，不止和主流媒体塑造的欺压中国的帝国形象有关，还和美国全球警察的定位有关。全球警察的定位决定了美国要强势介入各个地区的政治事务，这不可避免地会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中国的民族情绪。因此，涉美的民族情绪主要是事件型。日本则不同，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一直是网民的头号假想敌，主流媒体也会在各种抗战纪念日进行仪式化的报道。所以，涉日报道应该更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仪式化（纪念）特征。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笔者通过新浪的微指数功能，以“美国”、“日本”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2014年6月1日到2015年9月20日间的发帖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图（图1、图2）所示。



以“美国”为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分布较为均匀，在统计时间范围内，出现了两次峰值。这两次峰值分别在2014年6月和2015年6月，前者恰好是世界杯举办的时间，而后者则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全美合法的时间。可以看出，网民对美国的关注高峰，常常和重大的政治或文化事件有关。而以“日本”为关键词的微博发帖数，却有特定的峰值，请注意以下峰值的时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5日（抗战胜利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2015年9月3日（胜利日阅兵）。2014年6月的峰值同样和世界杯有关（因此和“美国”一样，这个峰值突出表现为PC端即个人电脑端的峰值，因为网民会在电脑上看直播），2015年9月3日的峰值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有关。除了这两个时间点，网民关注日本的时间点恰恰和特定的纪念日有关。

本文的研究意图即选取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账号的涉日报道，通过评论内容观察网民对涉日报道的情绪反应。考虑到影响力和受众数量，笔者选取了《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人民日报作为分析基点。《人民日报》作为政府的首要舆论阵地，其发行量超过300万份，但是它的法人微博（@人民日报）粉丝量超过四千万。限于客观条件，笔者将2015年8月@人民日报涉日微博的网民评论作为研究对象，即使是这样，量也非常大，所以笔者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热门评论的前一百条。

@人民日报在2015年8月1日到8月31日，共计发表涉日微博32条，这些微博的分布是：8月9日4篇，8月13日1篇，8月14日6篇，8月15日5篇，8月20日1篇，8月28日2篇，8月30日4篇，8月31日6篇。其中有一篇关于抗战老兵的，由于主要对象是抗战老兵，评论里均是对老兵的致敬以及对老兵待遇的质疑，很少有对日情绪，因此这条微博未算在分析范围内。作为主流媒体的@人民日报，涉日微博的发布是有特点的：一个是纪念日发布，如8月9日是原子弹爆炸日，8月15日是日本投降日，8月20日是百团大战纪念日；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发生时发布，如8月24日安倍确认不参加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8月31日日本民众游行声讨安倍；另外，为了配合9月3日的大阅兵，@人民日报在8月30日、31日连发多篇微博。通过这31篇微博，笔者获得共计3100条评论，这3100条评论就是本文的主要分析材料。

二、愤怒的“雅努斯面孔”：涉日微博评论的情绪指向

微博评论常常是非常简短、不注重标点符号的，并且 emoji（表情）经常会搭配文字出现。总体而言，微博的评论机制更鼓励用简短的文字和 emoji 表达阅读完微博后（如果有链接，也很少被点开）的瞬时感受和情绪。总体而言，评论主要是对微博内容的即时反应，是点对点的，缺乏交互性。因此，在笔者的研究对象中少见叙事性、煽动性文风，也见不到一群网友骂不同意见的网友“汉奸”、“卖国贼”。这种评论机制下，网民的情绪更加简单粗暴，容易识别。

网民的态度并非多元的，也不是理性的。以往的网络民族主义研究已经指出，网民的涉日情绪主要是愤怒、仇恨，并且言语间充满了粗口和暴力冲动⁴。这种愤怒情绪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历史教育以及文艺作品对近代史的再现有关，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雪耻”和“复仇”的属性⁵。正因为如此，早期网络论坛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被称为“愤青”⁶。笔者的研究对象首先证实了这样的研究结果，@人民日报涉日微博的评论中，数量最多的帖子就是这种包含了不满、敌意、愤怒，甚至仇恨情绪的评论⁷。**笔者将这种包含不满、敌意、愤怒的情绪称之为愤怒，将包含愤怒情绪的评论称为愤怒型评论。**

笔者所分析的 3100 条评论中，包含愤怒情绪的评论（见表格 1 的几个例子）是最多的（28.2%），可以称为主导情绪。笔者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确定愤怒型评论：（1）明显地表达出对日本的愤怒或暴力倾向，（2）出现“小日本儿”、“鬼子”等侮辱性词汇

4_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6 期。陈静静：《以涉日情绪为例简析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5_ 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书城》，2004 年第 12 期。

6_ 山小琪、郭展新：《新世纪“愤青”与青年的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研究》，2009 年第 1 期。

7_ 利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的心情搜索（MoodLens），可以得到微博博文的情绪构成。以“日本”、“美国”、“韩国”分别为关键进行搜索、对比，可以发现近期博文情绪构成中，含关键词“日本”的博文愤怒情绪比例较高，含关键词“美国”的博文失落情绪相对较高，含关键词“韩国”的博文厌恶情绪和高兴情绪相对比例较高（搜索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21 日）。这个大数据结果可以和本文的结论互证，但是大数据本身无法呈现愤怒情绪的复杂性。心情搜索的网址为：<http://xinqings.nlsde.buaa.edu.cn/>。

或愤怒的表情，（3）对历史问题的强烈重申，希望自己国家发展武力、变得强大以压制或灭掉日本。这属于正常的愤怒情绪，是一般研究者所研究到的涉日情绪，也是主流媒体在涉日报道时所希望引起的网民情绪。通过周期性的纪念，主流媒体希望唤起共同抗战的记忆，使得民族身份不断被确认，也将执政党的合法性烙印其中。

表格 1 愤怒型评论的典型例子

微博昵称	评论内容
@ 我爱后羿君	对不起…我没有人性，我希望把日本给摧毁！
@ 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 LLL	小日本 我操你姥姥
@ 我叫翁老妖	对于我来说，我希望的是政府对日本开战。
@ 小小阿狸 003	我只想问问东京大屠杀什么时候才到？

但是，和原来的研究大为不同的是，笔者发现评论中存在大量的不符合主流预期的言论，这些言论依然包含着愤怒情绪（表 2）。以往的研究都注意到，网民的情绪实际上针对的是日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担心民粹情绪会催发战争。然而，这里（表 2）愤怒的对象却不是日本，它是一种与主导型方向相反的愤怒。这种愤怒情绪指向国内，指向执政党，指向政府。涉及被政府压制的历史、执政党的合法性、现有政策的合法性的评论，大多包含有这种转向内部的愤怒。为了区别与上文提到的针对日本的愤怒，笔者将针对政府、执政党、政策的不满、敌意和愤怒的情绪称为反向愤怒，将包含反向愤怒的评论称为反向愤怒型评论。

表格 2 反向愤怒型评论的典型例子

微博昵称	评论内容
@ 艾薇儿 - 拉维尼 V	1989 年 6 月 4 日 天安门 邓小平 赵紫阳 军队
@ 琪琪 qq 小同学	开通 Facebook 就帮扩
@ 微波馒头	抗日跟你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日本侵略的时候躲在山沟沟里面，日本投降了跑出来抢地盘，还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
@sean 左近	自己对老板姓这个鸟样还好意思说别人。

经过笔者对 3100 条微博评论的统计，包含愤怒的评论共有 875 条（比例为 28.2%），平均每篇微博下有 28.2 条；包含反向愤怒的评论共有 552 条（比例为 17.8%），平均每篇微博下有 17.8 条。包含愤怒的评论总体是包含反向愤怒的 1.585 倍。可能笔者的统计并不精确，但是大致的比例应该相差不大，更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这个结果出乎笔者的预料，笔者在分析材料之前已经预料到会有大量评论包含愤怒情绪，但并未预料到包含着反向愤怒的评论也会有这么高的比例。以往的网络民族主义集中于愤怒情绪，忽略了反向愤怒情绪。反向愤怒之所以被忽略，首先是因为愤怒情绪常常来势汹汹，更具有潜在破坏力，并且容易转化成街头政治——打横幅、印文化衫，甚至是游行、打砸日货，而反向愤怒是被压抑的，无法顺利地和街头政治结合。另外，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某个网络论坛，而论坛、QQ 群等，常常是群体极化非常严重的地方，自然会有大量集中于一个方面的极端言论。更为重要的是，以往的研究常常集中在因为某事件（钓鱼岛事件、入常事件、九一八反日游行）而出现的反日情绪，并不能说明网民日常的涉日情绪。

基于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可以说网民的愤怒情绪具有两面性（外、内）。愤怒的面孔就好像雅努斯的两副面孔⁸，一面朝向外部，另一面恰恰相反，朝向内部。当然这个网络“雅努斯”肯定是怒目横眉，嘴巴张开，正在愤怒地叫嚣着什么。愤怒情绪将日本视为外部的邪恶之物，潜在地把自己视为一个内部个体，这个内部是一个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内部。因此愤怒情绪渴望的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中国的强大，以便报复或控制外部的邪恶之物日本。反向愤怒则不同。如果说日本在愤怒者面前是一个邪恶的他者，那么在反向愤怒者面前就是一个正常的他者，一面好用的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身的邪恶。于是，愤怒情绪就反射到自身。如果说愤怒情绪包含的是一个凝聚的国家认同，反向愤怒情绪包含的则是一种阶级认同：这个国家包含着统治阶级和被统

8_ 雅努斯是罗马人的保护神，生有两幅面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副面对着过去，一副面对着未来。本文借用雅努斯一体两面的形象，比喻体现在@人民日报涉日微博的评论中的愤怒情绪的一体两面的特征，只不过这里的雅努斯，一面朝着外部，一面朝着内部。关于雅努斯的传说，可以参见搜狗百科、互动百科或者维基百科。

治阶级，统治阶级的罪恶要大于日本。很多涉日微博，使得日本作为一面镜子呼唤起了这种反向愤怒的情绪。王岐山不久前说，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历史⁹，而反向愤怒最先质疑的就是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他们对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质疑甚至嘲弄集中于抗日的功绩、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八九事件上。反向愤怒质疑的不止是历史合法性，还强烈质疑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这主要集中在言论和游行自由、民主、贪腐、利益集团问题上。他者常常是为了确认自我而存在，作为同一个他者的日本，在大陆网民面前，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个他者，愤怒情绪增强的是民族身份的认同，而反向愤怒强化了阶级身份的认同。

所以很难说媒体的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到底起到了多大的强化民族认同和宣传爱国主义的作用。至少，从笔者的研究对象来看，主流媒体在新媒体上的民族主义的日常实践，引起的情绪具有双面性，既指向外部，也指向内部。愤怒情绪具有爆发性，常常会带来街头政治，并且蕴含着对外战争的冲动。反向愤怒并没有社会条件转化成街头政治，但依然暗含着“造反”的冲动。注意，“造反”的冲动完全不同于革命意识，它既不是基于对整体社会框架的不满，也没有革命计划和对未来社会的规划，“造反”冲动更接近破坏意识。

网民愤怒情绪的来源有两个：历史和现实。历史中，日本带给中国的灾难是国人的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铭刻在教科书中，铭刻在影视剧中，也铭刻在媒体周而复始的纪念中。这种创伤记忆带来的愤怒情绪和复仇欲望，当然会在涉日微博的评论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的涉日报道又会引起对执政党历史合法性的质疑，这和执政党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为基础讲述近代史有关。据新浪提供的数据，微博用户中拥有大学以上高等学历者占到76%，年龄在15-33岁之间的用户占79%。微博用户的活跃度则更为有意思，从图3中可以看出，发达地区的用户活跃度明显高于不发达地区。¹⁰当然，这个数据不代表本文研究对象，但是也提供了理解网民情绪的一个窗口。

9_中直党建网：《王岐山首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是人民的选择》，<http://www.zzdjw.com/n/2015/0914/c153945-27580809.html>。

10_数据来自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5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

微博活跃用户的总体特点是：高学历、低年龄、位于发达地区。可以说，他们是受到良好教育、具备反思能力的一群人，同时他们也是自我期望较高但刚刚起步面临巨大社会压力（一线城市的高房价）的一群人。因此，他们是既有能力对目前的历史叙述模式提出质疑，又会因为生活起步的艰辛和社会现实的重压而产生被压迫感、被剥削感。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日报的涉日微博，为这一圈人提供了情绪出口，这个出口一方面为创伤记忆提供发泄点，另一方面也给被压抑的历史和现实压迫提供了发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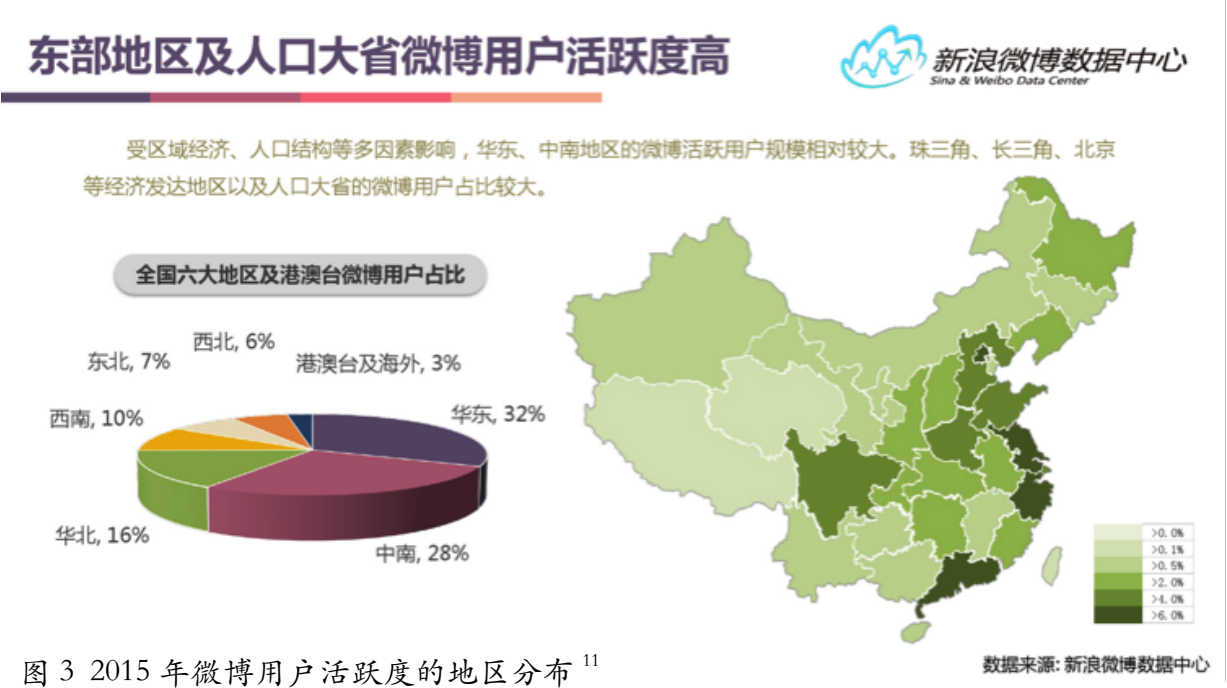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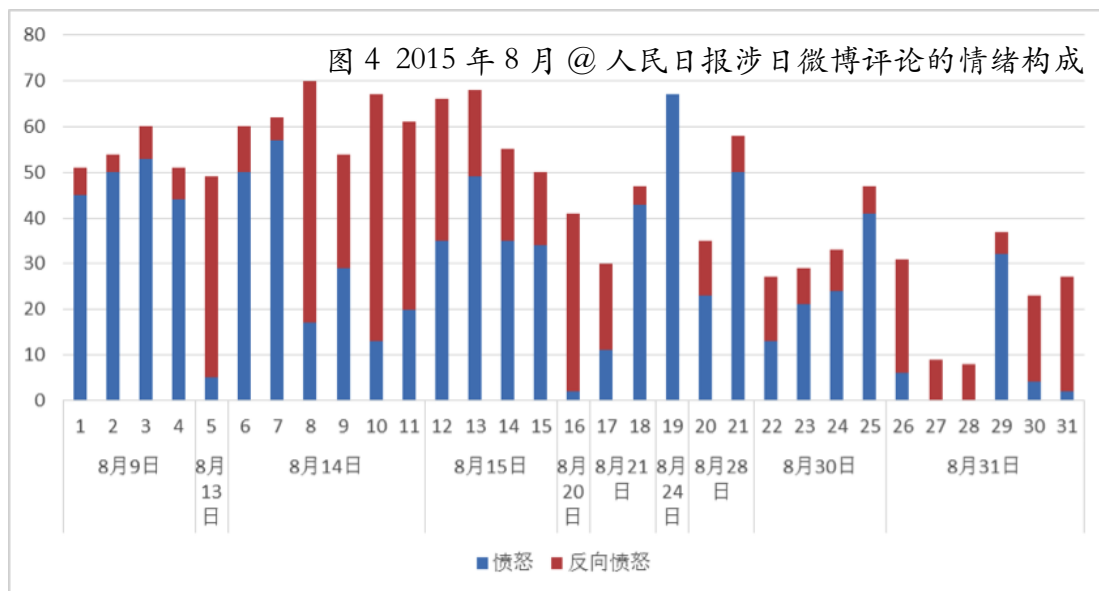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微博用户活跃度的地区分布¹¹

三、愤怒与反向愤怒的交替规律

愤怒型评论和反向愤怒型评论的总体比例为 1.585:1，不代表每条微博下面两者的比例都是 1.585:1。事实上，每条微博下面两种类型的评论比例相差悬殊，经常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为了进一步研究愤怒和反向愤怒的关系，笔者统计了每一条微博下边的前一百

11_ 图表来自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5 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

条评论的愤怒与反向愤怒的数量构成情况，具体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两种情绪的关系，笔者统计了两种情绪的比例关系：愤怒评论数量较多的，直接用愤怒评论的数量除以反向愤怒评论的数量，获得一个比例；反向愤怒评论数量多的，用反向愤怒评论数量除以愤怒评论数量，最后结果前加负号，获得一个比例；有三篇微博较为特殊，出现了零愤怒、零反向愤怒的情况，对于零反向愤怒的微博，愤怒评论数量达到67，考虑到图形的展示，赋予其所有数据中的最高值25，零愤怒的两篇微博均是两种情绪评论的数量加一然后在相除。这样处理后，y轴正方向的就是愤怒高于反向愤怒的数量，y轴负方向的就是反向愤怒高于愤怒的数量，且距离x越远表明比例越悬殊。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如图5所示。

如果纯粹在数据上找规律的话，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反向愤怒评论为主的微博有11篇，愤怒评论为主的微博有20篇。网民随时变换自己的面孔，似乎阴晴不定，难以捉摸，即使在同一天，也会出现极为不同的情况。那么，网民的情绪是不是真的变幻莫测，没有规律呢？事实并非如此。在纯粹的统计学上，可能看不出规律，结合具体的语境和文本，网民的面孔切换依然有规律可循。



（1）将日本看作受害者的微博更容易引起愤怒。

2015 年 8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布了四篇微博，因为这一天是日本的原子弹爆炸日。上午 8 点，@ 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涉日微博，微博中强调了原子弹“胖子”使日本“10 余万人当日伤亡”、“城市 60% 建筑物被毁”、长崎顿成“人间炼狱”，这些暗示日本为受害者的言语，立刻激怒了网民，相当多的评论认为原子弹投得太少，或者说应该投氢弹。这一条评论的愤怒与反向愤怒的比例是 7.5。当天下午，@ 人民日报转发这条微博，并配上评论，评论中提到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爆炸的死亡人数超过 25 万和 14 万，幸存者也“饱受癌症、白血病和皮肤灼伤等辐射后遗症折磨”，这些并没有让网民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反而引起网民的愤怒。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中，愤怒与反向愤怒的比例为 12.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含有愤怒情绪的评论数量也非常多，50% 左右的评论者表达了愤怒。深夜 @ 人民日报又发了一条评论性质的微博，这条微博包含暗示日本是受害者的因素，愤怒和反向愤怒的比例降为 6.286。可以看出，如果将日本作为受害者，或者过多强调二战中日本的损失，会立刻激起网民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点燃愤怒之火。

（2）强调中国作为受害方，展示战争的残酷细节，更容易引起愤怒；相反，如果以战胜方的姿态，强调战争进程和抗战贡献，则会引起大量的反向愤怒。

越是客观的描述，越是仅仅展示战争的细节，越容易引起愤怒。例如慰安妇的数量问题、侵华老兵讲述日军残暴的细节，都会引起强烈的愤怒情绪。如果这些细节展示配有图片，则更容易引起愤怒情绪。

若是以大历史的姿态，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博，则容易激起反向愤怒。在8月3日，@人民日报以“抗战胜利”为话题，发表了微博“九张图回顾抗战十大战役”，8月14日发布了关于波茨坦公告的微博，8月20日发布了纪念百团大战的微博，这些微博收到的评论，均是反向愤怒远高于愤怒。这个是比较容易解释的，当强调抗战时，不可避免就要有抗战主体，这个时候，网民很自然地会调整身份，将@人民日报看作党派力量，进而他者化。另外，以胜者姿态发言，和网民的情感结构有冲突，中国的教育和宣传（尤其是电视剧）常常打造一种仇恨型对日情绪，如果我们是胜利者，那为什么要仇恨呢？

（3）言说者越是不暴露立场，采用一种客观口吻，越容易引起愤怒；反之则容易引起反向愤怒。

展示细节其实就是不暴露立场，上文所说的老兵回忆、慰安妇问题的微博，均没有暴露言说者。中立、客观的叙述方式非常容易引起愤怒，可以看一下下述例子。在8月21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有关抗日的翻译问题微博：[中央编译局：“抗日”不宜译成“anti-Japanese”]“anti-Japanese”是“反对日本”“反对日本人”的意思，并不包含“侵略”等信息。且“anti-”后加上民族构成的复合词，常与非理性的事件或行为搭配。建议译为：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或 counter-Japanese。没想到这一篇看起来是知识讨论的微博，引发的愤怒情绪非常多，其评论远远超过反向愤怒评论。

最有意思的是8月24日的这篇微博：[安倍确认不参加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据新华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4日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不会出席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也不会于9月3日前后访问中国。这条微博是典型的新闻体，没有任何评议语言，但是这篇微博引起的只有愤怒，而没有反向愤怒。在8

月 30 日，12 万日本民众在国会大厦前集会，抗议安保法案，8 月 31 日 @ 人民日报发布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三篇微博，笔者分别作了截图：



这三篇微博，第一篇就是一个简单的新闻报道，第二篇是转载新闻加评论，第三篇是 @ 人民日报特有的评论栏目“你好，明天”。由于是报道日本民众反对安保法案，所以这三篇微博下面的评论愤怒情绪很少见，大多在挺日本民众，也会有很多理性的观点。但是，由于涉及到集会自由的问题，这三条微博下面均有反向愤怒情绪出现，数量分别是：9 条、19 条、25 条。可以看到，在这三条微博中，越是暴露言说主体（评论性语言越多），效果越差，越容易引起反向愤怒。

（4）语境的影响也非常大，当国内出现重大事故或事件时，反向愤怒大量增多；日本方面有动作时，愤怒比例较大。

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发生了危化品爆炸事故，此后几天的涉日微博评论中，充满了大量的关于转移国内矛盾的质疑，进而表示对政府的不满。到了8月18日，所谓史诗电影《开罗宣言》曝光了一组海报，这组海报展示的是二战中的伟人：毛泽东、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由于开罗宣言中的四大元首之一的蒋介石被替换为毛泽东，网民极其不满。这之后的涉日微博的评论中，大量的反向愤怒是以此事件讽刺、辱骂执政党。如果是在日本有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关于领土、慰安妇、教科书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会促使愤怒情绪的表达。因此，愤怒与反向愤怒的情绪转换，和语境的关系非常大。如果是国内出现重大事件时，涉日报道非常容易引起网民的反感，进而将愤怒对准政府和执政党；如果是日本对战争问题颇有微词的时候，网民反而容易形成民族认同，表达对日本的愤怒。

通过对愤怒和反向愤怒的交替规律的研究，可以看出网民情绪和社会语境与文本的表达方式有关，其中的相关性上文中已经总结，不再赘述。行文至此，可以对愤怒与反向愤怒的关系继续深化一下。首选，愤怒和反向愤怒两者本身就意味着记忆的争夺。日本的侵华罪行在全体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是阿斯曼所说的功能记忆。如果仅仅是利用这些记忆，肯定可以增强一种民族意识。但是，当政权出于合法化的动机设计历史知识时（这个时候容易暴露党派主体），民众反合法化的动机就会强烈反弹。弗洛伊德说，被压抑的迟早会回归，对历史而言不是如此，被长期压抑的历史很可能无法进入活生生的记忆之中而被永久遗忘。但是，电子媒介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储器，存储了大量的被压抑的记忆，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回归。这些被压抑的历史（三年饥荒、文革、八九事件）再次出现时，就是以反合法化的形式出现。因此，愤怒和反向愤怒可以是记忆的塑造和争夺，也是合法化和反合法化的较量。其次，愤怒和反向愤怒的消长，和身份的切换有关。马克思讲，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也就是各种身份的聚合。他者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确立自我的身份。当我们遭遇一个外国人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的民族身份；但是当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环境里，就意识不到，或者不会强烈地意识到。因此，当言说者隐藏自己，“客观地”发表涉日

言论时，网民的民族身份会立刻被激发出来（遭遇到的是外部的他者即日本）；但是，当言说者暴露自己，进行评论或者判断的时候，网民选取的他者有的时候就不会是日本，而是以言说者为代表的阶级（网民会把主流媒体的新媒体账号等同于官方机构的延伸，而非等同于“小编”），这个时候网民的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身份意识就会增强。同样，当国内出现矛盾的时候，民族身份就会弱化，阶级身份变得显著，对于涉日报道的解读就不会依从报道意图。

四、结语与反思

以往的涉日网络民族主义研究，多侧重舆情事件发生时，网民的情绪爆发，因此只注意到网民的对日的愤怒情绪以及其中蕴含的危险和破坏性。实际上，仇日情绪集中爆发时的愤怒，不能完全等同于网民的涉日情绪，更不能简单地说媒体很容易就能操控网民的涉日情绪。

通过对@人民日报2015年8月份的涉日微博的前一百条热门评论的研究，可以看到网民对涉日报道的情绪反应具有两面性：愤怒、反向愤怒。在这里，愤怒指的是包含不满、敌意、愤怒的情绪反应。之所以区分愤怒和反向愤怒，是为了明确愤怒的对象。愤怒情绪的矛头指向日本，而反向愤怒情绪的矛头指向政府和执政党。出乎笔者预料的是，在笔者所研究的3100条评论中，愤怒型评论占28.2%，而反向愤怒型评论居然占到17.8%。并且，在11条微博中（样本共31条），反向愤怒型评论的数量超过愤怒型评论的数量。网民的这两副面孔在统计规律上看似风云变幻、毫无常法，如果引入文本的表达方式和社会语境，规律性却极为明显。就表达方式而言，越是客观中立的文风，越容易引起愤怒；越是暴露言说主体，越容易引起愤怒；宏大叙事容易引起反向愤怒，而展示战争细节则容易引起愤怒；以胜利者姿态行文容易引起反向愤怒，以受难者姿态行文则容易引起反向愤怒。就语境而言，国内出现突发事故或引起网民不满的文化事件时，反向愤怒情绪会提高；日本方面有相关负面动作（历史教材、慰安妇、钓鱼岛）时，愤

怒情容易爆发。

愤怒之所具有雅努斯的双面，和微博用户的社会地位有关。据新浪数据，微博用户多是高学历的年青人，并且发达地区的用户活跃度更高（主动评论的用户一般都是活跃用户）。可以说，这个群体具备获得官方以外的历史和信息的能力，并且承受着最大的社会压力（这个群体都有着都市中产的期待，但刚开始积累社会资本）。另外，愤怒和反向愤怒恰恰代表争夺记忆的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认同当前政权及其历史叙述，另一股力量则致力于把被压抑的历史召唤出来，以此来质疑当权政权的合法性。而愤怒型评论和反向愤怒型评论的消长的背后，身份政治在起作用。当社会语境和文本的修辞方式更容易激发网民的民族身份时，愤怒型评论占主导；当社会语境和文本的修辞方式更容易激发网民的阶级身份时，反向愤怒型评论的比例会上升。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是就民族主义引发对外战争而言。双刃剑的意思是既伤害了其他民族，又伤害了自己。本文的研究表明，媒体的民族主义实践，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导致对外冲突，也有可能引发内爆。尤其是当国内矛盾较多，而媒体转移矛盾的意图非常明显时，网民的愤怒情绪常常是指向内部的。

限于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本研究依然存在众多问题，需要后续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1）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文本分析，而非科学的抽样调查，无法代表整个新媒体网民的态度；（2）笔者对评论进行分类，并未采用客观标准，而是通过笔者一一识别，这样的做法无法应对更大数量的文本，所得结果也并不准确；（3）本文的研究重心放在涉日微博所引起的受众情绪上，而主流媒体新媒体账号的涉日报道的策略，对日本形象的建构等，依然需要继续研究；（4）网友的评论肯定与其具体身份有关，而本文没能对研究对象的身份进行充分调查，只依据新浪提供的大数据，阐释深度和准确度肯定不够。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弥补这些问题。✂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研究项目“微文化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SC-2014-A-03）的阶段性成果。

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
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
现在的发展，我没有遗憾。

——陈明忠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评论小辑

无悔

本辑所配图片及说明出自《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三联书店，2016）一书，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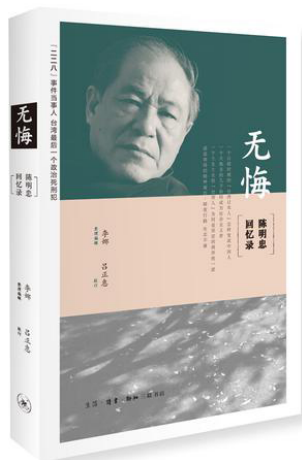
大陆版《无悔》出版后记

吕正惠*

当初我构想《无悔》这本书时，主要目的是想让大陆读者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最近二十年，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气焰高涨，大陆不论是对台工作者、还是一般人，也都比较熟知这方面的事情。很多人可能因此认为，台湾同胞一直以来都想独立，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想让大陆同胞了解台湾过去复杂的历史，让大陆同胞了解台独势力为什么会在近二十年突然澎湃起来。我们认为，如果大陆同胞对台湾的历史有更好的认识，也许能够对两岸的来往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要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陈明忠先生讲述他一生的故事。

陈先生生于1929年，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末期，他经历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台湾、国民党的恶政引发的二二八起义、加入中共地下党、关押十年、出狱后继续搞秘密活动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后提前释放、参与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和劳动党、不懈的

* 吕正惠，曾任教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现为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著有《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等。



大陆版《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书影，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

为两岸的统一而努力，他的一生就是七十年来台湾历史的缩影。如果能够用比较生动而又朴实的方式来讲述，一定能够吸引大陆读者，让大陆读者透过他的一生更深入的了解台湾的历史。

我的前期工作就是努力说服陈先生同意讲述他的一生，然后找到适当的人来录音和整理，这个过程在我所写的《无悔》的序中，和李娜所写的后记中，都已经说明过了。台湾繁体字版的《无悔》2014年5月出版，印1000本，不到五个月就卖完了，马上再加印500本。书出来以后，我寄了一些给北京和上海的学界朋友，凡是读过的人都说，很好读、很精采、读完后很感动。经过一番努力，大陆版也终于问世了。今年四月在北京三联书店开新书发表会，一时颇为轰动。八月上海又办了一次，也相当引人注目。前几天我到成都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见到会长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陈教授是大陆极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他跟我说，他已经读完这本书，很受启发，刚好有人要他推荐近期的十本好书，他已经把《无悔》列进去了。我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无悔》竟然也可以吸引一位古代文学专家，说明这本书具有普及性。

在北京的新书发表会和座谈会上，我听过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和汪晖教授的发言，他们都对本书有深入的分析，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我又听了罗岗、郭春林、倪伟和吕新雨四位教授的发言，内容都非常充实。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

陈明忠在台北家里。（李娜摄）



也比较详尽的谈论了，陈明忠先生对我理解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产生的启示作用。上海座谈会后，余亮还写过一篇文章。我相信，这是一本值得继续探讨的书。

我最近很忙，无法写长稿，在这里只简单谈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吸引人。当然，陈先生的一生可谓历尽波折，事件纷至沓来，好像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类似走马灯。但情节复杂并不一定可以让人一直读下去，更重要的是讲述的方式。陈先生个性直率，讲话不太保留，又因很晚才学普通话，讲起普通话来根本不顾及修饰，因此他的语言非常口语化，而这种口语话又充满了闽南话的风味，很有特色。其次，他记忆力极好，记得许多小事件，这些小事件累积起来，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大时代的背景。譬如二二八起义时，他看到一个台湾流氓要把脚踏到躺在地上的外省孕妇上，他上前阻拦，因为他手上有枪，那个流氓只得逃走。他由此想到，一些不懂事理的台湾人可能会殴打、甚至杀害台中农学院的院长和外省籍老师，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于是他赶回学校，把院长和老师集中到学生宿舍，让他的学弟林渊源（后来当到高雄县长）加以保护。我也曾听过一些类似的故事，这就充分证明二二八起义并非省籍矛盾。陈先生经历了许多大事件，而这些大事件都是由许多小事件构成的，他讲了许多小事件，大事件的视野也就自然形成了。发生在他个人身上的小事件，证明他是一个充

满了生命力与正义感的人；而他在回顾这些小事件时，同时又具有广阔的时代眼光，这说明他质朴的个性里有很强的反思性格，他的知识视野要高于一般人。我们读他的讲述，只觉得整本书很吸引人，往往忘记了是他那种整体性的智慧把这些小事件统一起来，使这些小事件不至于变成一些零碎的小事。

当然，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其本人的性格会在讲述之中不自觉的流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脾气很硬，只要有不合理的压迫，他就反抗。他不怕死，为了反抗歧视与不平等，他参加地下革命组织。他富有激情，又看到前辈一个一个被拉出去枪毙，他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要循着他们的血迹继续走下去。为了完成革命目标，他又极有耐性。在参加党外的政治聚会时，他提前一小时到达，聚会结束后，他延后一小时离开，因此在饭店门口监视的国民党密探，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参加聚会的一员。他的决心极其坚定，他的行动极其勇敢，但他做起事来又能够极其谨慎而隐密。他的这种人格特质是以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你觉得有一种迷人的力量，但又不知道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我经常跟他相处，听他谈过去的事，这种接触让我更容易理解他的人格。读者没有这种机会，但只要仔细阅读，也能体会他那种人格魅力。台湾著名的导演侯孝贤非常尊敬陈明忠先生，因为他也完全理解陈先生的为人，并为之折服。

简单一句话，这是一本深具文学价值的回忆录，而这本回忆录讲的却是一个革命者的一生，因此也就增加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奇情异采。

2016 年 9 月 13 日 匆匆草成 

接续红色血脉 重建台湾叙述

吕新雨*

我想谈的是怎样接续红色血脉，在民族大义中重建台湾叙述？陈先生这本书对今天两岸关系来讲，更重要的意义就是重建台湾的历史叙述，是如何重新理解“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对于今天两岸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是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斗争的起源，这使得台湾问题被固化在“台独”和“独台”的政治困境中。陈先生这本书强有力地打破了这个叙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承前启后的历史见证者，让我们看到“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一代年轻人由此转向红色中国，对这一转向的严酷镇压才是白色恐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斗争，这背后遮蔽的其实是台湾反帝反殖民的红色血脉，这一历史被国民党掩盖，被民进党曲解，才使得对族裔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构建获得操作的空间。这个叙述的打破，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重建社会主义统一就是不可能的。

*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1995年四月二日参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

第二，就是怎么重新理解今天台湾当局推动的“转型正义”。蔡英文上台后推动的“转型正义”既是针对国民党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为了抽掉大陆统战的基础，为其彻底的“台独”铺路。而所谓“转型正义”的核心正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我们已经看到蔡英文开始通过任命台独派担任新的国史馆馆长，强占历史话语的解释权。国民党背后实质上是美—日霸权结构，因为陈先生的前半辈子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第二次入狱其实是在美—日的霸权结构下，国民党是在美—日的支持下才如此肆无忌惮，在七十年代还把陈先生投入狱中。按照陈先生的批判，“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府，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植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帐，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陈先生强调如果不检讨国民党背后的美—日霸权结构，

2010 年于新生南路福华文教会馆举办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秋季追思慰灵大会”。



民进党所谓的“转型正义”就是虚假的，这是重新建立两岸历史叙述非常重要的起点。只要认同美日帝国主义霸权的世界格局，“转型正义”就是扬汤止沸，以族裔政治来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义，以族裔政治掩盖阶级问题，这样的“转型”不可能转向新的和平，而只能是相反。

第三，就是社会主义信念如何坚持？除了身体力行，陈先生一辈子都在从理论上探讨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问题，不断地把自己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其曲折和失败，和理论结合对照探索，在这本书中，因为对理论的敏感和重视，他开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话题，今天都是值得重新讨论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的重新叙述，在台湾语境下和大陆语境下的不同。

最后一点，陈先生这本书是在世界史叙述和世界大势中重新建立台湾的位置和台湾的未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接续红色血脉，对世界的未来持有信心。如果不能在坚持反对美一日霸权这个世界史转换中来理解今天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大陆所处的历史位置，不结合这些来讨论的话，我们可能就对社会主义的统一抱很悲观的态度。“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向前走”，陈先生一代人已经交出了自己的历史答卷，未来的历史在我们手里，需要我们去决定，能不能继续向前走。🌈

“失败者”的战斗与胜利

蓝博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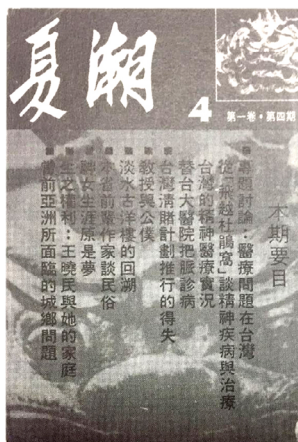
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陈老的历史贡献等，前面很多学者都谈了。我现在还能谈出什么心意呢？我想我就谈一点，李娜整理的这本陈明忠先生回忆录《无悔》，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它的意义在哪里？它有没有可能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乃至最终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问题”做出新的贡献？

刚刚吕新雨提到“红色血脉”这样一个概念，我个人认为这是理解《无悔》的一个关键词。陈明忠先生的生命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重建台湾的“红色血脉”。

陈先生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的 1927 年，他出生以后，殖民地台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社会运动在 1931 年全面瓦解，这是台湾史上的第一次白色恐怖。台湾光复以后，他和同时代的台湾青年，通过投入 1947 年的“二·二八”武装战斗，以及事件后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队伍，才重新跟台湾左翼运动第一周期的人物与历史结合起来。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运动与队伍在 1950 年代国际冷战结构的形势下又被全面灭绝。所以，那时的台湾，“红色血脉”可以说已经到了绝子绝孙的地步。两岸长期分断对峙。陈先生系狱十年。出狱后，在 70 年代左翼思想一片荒寂的“反共堡垒”的土地上，陈老和少数幸存者支持年轻一代的陈映真等人创办《夏潮》杂志，重新挖掘了被湮灭的日据

* 蓝博洲，台湾苗栗客家人，小说家、报道文学作家，著有《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等。

陈明忠在筹办《夏潮》期间二次入狱，此为《夏潮》出刊时，特地在“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广告，以便告知绿岛的左派政治犯。



时期的台湾的历史与文学，颠覆主流的反共文艺政策，引领台湾的进步思潮，带动各种社会运动，并且通过乡土文学论战取得重大胜利，把台湾的文艺思潮导向关怀现实的道路。

按照道理，路应该这么走，如果这么走下去的话，今天的台湾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路却不是这么走下去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国际大气候与两岸关系发展牵动的岛内政局变化，夏潮后来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倒退。我个人基本上是在中学时候因为《夏潮》杂志的启蒙而有了素朴的社会主义倾向，可等我投入现实的社会实践时事情却不是这样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向左转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向右转了。

例如，1980 年代，经过乡土文学论战洗礼之后的我们看到大陆的朦胧诗时，就觉得历史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好不容易从朦胧走到现实，可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却是从现实走到朦胧。到了 1990 年代，我们开始到大陆参加会议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陆学者讲的话我们几乎都听不下去，他们所讲的东西几乎都是我们早就扬弃的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举例来说，吕老师曾经让我陪他去找一个写台湾进步作家吕赫若传记的青年学者，想要说服他不要用西方的学术话语写，而要根据作家的历史脉络去写。谈到最后，这个青年学者才无可奈何地摊牌说，你们讲的这些我不是不懂，可我要照你们讲的这么写，人家会认为我没学问。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 1990 年代的大陆的社会氛围。

同样地，1976 年再度入狱的陈先生也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困境。据他自己说，当他在牢里看到《中央日报》刊载的大陆的伤痕文学时冲击剧烈，起初他不相信，告诉自己说这是反共宣传，可到后来不得不相信时，他就痛苦地自我反问说难道我所追求的理想真的是这样吗？他于是在出狱后通过大量阅读与实地考察重新去认识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继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可是，我们又看到几年来大陆刮起了所谓美化“民国”的热风，乃至脱离现实地昧昧夸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早就被丢到历史垃圾桶的那些反共的现代派的脱离现实的文艺作品与人通通都在大陆变成了主流。而我们这些吃错了陈明忠先生那一辈人辛苦哺育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奶水，接续了现实主义文艺道路的人与作品在大陆反而是相对有问题的。

这当然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可当这样的民国热发展到甚至歌功颂德蒋介石的历史作用时，我就完全没办法接受了。你说蒋介石对民族的贡献真是那么大的吗？那么陈老他们那一代人的受害历史怎么说？即便陈老他们不计较个人的遭遇，我们还是要问，今天一小部分台湾人的“台独”意识是谁制造出来的？不是蒋介石吗？还有，1949 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怎么用关东军搞“白团”。所以我认为早在败退台湾的蒋政权把陈明忠那一代人大量地关进牢里，把无以数计的爱国者押到马场町刑场枪决的 1950 年，就决定了台湾社会的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致道德沦丧伦理败坏而在今天全面爆发的恶果。关键就在这里。

如果就现实政治来说，1895 年以来，被祖国弃置的台湾爱国志士追求有尊严地站起来作人的行动一路都是失败、失败、失败……。所以台湾的爱国主义历史虽然是“光荣的”却未曾有过辉煌的胜利。陈先生的生命也是这段大历史的其中一小节，他每干一件事就坐牢，基本上没有一件事是成功的，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从这点来看，我跟陈老开玩笑说，吕（正惠）老师把书名起为《无悔》，意思很贴切，因为就我们这个“红色血脉”整体历史来讲，我

们不能说我们有光荣的什么什么胜利,我们只能说我们走到现在还是“无悔”。“无悔”,是一个现实“失败者”对待人生的态度。因此《无悔》是一本“失败者”史观的回忆录,它讲的是一个“失败者”的历史。但是这个“失败者”每一次仆倒之后都挺过来,站起来,继续前进。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陈先生及其同一代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

我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喜欢阅读另一种“失败者”史观的历史书写,比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1949》,也是“失败者”的史观,可是它完全没有站在超越国共内战的历史高度去看国民党的失败,到今天,这个“失败者”史观还是每有跳脱反共的冷战思维与论述。如果这样纠缠的话,那么中国人的未来怎么办?台湾民众的未来怎么办?所以恰恰因为有类如《大江大海 1949》这种“失败者”史观,“台独”史观的论述才逐渐变成台湾的主流,因为反共的本质是一样的,“独台”只能为“台独”开路。

那么,大陆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陈明忠先生这一本书所反映的台湾的“失败者”的历史呢?曾经有一个大陆的年轻学者问过我,为什么他看我所写的这些台湾历史,听我讲这些台湾人物的故事,都会感动,可是这种人大陆更多啊,他们就是反感。我说我充分理解,因为 1949 年革命成功了,大陆的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抽象化了,是英雄,但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英雄,而像陈先生这样的台湾先行者虽是“失败者”,却是走在地上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有被侮辱的经验,更有站起来的渴望与对理想的追求,所以可以感动年轻人。因此我希望陈老这本书,能起到两岸关系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新的“反攻号角”的第一声的作用,影响更多的大陆青年,从而“出口转内销”,影响台湾青年的历史认识。如果大陆青年没有错误的台湾认识,那么,“台独”或“独台”的那些论述基本上是改变不了两岸历史的既定进程的。这就是我对《无悔》的期望。🌈

厘清历史，用知识和文化争夺未来 ——陈明忠先生《无悔》的启示

郭春林 *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没有悬念的结果，宣告了国民党这一轮政治博弈的失败。虽然，蔡英文上台百多天后就遭遇了台湾政党选举制度实施以来最早陷入社会抗议最多的尴尬和困顿，但这并不表明民进党会放弃其台独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台独意识形态在岛内影响力就会因此下降。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在发展主义仍然作为主导性的治理理念的语境下，毋宁说，蔡英文遭遇的主要仍然是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实施中的阻力。如果民进党的与去中国化—台独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获得成功，统一进程受阻似乎也是必然，而其经济政策未始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对大陆来说，如果幻想着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就能够实现统一大业，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统一大业既不是发展主义的经济手段能够实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国家目标，而是事关历史和政治、知识和文化的整体性事业。

* 郭春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据说，蔡英文成功当选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没有及时修改中小学历史课纲有关。马英九当局基本继承了之前突出台湾本土主体性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而本轮竞选，接受了这一“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的年轻人成为“首投族”。虽然不能说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但这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论者已经正确指出的：“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在形塑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时，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无可取代的。”¹而 1990 年代以来，台湾以历史教科书为主所进行的、以“培育”本土主体性为目的的历史教育正与台独意识形态互为表里。在这个意义上说，厘清历史，还原历史真相的历史教育就非常重要，而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及其传播是与之相关的事项。

我以为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承担着这样使命的著作，虽然它尚未进入历史教科书（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显然还有一段时期），而只是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它不是整体性的历史著作，只是个人历史经验的回忆和记录，然而，由于陈先生的特殊经历是嵌入在近现代台湾、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的，是属于这个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因而，它也就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经验记录，而具有了更为广大和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使命，更不必说，在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介草民，多半也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²

陈明忠先生的特殊经历，简单说，就是该书封套上的话：“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一个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

1_ 李理《“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台湾研究集刊》，2008 年第 2 期，第 26 页。

2_《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最初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于 2014 年，而其最初的动议则始于 1990 年代台湾统派的年轻人“希望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但据吕正惠先生说，真正的动力则是在 2008 年，吕正惠先生受时任《思想》主编钱永祥委托，与陈宜中一起访问了陈明忠先生，访谈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发表后“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映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陈明忠先生才答应做口述回忆录。（参看《无悔》“序”）大陆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 2016 年 4 月，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

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当“日据”在1997年以来岛内的历史教科书上被刻意地改为“日治”，当一部充满压迫、掠夺的殖民史被“改造”为无差别，甚至是为殖民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现代化史，当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历史被叙述成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时，历史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已经被他们任意删改、肆意糟蹋、恶意肢解为鲜血淋漓的碎片，他们就用这些碎片遮掩着卑劣而丑恶的嘴脸。然而，历史绝不会永远沉默，被掩盖的真相就如同顽强的野草，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已故林书扬先生在1980年代末组织集体力量，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百万余字的日文版《警察沿革志》翻译工作，他在回答访谈时就明确说到：“这是一部站在殖民者的立场所整理出来的殖民地反抗史，我们要如何正确认识殖民地反抗运动？这一定要有基本的史观、社会观、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价值观，这样的反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盲动？日本人是否替台湾社会奠定现代化？所谓‘帝国主义有功论’的价值观又何在？”³ 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正是从殖民地反抗史的角度有力地回答了林书扬先生提出的问题。

陈明忠先生迄今八十多年的人生路，被高度浓缩为上述那三句话，但人生是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月，一年年过来的。当我们知道陈先生有二十一年有余的铁窗生涯时⁴，当我们看到他虽然并没有过多地描述其遭遇的刑求，而我们也能在字里行间想象其被残酷迫害的情形时，当我们读到将近60岁的他在保外就医期间冒着三进监狱的危险，仍然坚持政治斗争，联络同志，参加游行，组织抗议，筹建组织……的时候，我们除了敬佩，就是不得不面对这个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里已经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驱使陈先生经受住酷刑的折磨，仍然不改信仰？是什么力量让陈先生在严酷的现实磨难面前不屈服，

3_ 林书扬《林书扬文集》，卷一之《台湾人民反抗运动的价值与特性》，第150-151页，台湾人间出版社2012年初版。

4_ 陈明忠先生第一次入狱是1950年夏，出狱是1960年7月；第二次入狱是1976年7月，1987年3月以保外就医离开国民党监狱。

不背叛，不舍弃最初的信念？陈先生告诉我们，就是那一种强大的精神力使他顽强地战胜了一切：“……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认为‘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精神就不会崩溃了。”⁵

无论是信仰，还是信念，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也像无数的革命者一样，最初都来自被压迫的遭遇，而陈先生最初所遭遇的压迫就是他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台湾日本人”被侮辱的切肤之痛：“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⁶确实，从在高雄中学被侮辱，并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而也正因为是中国人才会被侮辱，到他“突然体会到，我家佃农对我的态度，和‘三脚仔’对日本人的态度没什么不同！换个立场看，在佃农的眼里，父亲和我不就等同于日本人吗！……原来我从小就扮演了压迫者和歧视者的角色。”⁷后者的体会在陈先生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一个升华，它意味着这不仅仅是道德境界的极大提高，完成了从被压迫者的感受到对自己作为压迫者的反省和自我批判，也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甚至是一个飞跃，从对民族压迫的切身感受出发的反抗，到对阶级压迫的体认，最重要的是，这两者是同一结构在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体现，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必然内在地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样，反过来，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压迫，则对外也必然地表现为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可以说，这是台湾共产党人普遍的情感和思想历程。林书扬先生有一个更

5_《无悔》，第176页。

6_《无悔》，第234页。

7_《无悔》，第46页。

为简练的概念化表达，他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他“在三十四年七个月的长期狱囚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⁸ 陈映真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一思想脉络，后来的年轻人才能从他们身上和文字中感受到力量，把握到精神，并以此滋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赵刚先生在《“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一文中就坦言自己的思想变化，因为陈映真，他才开始了“从一个完全信服普世主义的方法与价值的美式社会科学的青年学徒，到一个重新企图从自身与区域的历史找寻思想出路的‘初老’学习者，企图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东亚，乃至重新认识世界”⁹的转型，即使这一转型是充满挑战性，甚至是危险的。

在我看来，这是解决今天在港台地区不断出现的吁求独立的社会运动的一条有效路径。民族主义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它也确实制造了很多民族灾难，而在现实中，民族主义也常常被挤压，并可能反弹为更狭隘的国家主义；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就应该将它视为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舍弃掉，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是最有效的动员力量，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主义也是对抗西方封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有力武器，即使在现实中，在国家尚未消灭的今天，在对抗美帝国主义及西方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也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反抗力量。有意味的是，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和台湾，都有不少人一听到民族主义就无比紧张，他们不是将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压迫，而是急急忙忙地挞伐民族主义，将国家视为本质之恶，甚至是一个原罪，恶之渊薮。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无论是根本不愿意写回忆录的林书扬，还是只做了口述回忆录的陈明忠先生，他们都没有过多地描述自己曾经的苦难，而是更多地从历史经验出发来分析现实，回应现实的问题。台湾有学者已经指出，

9_ 参看赵刚《“不合时宜”的陈映真文学》：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U5NjYwNQ==&mid=2650718650&idx=1&sn=7cdf71d5abb27641fa4d9795b519ab44&scene=1&srcid=0908z1XA89mqwljJLv48osSa#wechat_redirect

仅仅有苦难叙述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去追问：1、他们经受了怎样的苦难；2、他们为什么经受苦难？3、他们为什么能经受苦难？4、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与现实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于希望透过口述资料认识历史的当前社会与读者而言，逮捕、审讯、刑求、入狱等等苦难的描述与记录，确实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透过逼视此般真实苦难所产生的不愉悦感，才有机会让观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白色恐怖苦难的真实性与暴力本质。然而，若仅仅只有‘个人苦难’的描述，缺乏对‘生产苦难’的体制与历史的问题意识提醒着，那么风险将很有可能是：本来期望还原历史真相的口述史工作，却因抽空了历史经纬而仿佛剩下个人的苦难史，如此一来反而让我们陷入一种国家暴力‘没来由的恶’的陷阱之中。”¹⁰ 陈明忠先生回忆录的录音整理者李娜博士就正确地指出，“他（引按：指陈明忠）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¹¹ 在我看来，这个斗争不仅仅是在历史知识的场域内，也是，并且也必须是在现实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中展开。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必须承认，无论是台湾的古代史，还是现代史，我的知识准备都是严重不足的。然而，虽然阅读并无知识上的阻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对回忆录中的一些看似细节，实质关系重大的知识点就可能视而不见。譬如，如果不是吕新雨和罗岗两位述及，我就未曾注意到陈先生提及的“白团”¹²，继而查百度百科，始知 1950 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岛内的白色恐怖恐怖到怎样的程度，又荒唐到怎样的程度。而整个 50 年代，国民党“总共

10_ 陈柏谦《挖掘、拼凑历史过程中遗忘“历史”的陷阱——一个“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门工作者的自我意义探求》，《台湾社会研究》，第 103 期，第 193 页，2016.06。

11_《无悔》，第 290 页。

12_《无悔》，第 96 页。参看百度百科：“白团于 1954 年向蒋介石提出秘件《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在 1958 年的八二三炮战中，白团将领也亲赴前线；白团后于 1968 年撤出台湾，1969 年 2 月 1 日于东京解散，不少成员复入日本自卫队，将对中共作战经验带回日本。”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b13f3sELzVaZUP9KSR-nBeTO_5JgEN8GE5TQQbTwRBm_wgcj5q-oA1xC7MwMjhpoNduXHDv-jb0slpKCJQc5a#2。2016 年 9 月 13 日。据罗岗和吕新雨介绍，台湾已经出版相关的研究著作。

抓了十四到十五万人，枪毙了一万多人，冤枉的人实在太多了¹³。其恐怖程度足以当得“骇人听闻”这四个字。

而这些史料大多数是在 1980 年代以后才逐渐成为有识之士和有志之士关注的对象，在林书扬、陈映真、陈明忠等老一辈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蓝博洲、赵刚等年轻一代的搜罗、查访和深入的解读、研究，以及近年来更年轻一辈的努力参与下，至今虽有二十余年的积累。可是台湾当局，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马英九当局，都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些已有的历史研究成果纳入学校的历史教育框架，包括在史料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分析，这些分析既有某一学科内部的，也有不少跨学科的分析，同样没有融入学校教育知识系统中。相反，一面是民进党大肆宣扬台湾本土的主体性，以颠倒黑白、移花接木的方式别有用心地将“二二八事件”叙述成台湾的悲情；而国民党对此多采取半推半就的姿态，为遮掩其曾经的残暴，将“二二八事件”解释为台独的发源，故意忽视，甚至完全无视在美国强迫下，站在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利益上进行的不彻底、不公平的土地改革在台独力量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然也加入到美化日本殖民者的队伍中去，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¹⁴。究其根本性的问题，正是上引陈明忠先生说到的“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汪晖在为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所写的序言中说：“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¹⁵ 陈映真称这一体制为“双战体制”。双战体

13_《无悔》，第 113 页。而据吕正惠先生，“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初雷厉风行地肃清岛内倾向或同情共产党革命的人。根据今人的统计，因此而被整肃的人高达十四余万，包括至少三四万人被处死（当时台湾人口约六百余万）。”参看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第 1 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0 年。

14_2009 年，马英九就以“国民党党主席”和“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和曾经的保钓分子，竟然步陈水扁后尘，参加“追思”日本殖民者的活动。参看郑鸿生著《寻找大范男孩》“郑鸿生作品”前言，第 14 页，北京三联书店 2013 年第一版。

15_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序言”，第 12 页，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第一版。

制是理解台湾现代史唯一正确的切入点和基本框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属于历史的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也颇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李娜说，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以其“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¹⁶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人民被边缘化，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对压迫阶级统治阶级的反抗被遮盖、被颠倒、被置换，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人民被愚弄、被鱼肉，然而，人民就是人民，即使被愚弄、被鱼肉，再怎么卑贱，他们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精英就是精英，即使他们再高尚，也仍然是统治者、压迫者，甚至剥削者。

人民需要接受好的、正确的教育，尤其是被操弄、被宰制的人民。历史教育就是知识教育的重要方面。问题是谁是正当而又正确的教育者？葛兰西说国家就是一个教育者，但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好的教育者，这与国家的主权者是谁直接相关，只有人民成为主权者的国家才是真正正当的，也才能真正行使好的、正确的教育。如果不是，人民有权罢免之，由人民自己担当教育者。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忠就是以人民的身份行使着人民教育者的使命。

今天，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工业强大的生产线上，在资本化的传播媒介中，大量渗透着自由主义和台独意识形态的文化商品占领了主流文化的阵地，在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助力下，深刻地形塑着当代台湾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并更加迅猛地再生产着更年轻一代的文化和政治的身份认同，这一现象被台湾学者命名为“天然独”，发生在 2014 年春天的太阳花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政治力量想要登上历史舞台的表征。难怪吕正惠先生要说：“……要在台湾站稳中国立场是非常艰困的。”实际上，对台湾的左统派来说，不惟他们自身的处境艰困，

16_《无悔》，第 297 页。

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也遭遇了巨大的挑战。阵地战的战幕已经拉开，看看最近岛内的各种纷争就可以明了。鹿死谁手，虽不能预言，但必须相信人民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今天，统一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国家和政党为两岸的统一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全体人民感觉到这个事业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衷心认同统一并不仅仅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是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政治问题。

就台湾的政治生态而言，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虽然在统独的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并非只要祛除了美国化，只要摆脱了美国的控制，甚至更激烈地表达为反美，就有了统一的可能。地缘政治在统独问题上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扣，更为关键的仍然是美台关系中的冷战意识形态，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反共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中美关系在今天似冷实热的情势，一方面取决于大陆的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也取决于社会主义观念能否成为统一的社会动员的政治理念。

既然统一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就意味着它不只是台湾人民的事业，也是大陆人民的事业，是香港和澳门人民的事业。但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大陆人的感受而言，当我看到吕正惠先生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一书的序言中一再不安地述及他的文字“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¹⁷时，我感受到一种更为强烈地不安。也许吕先生的不安是他自谦的表达方式，但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正是大陆人普遍的状况，它既是一种知识状况，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认真地检讨一下，在当代大陆的知识教育，因而在当代大陆人的知识系统中，有多少是关于台湾的呢？譬如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台湾文学占比多少？我们有港台文学研究的机构和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可是在整体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或者只有极小的篇幅，更多的是付之阙如，而那极小的篇幅还可能是错误的历

17_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序言”，第1页。

史叙述。我相信在其他的领域情形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严厉一点说，在大陆的知识教育和研究机构中，以独立的形式，看似赋予了台湾更重要的位置，实质却是使关于台湾的知识成为一个更为专门性的部分而存在，从而形成一个无比弔诡的现象：台湾不在中国之内。如果这样的知识状况不加改变，人民在统一事业中的作用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影响统一大业。

与这一知识状况紧密相关的是心理状态。在我不多的与台湾同胞开会和吃饭的场合，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含笑的批评，你们在说中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包括台湾。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政治正确的批评，在我看来它表征了一个不能被表述出来的无意识。而要克服这一无意识，就需要拥有陈明忠先生在看到自家佃农对他的恭顺后能够联想到日本殖民者对他的压迫，想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其实是同构的、重叠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如果不能理解台湾人民感受到的“亚细亚的孤儿”¹⁸的痛苦，不能深刻地体会台湾同胞在说出“百年离乱”四个字时内心的悲怆，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陈明忠先生不改、不悔初衷的境界。而在我看来，这与道德无关，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因而也是文化的问题。对陈明忠先生来说，他的价值观，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台词说，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而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永远不会出差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¹⁹ 我以为，陈先生的理想就是林书扬先生说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2016 年 9 月 14 日于沪上罗店镇 

18_“百年离乱”是郑鸿生先生著作的题名，参看《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2006 年初版。

19_《无悔》，第 282 页。

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

倪 伟 *

威廉·津瑟（William Zinsser）说：“回忆录不是对某人一生的总结，而是朝向其生命的一扇窗户。”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说，一部出色的回忆录不仅是朝向个人的生命同时也是朝向历史和真理的一扇窗户。陈明忠先生的回忆录《无悔》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作为一部口述回忆录，《无悔》也许少了些许自撰回忆录那种沉思的品格，却更鲜明地凸显了陈明忠先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什么力量在激励着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险的人生道路，虽历尽磨难却无怨无悔，不改初心。

和很多经历了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一样，民族意识构成了陈明忠先生思想的原点。他出生于高雄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父亲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在殖民政府里当公务员，是个标准的顺民，从来不批评日本人。生活在这样的

*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家庭里，加上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了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想法，他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日本人，尽管平时说的是闽南话。等到进入高雄中学读书后，被日本同学骂为“清国奴”，甚至连跟日本学生打架都不许赢，他才突然明白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歧视和羞辱的中国人。那时候很多台湾本地人都曾有过这种屈辱的经历，其中有些人便因此参加了民族抵抗运动。但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很快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这一思想飞跃是怎么得以完成的呢？陈明忠先生提到两个原因，一是对阶级压迫的异乎常人的敏感。他们家的佃农在他面前表现得那般恭顺卑屈，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阶级身份的差异及压迫和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民族身份差异及压迫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本能地憎恨一切压迫和歧视，于是萌生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第二个原因是他阅读了来自日本的许多左翼书籍，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思想视野。但此时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罢了，要等到他加入地下组织、经历了诸般考验，特别是在长期的监禁生涯中经过不断地学习、思考，才算最终确立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在台湾光复后的头几年里，青年学生思想上普遍比较左倾。张光直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曾追忆自己当年的历险，他与共产党组织并没有什么联系，只因平时多读了些左翼书籍，思想偏左，便被牵扯进四六事件，坐了一年牢，若非找人疏通关节，更不知要囚禁到何时。甚至连李登辉在当时也是个左翼青年，曾秘密加入台湾共产党。当时青年人普遍的思想取向由此可见。但之后随着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左翼青年被大批逮捕或杀害，进步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中改变思想的不在少数，有些人则走向了台独。陈明忠先生却是个异数，前后两次监禁，长达二十余年，身心都遭到极大摧残，但这丝毫没有销蚀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反而变得愈加坚定。何以会如此？这或许是因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是基于朴素而真诚的信念，是源于内心的良知，而决非如哗众取宠之辈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书影，陈明忠著，台湾：人间出版社，2011 年版

中无所守，只知追鹜思想风尚，以为炫耀或借以牟利。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有一点是至关重要也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对一切压迫和奴役的憎恨和反抗，不管是民族的、种族的、族群的压迫，还是阶级的、阶层的、性别的压迫，都是他所痛恨并立意去反抗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是他最根本的信念。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如此吸引他？就因为它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实践，是以保障每个人的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利为最终目标的。

因为有着这种执念，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不免带着些许乌托邦色彩。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里，他比较充分地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及历史实践的思考。他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拒绝将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尚缺乏为了实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因此充其量只能说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他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观点，强调“只有在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人类才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而现在的世界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生产力水平，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永远要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目标，我们在自己的一生内努力尽到自

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在目前阶段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他因而就能较为宽容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为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为此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是必要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也都是合理的。所以他肯定邓小平的改弦更张是挽救了中国，使得中国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这些看法本身极具争辩性，不仅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在历史的层面上，都还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疑点。但不管怎样，这些思考本身却是值得尊敬的，它们都源自于一种真诚的信念和不懈的思索。

从陈明忠先生那里我们有时也会感受到一股“失败”的气息，他自己就常常说对这一生还算满意，特别是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实力越来越强，以前的那种民族屈辱感都可以洗刷干净了。这种言论不免让人感到疑惑，难道他竟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不是。中国的强大是让他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看到了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为了追求强大而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道路，那他绝对是要拼死反对的。然而在这里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借鉴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者的分界线究竟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以不至于堕落为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那么哪些力量会促成这种转变又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这种转变？这些恐怕都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与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认识和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陈明忠先生似乎无意过多纠结于这些复杂问题，他执着地相信前途终究是光明的，不仅两岸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而且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份自信，这种光明的心境，或许才是他们那代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吧，也正是因为内心有这份光明，他们才能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信念坚定如初。



2009 年陈明忠应马英九之邀，出任“二二八”纪念基金会董事。此为陈明忠在“二二八”纪念馆“台中二七部队”展示区前留影。

作为历史大波中的弄潮儿，陈明忠先生一生的轨迹与历次社会运动若合符节，他的回忆录自然也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证词，尤其是其中关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叙述，有着亲历者所特有的真切感，也包含着冷峻深刻的反思。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已然被神话化，成为建构台独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情感材料。勒南认为构成民族基础的是全体人民共有的光荣与悲伤，其中悲伤这种情感尤为重要。“二·二八”事件即被台独意识形态渲染为一种民族悲伤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想象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材料和相关研究非常多，它们足以证明这一事件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族群纠纷问题，而是各种历史力量彼此纠结冲突的结果，最终以本岛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为其表现形式。在经过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台湾社会的现代化程度的确要高于祖国大陆，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社会治理能力乃至民众的知识和观念水平，台湾都要稍胜一筹。很多人都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当看到接收台湾的国军第七十军那副衣衫褴褛、军容不整、纪律败坏的模样时所感到的巨大失落，从这样的军队身上哪里能看到所谓世界四强的半点影子？这么一个带着浓厚封建性的政权来接管台湾，不仅无力解决战后岛内的动荡无序状态，反而通过统制经济和专卖局等机构来肆意掠夺民众的财富，官员又贪腐成性，此时台湾民众所感到的就不只是失望，而是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憎恶了。所以，

“二·二八”事件表面上虽然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但根本上则是对一个反动政权及其腐败制度的反抗和拒绝。陈明忠先生说自己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洗礼，才在思想上认识到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才有希望，台湾也才有希望。只可惜在当时能有这种思想认识的人实在太少，很多人都盲目地仇恨外省人，以此来发泄对现状的不满。而那些在战争期间在日军中服役并驻扎岛外的台籍老兵，反应尤其激烈。在日军投降时，他们曾被当作日本战俘遭到羞辱，遣返回台后又失去了工作机会，巨大的失落使他们成为“二·二八”事件中最具暴力倾向的活跃分子。很多人甚至忘记了日本殖民者曾给他们带来的屈辱感，而戏剧性地转向了对“皇民”身份的认同。台中“二七”部队的钟逸人在其回忆录《辛酸六十年》里自述：在3月1日深夜，他先跑回家，从旧衣堆里找出多年未穿的日本学生制服，然后跑到台中农学院，用标准的“江户腔调”向学生演讲，而学生们也用日语激动地喊口号；在台中一中，他更是按照战前在日本陆军服役时的规矩，命令学生到外面集合，听从口令，行军礼。戴国辉先生也在《爱憎二二八》一书里写到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亲身经历，有些本岛的青壮年穿着日本的“国民服”与军装，足蹬日本木屐或军靴，头上绑着白布巾，嘴里唱着日本军歌，见到外省人打扮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连小孩都不放过。而戴先生身为本岛客家人，也因为闽南话不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其本岛人身份。如此疯狂的举动就很难用反抗外来腐败政权来解释得通了。

戴国辉先生认为，之所以在“二·二八”事件中出现如此非理性的疯狂举动，是因为台湾人在光复之时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缺乏独立自主地思考“台湾向何处去”这类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台湾的“解放”不是通过自身的抵抗运动而实现的，而是因日本战败而捡来的，因此不能像朝鲜那样拥有整合的主体性。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台湾迎接光复时，很多人的确对祖国大陆缺乏认识，他们被中国作为战胜国四强的虚假表象所迷惑，抱着不切实际的

美好想象，等到真正见识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又因为过度的失望而陷入愤激，竟将祖国大陆与反动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完全等同，进而产生盲目的仇外和排外情绪。“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穿着日本制服、挥舞日本军刀、唱着日本军歌的台湾人，难道真的是认同“皇民”的身份吗？那倒未必，只能说这是在徙倚无主的状态下的一种表演，以表示对国民党接管政权的抵抗吧。对于贫弱落后的祖国大陆，不少台湾人除了失望，心底里恐怕也有点瞧不起，这导致了他们对于形势的误判。参与武装暴动的本岛人，有很多人竟然天真到认为国军不堪一击，因而可以很快将国民党政权驱逐出岛。这种心态隐藏着一种固化的认知，即因为自以为现代化程度高，就看不起比自己更落后的，对自身和对方都不能有准确清晰的认识，因为误解而酿成悲剧，自然也就难免。这难道只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吗？恐怕未必。事实上这也是包括大陆在内的全体国人都有的一种顽固的劣根性，也就是戴国辉先生所说的主体性匮乏。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者的认识和判断，都只依凭某种外在的标准，而现代化程度或是所谓的文明程度，就是最常见的判断标准。以这样的标准去认识自己和他者，都只能看到浮泛的表象，而不能突入到内在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的对于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认识必定是扭曲的。从精神性的角度说，主体性匮乏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才性，在凶兽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凶兽。

主体性的匮乏决非光复后的台湾人所独有的症状，作为接收者降临的外省人包括其中很多的半山人，不也有着同样的精神症状吗？张光直先生回忆说，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总觉得外省人是把本省人看作日本人，而对他们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这种感觉大概是真实的吧。作为征服者的虚妄意识当然也是主体性匮乏的表征，他们不能同情地理解台湾人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愿望，而是冷漠地封闭在自己的意识和认知中。这就造成了外省人和本岛人之间深刻的隔膜。因为隔膜而造成误解，又因为误解而彼此伤害，进而滋长出仇恨。所谓省籍问题或族群问题不就是这么造成的吗？在一个不合

理的社会制度下，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其实所在皆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不同的职业乃至不同的性别，彼此间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隔膜。换言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定会制造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对立，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酿成相斫相杀的戾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因隔膜而造成的误解乃至仇恨，只能诉诸于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更合理也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这不就是陈明忠先生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所获得的启示吗？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他才积极地参加地下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虽然他一生坎坷，理想目标似乎最终也并没有实现，但他一生的思想追求和斗争实践却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怀抱着对于更美好社会的热烈向往，忠于理想，敢于斗争并勇于牺牲，才能摆脱各种狭隘短视的偏见的束缚，获得独立健全理智的主体性，最终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

如何才能超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化的偏见，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彼此理解和包容，这是当前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两岸关系日趋紧张，两岸人民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也逐日加深的现在，最迫切的不正是需要我们去深刻反思自身主体性的根基所在吗？是什么支配着我们对自身和对方的认识和判断？其中是否存在着危险的误认？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而只是简单粗暴地把民族性或族群性甚或政治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视为主体性的根源，那么就必定会加深彼此间的隔膜和误解，进而引发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的仇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在超越性理想的引领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通过持续不断的积极行动形成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纠错，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执念和迷狂之中。这或许正是陈明忠先生的这部回忆录给予我们的最深刻也是最切实的启示吧。🌈

《狱中札记》导论 (续完)

约瑟夫·A·布蒂吉格 (Joseph A. Buttigieg) *

田延 _ 翻译 相明 _ 校并统稿 **

葛兰西的方法

除了政治上和文献上的争论之外，仍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通过阅读这样一个《狱中札记》的版本——它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最初的手稿中的内容——将获得什么？在这篇导论文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解决这一问题。我的目的是揭示仔细研究葛兰西思考方式的重要性、他的札记的年代次序、他分析与写作的步骤和方法、他的计划所经历的变化与转折、他介绍的种种细节、他所做的重大修改的那些小字、他对材料的安排与重组，甚至还有他的整个工作的不完整性本身。我将通过集中关注一组观念的发展轨迹来试着从事这项工作，这些观念首次出现于笔记本一最开始的一小组札记中，它们看起来并不怎么重要。

* 作者约瑟夫·A·布蒂吉格 (Joseph A. Buttigieg)，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主要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著作有《多视角下的艺术家肖像》、《无边界的批评：后现代批评理论中的趋势及逆流》等。

** 田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相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1929年7月至10月间，葛兰西在笔记本一中记录和收集的各种纷杂的想法与材料中插入了如下的评论：

“居维叶的小骨头。与前面的札记相联系的评论。龙勃罗梭问题。有时，由一只老鼠的小骨头就能再现出一条海蛇来。”（I·§26）

每当遇到这种意义多少有些含糊的札记，完整版《狱中札记》的读者很可能对它匆匆一瞥就继续往下阅读。因为尽管它在文本中出现得很早——它们位于手稿的前二十八页当中——然而同一笔记本中，位于它们之前的却是一些俏皮话、姓名目录、插入的简单评论、从里瓦罗尔那里抄录来的格言警句，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材料。所以，读者完全明白，这些大量互无关联的零散材料仅仅是一部暂时的备忘录，当它们在后来的文本中被详细地加以阐述，或者被放在具体的上下文（这一上下文将揭示，它们如何在葛兰西整个的计划、结构以及发展历程中与之“相称”）中时，也许就会获得意义。如果考虑到狱中札记不寻常的特点，就会发现，不可能迫使任何一个读者，甚至是一个专注的读者，去描述其中包含的每一个细小片段的含义，毕竟，这里面对的并不是一部小说，或一部精心撰写的、在其中预示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多多少少准确而有序的意图的“科学”著作。然而，与此同时，读者们在阅读完整版本的札记时，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至少是对交织于札记中的主题思想的总体认识；因而，他们倾向于（尽管只是暂时的）在比如像“领导权”、“文化”、“知识分子理论”等等一些容量大的范畴中，为每一个不固定的片段安排它们的位置。

然而，“与先前的札记相联系”这个短语会让人暂停片刻，因为在这里，“先前的札记”含有对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更为奇特的著作所做的概述。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阿希尔·洛里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太多的内容，甚至根本不意味着什么，除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想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和附录中针对他所做的猛烈抨击。但是，一个对葛兰西的著作稍稍熟悉的读者会知道，那些最晚写作的笔记本中，有一本是用于讨论“洛里亚主义”的，它就像“布雷夏尼主义”一样，是葛兰西作为一种手段建立起的一类主题，能够使他把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归为一类。所以，尽管在笔

记本一的首页上题写的“主要论题”列表中既未提到洛里亚，也未提到洛里亚主义，但是不难看出，题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与笔记本最开始列出的两个论题，即：“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之间的联系。就像用“布雷夏尼主义”作为一类文学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动立场、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对已逝秩序的怀恋以及民粹主义使得他们变成了日后压制人民的、正统的、极端保守的耶稣会士、通俗历史小说家和辩论家的安东尼奥·布雷夏尼的翻版——的常用标签那样，“洛里亚主义”也被用来代表那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粗陋的实证主义、乐观主义、错误的思想以及不谨慎的学术研究，在经济学教授阿希尔·洛里亚的著作与生涯中得到了极好地（而且是令人发笑地，如果不就其广泛影响而言的话）反映。和“阿希尔·洛里亚”有关的这条札记紧跟在讨论“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的第一条札记之后（这一系列札记散落于整个《狱中札记》里面）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条札记的主体部分包括一份书目清单以及对它们的简要说明，这些书目证实了洛里亚对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的强烈偏好。紧随其后的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对洛里亚所做的一些评论。这条札记的结论是，洛里亚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反常的现象，而且对他的气质秉性的分析可以被成功地推而广之，并将许多其他的知识分子囊括在内：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他是一定时期内，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人物中，最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他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认为自己多多少少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的样本。[……]总而言之，洛里亚主义是我们国家某种类型的文学与科学著作的特点（这在克罗齐的《批评》、普利佐里尼的《呼声》、萨韦米尼的《团结》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它与落后的文化组织，因而也与约束与批判的缺失有关。”（I：§ 25）

“居维叶的小骨头”这则简短的札记，以两种方式对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较长的札记进行了补充：它提出把附加的切萨雷·龙勃罗梭归入被认为是“洛里亚主义”的这一类知识分子当中，它还提出，“洛里亚派”的“科学”方法类似于一些被误导的古生物学家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对靠经验得来的证据的误用，导致了错误的、甚至是奇

怪的结论。这种看法完全可以被看作与葛兰西那广为人知的、对任何沾染着实证主义色彩的事物的极度反感相一致。然而，如果暂停下来，更深入地思考“居维叶的小骨头”以及围绕着它的札记，就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对实证主义以及它在知识上的代表人物所做的猛烈抨击。

即使在最初写作这些札记的阶段，人们也能够注意到对不同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类型所做的区分。布雷夏尼主义者是一些新闻写手、小说家、随笔作家、批评家；简单地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文人学士。而一般说来，洛里亚派则是社会科学家。但是，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他们互相区别。布雷夏尼神父的徒子徒孙们都是反动派，不管他们是否自诩为高等文化的捍卫者或一种民族主义和恋旧的民粹主义代表。相形之下，洛里亚派认为他们自己是进步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菲利普·图拉蒂）积极地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经常擅自增补或者删削马克思主义思想。当然，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在思想上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两者都有联系的杰出人士助长了一种知识上的，或者最好说是文化上的环境，这一环境为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条件，并帮助它维持自身。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个关于洛里亚派的特殊方面，需要对它进行单独的、特殊的分析；这一分析将揭示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如何影响了大多数左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这种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会带来何种后果。紧接在“居维叶的小骨头”之后的一条札记证实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 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意大利左翼社会学关注犯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人是该派别的组成人员，这些人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这一倾向是否与此事实有关？还是说这是 1848 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如休，等等）抑或与这一事实有关，即：在意大利，这些人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所震惊，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就不能做更深入地研究？”（I . § 27）

虽然关于布雷夏尼主义和洛里亚主义的札记很明显都隶属于“意大利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及立场”这个总题目，但同样清楚的是，在笔记本一的首页中已经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派别”这一题目，开始获得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更为详尽的说明。

人们注意到，讨论“阿希尔·洛里亚”、“居维叶的小骨头”、“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的三条札记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札记组，它们区别于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的材料（接下来的两条札记与“自然法”和“对历史主义之中的变化的讽刺”有关。相反，这两条札记的后面跟着另外两条讨论洛里亚派的札记）同时，在这一组札记里，人们发现了一种从特殊到更为一般的运动。作为阿希尔·洛里亚的一些最为奇怪的理论文献资料而出现的内容，导致了“洛里亚主义”这一表述的诞生，以解释某种类型（一般所认定的左翼的，或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与心理；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认为采用的是居维叶那背离正道的科学方法；最后，意大利左翼社会学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之间关系（及其历史）的整个问题被展示了出来。

在较为详细地思考这些片段之后，《狱中札记》的读者大概就会进一步看出，在笔记本的最初几页里简要提及的问题是如何被详细阐述的，是如何与后来的札记中提出并讨论的问题编排在一起的，以及在后来按照专题编排的“特定”笔记本的许多情况中，是如何以多少具有系统性的方式被收集和重组在一起的。实际上，我刚刚在上面引用的三条札记，都以稍微改动过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完整版本的《狱中札记》结尾之前——所有这三条札记并不是出现在同一个笔记本中。对这些札记的内容所作的更改和对它们的重新排列，乍看起来都显得不很重要，更确切地说，对于某些人——这些人为了直接比较的目的，从较早的版本跳跃到后来的版本中——它们可能看起来只有相对很小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一大堆片段有心的读者来说——他们已经仔细地查看了好几百页内容，以便把这三条札记的最初版本与最后的版本区别开来——它们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是因为获得了某种极好的解答，不是因为情况变得清楚明朗，而是因为被修改过的札记反映出这一必然没有定论的计划所包含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复杂性，而这些被修改过的札记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我一直在讨论的这组札记中的第三条，当它重新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中，出现在《狱中札记》结尾前时，保留了它的疑问的形式（标题除外）：

“§ 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人们应当考察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致力于研究犯

罪行为的倾向。龙勃罗梭以及他的许多最‘杰出的’追随者们——他们在当时似乎对科学做了最极致的表述——是这个左翼派别的组成人员，而且他们因为专业上的曲解和特有的难题而产生影响，这种倾向是否和这个事实有关？或者说，这种倾向与1848年的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是否有关？（休和他那精心撰写的关于理想化的刑法著作）或者，它是否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意大利，某些知识分子派别被大量血腥的犯罪行为震惊，而且它们认为，如果不首先‘科学地’（即，中立地）解释这一‘野蛮’的现象，他们就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25，§8）

变化似乎很小——这条札记处理的仍然是和先前一样的同一组问题，即左翼社会学与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显现在犯罪学学术话语中。然而，焦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被修改的这条札记现在和另外两条札记分离开了，并被放置在题为“在历史的边界上”这个按照专题编排的笔记本的新语境中。

实际上，声称重新安排“科学主义与晚期浪漫主义的残余”这条札记的位置就意味着焦点的转换并不完全正确。确切地说，它产生的是对各种问题间关系网络的扩展与深化，这些问题是在充斥于笔记本之中的大量片段中被提出来的。因为讨论科学主义和晚期浪漫主义的札记——后来的那一条与早先系统阐述过的那一条内容一样多——仍然要求对意大利左翼社会学话语的系谱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确定这一话语的准确源头，而是在于使它历史化，并且丰富人们对知识分子派别的形成、他们的发展与立场这些问题的理解；这样一种研究必须保留对洛里亚主义现象的研究——不是研究它那貌似进步或者左派的政治学与反历史的科学实证主义相混杂的学说中，最为古怪的那些方面——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这项研究并不停留于一种对于话语结构本身的研究：它还讨论这种话语以及使用它的个人对意大利唯物主义的政治、社会，及文化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强烈影响。切萨雷·龙勃罗梭（1835—1909）通常因为所做的一种改进而被人们记住。这种改进是在处理囚犯的过程中，由他对犯罪学的“科学”研究带来的。在葛兰西的札记中，他的名字极少被提到，但是他与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流派（他们的名字散见于整个札记当中，而且总是和洛里亚主义联系在一起）相关，他的实证主

义观点与理论对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和倒退的影响：除了其他方面，他们提供“科学的”合理性并有助于让一种决定论的（而且是宿命论的）理念持久化，这种理念认为某一类个体（比如说，罪犯）以及某一类群体（特别是南方人）天生地，也就是从生理学上来说，是“野蛮”和原始的。这种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阻碍了人们建构一种对压迫的历史进行阐释的可能性——生理学作为对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种解释替代了政治权力和独裁统治。换句话说，通过把“罪犯”的不安分，把“南方人”的桀骜不驯，把“品德败坏”或者“非理性的”普罗大众的言语行为归咎于反历史性质的生物决定论法则，实证派社会学家们定义了他们自己关于底层群体的历史。

切萨雷·龙勃罗梭——这些社会学家的典型代表和洛里亚派之后的著名人物——不仅出现在笔记本二十五：“在历史的边界上”（底层人民的历史）的最后一条札记中，也出现在它开头的段落里，这一点是完全相称的。第一条札记的话题是大卫·拉扎雷蒂，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派别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该教派活跃于1870年的托斯卡内，那是一个经济极端困难和普遍动荡不安的时期。切萨雷·龙勃罗梭在他的《疯癫与反常的人》这本书里对拉扎雷蒂的论述引出了如下的圆括号中的评论：

“……（这是时代的文化习惯：人们把领袖孤立起来并把自己局限在撰写他的病态的传记中，频繁地采用那些未被证实的，或者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出发点，而不去研究一个集体运动的源头以及它之所以广泛，之所以拥有集体性的原因。对于一个社会精英来说，底层群体的构成成分中总是包含着与之有关的野蛮和病态的东西。）”（25，§1）

人们不禁要再次注意一段评论，它是由一个非常明确、具体的细节所引发的——那就是，龙勃罗梭在把拉扎雷蒂看作是病态的或者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的描述——这一评论是对文化的历史、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底层群体的边缘化进行更加广阔的思考的起点。这种从特殊转向普遍是《狱中札记》里大量内容的特征。很少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先假定一种普遍原理，然后利用这种普遍原理来理解特殊。而且，当片段，或者一些特殊的信息，或者由具体的思考引发出某些普遍的或概括性的深刻见解时，普遍原理并未获得一种给予特殊事物以稳定的意义，同时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超越性理论

的地位。普遍原理和概念自身从来都不是完成或被完成的，它们总是处于与其他普遍原理和概念的不稳定的、日益复杂的关系之中；它们总是显示出不同的综合性联系，但从未确定出一个最终明确的综合体系，而且它们总是要求回到特殊的细节和片段，这些细节和片段保有它们的历史特殊性，尽管它们产生出了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则在一个越来越密集且比先前更加广泛的、不断变换的关系网络中与另一个概念相联系。

通过对第一条专门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札记与后来的那个版本——它占据了题为“洛里亚主义”的特定笔记本的最初几页篇幅——进行比较，就能揭示出笔记本中关于特殊和一般之关系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在较早的版本中，该札记冗长的开头提供了关于洛里亚书籍目录的信息，以及对这些至为奇异的书籍所作的说明。然而，在该札记的初稿（1929）与第二稿（1935）相互孤立的年月里，一份关于洛里亚著作的文献目录已经由路易吉·伊诺第——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知识界和政界的名人——汇总并出版了。从该目录中搜集到的资料现在补充并修改了一些记录在较早札记中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然是葛兰西靠记忆记下来的。（这种借以使甚至极小的文献细节得到谨慎记录的细致与专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然而，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不仅是一个检查并核对文献细节的工具；由它产生出了一段总体性评论，这段评论成为了这条札记剩余部分的导言：

“§ 我记录了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其中人们可以发现阿希尔·洛里亚的主要的‘奇异之处’。（我凭记忆回想起：现在有一份路易吉·伊诺第汇编的‘阿希尔·洛里亚的文献目录’，它是作为1932年9月至10月第5期《社会改革》的增刊出版的；[我的]这份列表显然是不完整的，而且也许遗漏了那些比我所记录的更为重要的‘奇异之处’。伊诺第的努力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它强调洛里亚的科学‘尊严’，并在同时代年轻读者之前不可避免地把所有洛里亚的著作等量齐观，这样便使人产生了一种洛里亚完成了一大堆‘著述’的幻想：在这个数量文化的时代完成了884项著作。对于这种努力，伊诺第理应成为洛里亚主义者名单中的荣誉成员。此外，还应被强调的是，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伊诺第应对洛里亚的‘奇异之处’负责，而且应该专门就这一点写作一条札记。”）（28，§1）

现在不需要解释，这条札记的最初版本所添加的部分如何扩展了洛里亚主义的领域以囊括它的传播途径与合理性，也不需要解释在《狱中札记》的其他部分中，它如何将这整个现象同对知识分子在文化组织中的作用的思考联系起来。但是，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多余，即：伊诺第的文献目录——一件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上“中立的”，而且以客观的证明标准来评判的学术工具（它是完整的吗？它准确地传达出所有必要的信息了吗？）——并没有逃离批判的审查，即便它被当作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使用着。这种批判的审查准确地揭示出批判的严肃性与严谨性的缺失，而这正是运用像文献目录这样看上去“单纯”的工具所进行的汇编的特征。这样的“缺失”和“单纯”体现为复杂性的基本要素——通过放弃他的批判角色，通过佯装站在他的“科学的”汇编对象之外，这个权威的学者（伊诺第）评价并促进了一大批著作的传播（洛里亚以及洛里亚主义者的著作），而它本身是通过一种学术上的粗疏并缺乏批判严谨性的方式被描述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分子立场，其后果是非常多的，而且绝不限于意大利这个地方，这一点在同一条札记的结论部分变得清楚可见。

在被修改过的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这条札记中，在最后两段话里重复了最初版本中发生的由特殊向一般的转变，但却具有显著的差异。洛里亚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后果，以及更重要的，一种使洛里亚主义成为可能的文化批判约束力的缺失，现在被看作是全欧洲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意大利的特点。“阿希尔·洛里亚”这条札记的结论段经过全面的修改和阐释，因为这些段落考虑到了自从它们初次被写出之后五年间瞬息万变的发展。

“洛里亚不是一个畸形的个例：相反，他是一定时期中，某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系列代表任务里面最完善和理想的样本，一般说来，也是那些讨论工人问题，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在深化、修正或者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知识分子阶层的样本。但是，应该被指出的是：每个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或多或少成形的，或者完善的洛里亚主义，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希特勒主义已经表明，处于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明显统治之下的德国，

郁积着一种极端荒谬的洛里亚主义，它已经突破了官方的外壳，并作为一种新的‘官僚主义’的科学概念与方法而大行其道。洛里亚能够存在、写作、著书立说、自费出版书籍和学术巨著一点儿也不奇怪：经常有关于永恒运动的探索者和出版《解放耶路撒冷》续篇的堂区神甫。但事实是，他成为了文化的栋梁，一位‘大师’。而且他‘自发地’找到了大量的拥护者——这就促使人去思考批判堡垒的脆弱性，即使在正常状态的时期里，也存在着这种脆弱性。人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对于像洛里亚这样受到相关力量支持的人来说充满了不受控制的激情的时代，打垮每一个堡垒并改变知识分子文化环境——这一环境仍然脆弱，而且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要摆脱它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是多么地容易。

只有在今天（1935），在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文化’的残酷性和空前恶名予以展示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才明白现代文明（在它的所有必然矛盾的表现之中）的脆弱，这种脆弱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早期（公元1000年之后），并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与以‘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而为人们熟知的思想运动中获得了统治地位。由此产生了像乔治·索雷尔和施本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他们用令人窒息的和毫无生机的空气填补了文化生活。”（28，§1）

如果人们想写出一篇对该短文的详细评论，那么最终当然要涉及笔记本中互相联结在一起的大多数主题思想，涉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显著作用，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人们可能还要将这篇短文和其他讨论洛里亚的札记与讨论布雷夏尼主义的札记、与某些讨论意大利顶尖知识分子（文化的“泰斗”）的其他札记结合起来，以摆脱狱中札记的零散性，从而重新建构一项针对有助于法西斯主义兴起并使之持续发展的文化状况的详细研究。然而此刻，我想仅仅关注记录在这篇短文中的两种思考，它们在这篇短文早期的（而且是更加短小的）版本中已经出现过了，但现在看起来它们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a）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方便，把他们称为洛里亚派）的实证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关注工人问题并且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马克思。（b）洛里亚派在学术上的粗疏以及混乱，这表明整个文化中缺乏批判的严谨性与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和严谨性的确是被科学性的外观所掩盖了，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避开

了（或者说，它至少没有被完全限制住）上层领军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文明的最后保卫者——的指责。在讨论洛里亚主义的札记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提出了许多关心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低劣的思想、不切实际的理论、批判的粗疏以及普遍的知识上的不负责任并非右翼的、反动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独有的特点，它们已经影响了进步的、左翼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从笔记本中进行的详细具体的分析里，人们发现不可能把反动派单单归咎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人们应该意识到的更重要的东西是，社会党人以及在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更确切地说，是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够提供一个条理清楚、具有说服力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即：他们不能够有效地表现一种相反的文化——因为他们自身就缺乏严谨性，而且从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中不加鉴别地采用某些方法与范式。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据在伪科学的“唯社会学论”中被找到了，它是一种未经检验的实证主义，许多札记都把那种软弱无力的歪曲归咎于它，这种歪曲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提出了那些马克思主义流传最广的无益的变体。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修改过的版本中（在笔记本二十八中那条讨论阿希尔·洛里亚的经过扩展的札记后面，这条札记曾经简要地出现过），两个与实证主义社会学互相关联的主要问题被明确地确定下来：

“§ 居维叶的小骨头。对于居维叶的原理的阐述。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居维叶，而且，特别是‘社会学’，不能够与自然科学相比较。在自然科学中，专断的和奇异的普遍原理是更有可能的（而且对实际生活也更为有害）。”（28，§ 3）

就这一点而言，该札记的这一版本清楚地展现出，在早期的构想中，哪些内容已经被暗示出来，尽管是隐晦的；也就是说，那种伪科学的洛里亚主义导致了某些结论，它们和由对科学方法的错误应用产生的结论一样奇怪。然而，这里还表明了另外一点，在对居维叶原理早期的再现中，这一点并未出现（至少不是明确地），但是在整个笔记本中它却以大量变化的形式被反复地表现出来——即：“社会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包括着，对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方法论的不加辨别与批判的运用。对于认真看过对布

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体系》所做的全面、详细并且尖锐的批判的读者来说，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占据了笔记本中的一大部分。（在俄文版中，布哈林的书被起了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教程，葛兰西一直称它为 Saggio Popolare——即：《通俗手册》）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条札记的修改过的版本中，关注那把“社会学”这个词括起来的一对引号也是很重要的。此前，“社会学’这个词已经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并且变得与洛里亚派和布哈林二者的理论及方法论紧密相关。虽然，布哈林从来不是洛里亚派那一伙人的成员（甚至不是像路易吉·伊诺第那样的一位荣誉成员），但在笔记本中的几个例子中，他的思想被直接比作洛里亚的思想（比如，参见笔记本十一，§ 21 和 § 29）。所以，尽管“居维叶的小骨头”被放置在“洛里亚主义”这个笔记本中，但是它概要提出的批判性研究却具有一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在洛里亚主义这个题目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派别的特殊性。实际上，由对“居维叶原理”的提及而间接引起的争议和难题中，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葛兰西所说的“实践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对等起来，并且以一种授予社会学——这是一种在明显的实证论和机械论的观念下貌似科学的“社会学”——以优先权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导言里，布哈林对科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他写道：

“在社会科学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它们不仅仅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单个领域，而是思考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换句话说，它们不关心任何单独的一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着手研究社会的整个生活，关注一切种类的社会现象。这些科学中的其中一个门类就是历史学，另一个门类就是社会学……历史学考察并描述现有的社会生活在某个时代、某个地点如何流变……社会学则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供答案，比如：什么是社会？各类社会现象（经济的、法律的、科学的等等）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它们的演化？社会的历史形式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形式继另一种形式而起这样的事实？等等。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普遍（抽象）的。它经常被叫

做其他的名称, 比如: ‘历史哲学’、‘历史进化论’等等。”

然而, 这并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布哈林不仅仅确定了论述的范围, 这两门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任务。根据他的方案, 社会学为历史学安排了计划; 也就是说, 历史研究的步骤与目标是由社会学预先决定的。这在下一个段落中清楚地显示了出来:

“由于社会学揭示人类进化的普遍法则, 因此它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而起作用。例如, 如果社会学确立了政府形式依据经济形势而定这个普遍原理, 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在任何一个既定时期中, 准确地寻求并找到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必须说明他们具体而明确的表现方式”(HM, 14)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语句中变得有些模糊, 它似乎暗示着社会学依赖于由历史研究所提供的信息: “历史学为得出社会学的结论和总结社会学的普遍原理而提供材料, 因为这些结论不是纯属捏造的, 而是源自于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然而,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清楚地表明, 是社会学指引着历史学而不是相反: “社会学转而构想出一种明确的立场, 一种调查研究的手段, 或者如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 实际上, 这意味着, 即便在社会学从历史学那里获得材料之前, 它也已经知道存在着支配历史的法则; 因此, 根据这一方案,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 总是采用由社会学业已提供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而这种方法将确保历史学总是导向对普遍法则的发现与证实。这一观点在布哈林对序言所做的结论中被进一步强化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拥有一个明确的地位, 它不是政治经济学, 也不是历史学; 它是社会的普遍理论以及它的进化法则, 即: 社会学。……事实上,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一种方法, 这绝不有损于它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通常一门更为抽象的科学会为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一种立场(方法)。这里的情况与此相同……”(HM, 15)

在《狱中札记》里, 针对布哈林提出的主要的反对理由是: 虽然布哈林声称要阐述一种“实践哲学”的“真正的”理论, 但是他从未提供过“在实践哲学的名目下为人们

普遍知晓的，前后一贯并且具有逻辑性的哲学概念（其中许多概念是虚假的，来源于一些毫不相关的原因，而且这些东西必须被批判和揭露）”相反，他脱离了“社会学”本身，制造了一种哲学——实践哲学。然而，社会学“是以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为先决条件的，社会学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布哈林的社会学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的社会学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之上。”与其说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为世界上独立的、真正革命的、非传统的概念，不如说他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一种预先存在的哲学（即：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一种由霸权文化产生的哲学。

“社会学试图创造一种历史—政治科学的方法，它独立于业已详细阐释的哲学体系，即进化论的实证主义之上，社会学已经反其道而行之，但只是部分地。社会学因此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趋向，变成了非哲学家的哲学，变成了一种依据自然科学模式所建构的标准，对历史与政治的事实进行概要描述与分类的企图。故而，社会学尝试着以某种方式，‘根据实验’来抽取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这种方式 and 人们确定地‘预言’未来是一样的，人们也是以同样的确定性来预言橡树会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一事实。庸俗的进化论是这种社会学的基础，它不能够了解其从量向质过渡的辩证原理。”（11，§ 26）

布哈林的错误与洛里亚派的错误相类似：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束缚（令人注意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甚至转向自然科学寻求证据，证明“突变”或者“剧变”这种革命性事件并不违背进化理论的真实性和在这方面提到了居维叶的“突变”论——他把这种理论描述为“幼稚的”。）在“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札记中所做的评论可以被当作针对布哈林的整个方法的指责来阅读。首先，“社会学不能被类比为自然科学”，因此，人们不能够用“橡树从橡子中生长出来”这种方式去描述社会的发展，也不能够像古生物学家运用居维叶的原理，从一块骨头中复原出恐龙那样去建构历史。其次，社会学对自然科学原则的错误应用导致出那些“奇怪的”结论，它们具有有害的实际后果。讨论洛里亚和洛里亚派的札记提供了有关实证主义社会学后果的大量例证。然而，在反布哈林的一连串札记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实证主义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效用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的评论。其中有一篇题为“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

的退化”——这是一篇相当长而且非常重要的，并且涉及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的札记。首先，我想从中引用一个段落，该段落最直接地讨论了由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所引起的危害：

“而且，一旦被用于构想行动的前景和计划，统计法则向政治科学及艺术的扩展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在自然科学中，[统计]法则只会产生谬误和差错，它们可以被进一步的研究很容易地改正；而且，无论如何，在一个将以真正的灾难而告终结的政治科学及政治艺术领域中，它们只能让每一个运用这些法则的科学家显得更加荒谬，而这场灾难则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危害。实际上，在政治学中把统计法则作为一种本质性法则来运用（它不可避免地起着作用）不仅是科学上的错误，而且也成为了行动中的实践错误；此外，它促成了思想上的懒惰和体系上的肤浅。应被指出的是，政治行动的目标恰恰在于把多数人从顺从的状态中唤醒；即：破坏大量的法则。那么这样的法则怎么能够被认为是——一条社会学法则呢？”（11，§ 25）

这篇札记接下来解释了实证主义社会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相冲突。决定论哲学（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是促成顺从的因素，它使群众易受个别领袖超凡魅力的影响，这些领袖永远维持对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机械地齐一化。相反，“群众的党”要通过提高批判意识去推翻“自然的”秩序。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群众设想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一场根据不可变更的自然法则展开的机械论戏剧中无意识的演员；这些法则使得某些人引人注目并授予他们特权，正是这些人声称发现了那些法则并且在他们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僭取了领导的权力。

对布哈林的批判不仅延续了遍布于葛兰西著作中对实证主义的抨击，而且也延续了他的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为了使群众能够获得批判意识而对教育群众这一需要的强调、他的反教条主义和根本的民主主义，以及最重要的：他对“现代君主”（而且，因此连同他对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共产党的特点及作用的全面论述，单从这一段就能看出，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这条独特的札记还证实了，在整个札记中表现出的对历史持续不变的关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对社会学家中的龙勃罗梭派所做的评论，他们对异常行为的解释回避了底层群体历史的可能性。的确，这则札记有助于让人更充

分地理解这样一条众所周知的结论（它在《狱中札记》中反布哈林的篇幅里也能被找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短语时，人们应该记着强调第一个词：“历史的”，而不是强调源于形而上学的第二个词。（11，§27）

实际上，“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退化”这篇札记强烈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退化的社会学观点，源自于它未能充分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应该为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化，以及由它的可能是正统的（比如布哈林）以及不那么正统的（如洛里亚派）信徒所制造的奇谈怪论负责。

“这种退化[从实践哲学向一种社会学的]代表着那种已经被恩格斯批评过的退化趋势的形成（在致两位学生[约瑟夫·布洛赫和海因茨·斯塔肯贝里：1890年9月21日和1894年1月25日]的信中，这封信发表于《社会主义学者》*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1895年10月1日和15日]，还在于它把世界的概念缩减为一组机械的公式，这组公式给人一种把历史的整体都装在口袋里的感觉。这已经成为那些轻浮的“天才们”创作浅薄的新闻急就文章的主要动机。”（11，§25）

换句话说，这些“社会学家们”以居维叶对待一块块骨头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在这一整套方法论原则的支持下，他们在预先确定的总体中把每一项事物都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由于他们误认为他们的机械论公式就是历史本身，所以就不存在任何历史经验，任何他们处理其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由历史研究发现的每一项结论仅仅用于补充细节，并证实总体图景的准确性。这就是当哲学与社会科学被体现于居维叶原理中的同一种“自然主义”支配时，所发生的情况。（葛兰西并不那么反对居维叶的理论；准确地说，是对科学概念的滥用和无用激起了他的批判的怒火。）

同一篇札记中接下来的几句话阐明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实践哲学不是社会学而是历史学，而且适用于它的方法论不应源于自然科学，而应源于批评和阐释的领域，即：“文献学”。

“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是不能够被图式化的；历史本身是无限变化与多样的，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文献学’成为弄清楚特定事实的学术方法，并且使哲学作为历史学的

一般方法为人所理解，这也许才是那些作者们所应该做的；正如在[布哈林的]《手册》第一章[实际上，是‘序言’]中非常简略地提及的那样，这些作者否认从实践哲学中建构一种社会学的可能性，并断言实践哲学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论文当中（这种被十分草率而粗鲁地提出的结论当时是错误的，而且看上去像是唯名论与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奇怪的新形式）。否认人们能够建构一门社会学——它被理解为是一门社会科学，即历史与政治的科学，而且不同于实践哲学——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产生一种对实际观察资料所做的经验主义汇总，而这些观察资料将拓展传统理解之下的文献学的范围。虽然文献学是一种方法论的表现，它能弄清并详细说明具有独特‘个性’的特定事实的重要性，但不能排斥确认某种更加普遍的‘趋向法则’的实际功用，在政治学中，这种法则与统计法则、或者大量帮助某些自然科学进步的法则相一致。有一点没有被强调，即：只有在大多数人对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统计法则才被采用。”（11，§ 25）

在同一条札记的第一个版本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文献学之间的关系被描述得甚至更为简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历史本身，对特定事实的研究，‘文献学’……‘文献学’是特定事实重要性的方法论表现。这些特定事实被认为具有具体而明确的‘独特性’。”

根据布哈林的看法，历史是一种活动，是一个由社会学法则指导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它是社会学的侍女。相反，在葛兰西的札记中，历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分开：实证主义社会学讨论脱离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的普遍抽象法则，而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则是打破那些绝对法则，超越它们并确保人类具有创造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因此，在同一则札记中，紧接着断言道：由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的政党（“共同的有机体”），不是从用数量表示的社会学产生的统计法则那里获得关于群众思想感情的认识；相反，它是“通过‘积极并有意识的共同参与’，通过‘同情’，通过直观的特殊情况的经验，通过一个人们或许能够称之为‘活生生的文献学体系’来获取这种认识的。”（11，§ 25）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是无用的；只是说，它的观点需要被审查，它的整体性力量不得不丧失其合法性，对它的使用应该被小心地加以限制，它的“科学”结果必须经常接受历史的批判而不是相反其他方式。在以“文化的论争。居维叶的小骨头”为题的札记的另一语境中，葛兰西讨论了社会学的有用性。在这篇札记里，社会学被以一种积极的眼光予以看待，但这只是因为它仅仅被当做构建前提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对普遍事实进行公式化表述的工具。它那源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仅在当它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候，而且在它应用于自然现象的时候。此外，社会学被公正地放在历史的从属地位上，它会对历史进行补充，但永远不会取代历史。

“居维叶的关于身体各个有机部分相互关系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人们可以从其中的一颗微粒[假设它自身是完整的]重构出整个身体来——但是，为了准确地阐释他的思想，就应该仔细地重新考察居维叶的原理）当然应该归入法国的思想传统，归入法国的‘逻辑’当中而且应该与动物—机械原理联系在一起。没有必要去考察这种原理在生物学中是否完全有效；这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例如，人们可以回想鸭嘴兽，它的结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等等）。抛开比喻的说法，人们应该考察，这种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社会学中是否正确、有用并且具有成效。答案似乎是明显而肯定的。但是人们必须清楚：对过去的历史来说，相互关系的原理（像类比的原理那样）并不能替代文献资料，也就是说，除了假定的历史之外——这一历史是可能的，但却是假定的——它不能够提供任何东西。然而，谈论政治行动和谈论那些用于可以预见的事物，用于提出可能的假设和预期的相互关系原理（像类比原理那样）是不同的两码事。在假设的领域中，这一原理的确是有用的、正确的和富有成效的。而且这是一个找出哪一种假设最为可能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是，当相互关系原理用于个人的、甚至是群体的活动中时，就会经常存在陷入武断的危险：个人和群体行动时并不总是‘有逻辑地’、‘有条理地’并且‘必然地’等等，但是以人们这样做为前提开始却往往是有用的：个人和群体并不总是‘按照逻辑地’、‘条理清楚地’并且‘依据推论’去行动等等，但是以此方式假设人们的行动并展开讨论却时常是有用的。提出行为动机‘不合理性’的假设起不到任何作用，它只具有争辩的意义，让人就像经院哲学家说的那样：“以

下任何皆为荒谬（*ex absurdo sequitur quodlibet*¹）”（14，§ 29）

只有以这种方式思考并且通过所有这些解释去理解，社会学方法才能够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有用的。通过一个被明确限定的语境，将居维叶的原理局限于假定事物的范围中，人们防止了把这一原理抬高到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的危险（和诱惑）。因此，在《狱中札记》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布哈林的篇章，与反克罗齐的那部分非常相似，都是由一种需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免受形而上学侵害（及挪用）的紧迫感所激发的。对历史的强调——从差异、多样性、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历史——除了形成对以各种样貌，特别是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出现的形而上学，所做的防御和积极抵抗之外，别无他物。尽管形而上学的冲动小心翼翼地把特殊纳入一般，同时立即使个体的现实性服从于整体的需要，但是就像在笔记本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寻找着重新获得这些断片、弄清楚它的特殊性并且详细描述其差异的方法。历史学通过抛弃那种享有优先权的沉思默想的观点，而代之以从事实的、物质的文献学和批判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正是由于缺乏批判的严谨性和对具体事实的文献学的关注，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歪曲，所以批判和文献学都需要保持其独特性，即革命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品质。一条最初定名为“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的札记以及它的修改版本——它被放置在用于写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的笔记本中——包含着以下的结论：

“由实践哲学带给政治科学与历史学的基本变革，是这样——这样一个证明：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这是一个源于宗教思想和超验主义的概念），而是说，人类本质是被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范围内，能够通过文献学和批判的方法来确认的历史事实。”（13，§ 20）

在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任何地方，文献学的和批判的方法都明显地起着作用。占据了《狱中札记》大部分篇幅的、对于克罗齐所做的持续而且仔细地批判性分析广为人知，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在不可计数的评论文章中被谈过了。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布哈林的详尽的

1_ 拉丁语，一时无从考查，暂时保留原文——译者注。

批判，尽管它同样也具有分量。类似地，众所周知，大量札记被用作对意大利文化，特别是意大利文学所作的批判分析。然而，记录在笔记本中的大量详尽的事实信息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而且多半还被忽视了——不知为何，在笔记本中起着作用的“文献学”的方法还没有吸引到很多的关注。要理解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难。实际上，对葛兰西文本的每一项说明与讨论都包含着关于它的零散性与未完成性的思考。这种思考经常伴随着这样的假设，即：从这些断片中重构出一个条理清晰的整体是葛兰西派学者的任务。这些札记的零散性通常都被含蓄地，或者准确地归结于严酷的条件，它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碎裂被认为是一种不幸的障碍物，它妨碍我们理解葛兰西要说什么；或者，如果葛兰西拥有时间和方法去写一本或者一系列“正常的”书，他又会说些什么。因此便产生了“编排”这些笔记本、围绕某个主题或在某个类目之下汇集这些片段的努力。这些主题或者类目经常源于题写在许多笔记本自身上的那些标题：“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尼可洛·马基雅维利”、“对一组知识分子历史的文章所作的札记和注释”、“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文学批评”等等。鉴于笔记内容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把文本以一种“可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需要，也使得那些明显次要的，或者与笔记主旨发展并无关联的细节有了意义。葛兰西派的编辑、学者或者评论家因此感到，不得不把这些断片汇集起来，并且像一个当今文坛上的居维叶一样，把它们连结在一起。有时，这种重构的工作是被负责任地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对其界限持有批判性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另一些时候，这种工作却是以一种误导人的看法进行着，即人们不仅能够现实地重构出葛兰西的思想，也能重构出葛兰西自身。后一种工作就是产生诸如“列宁主义的葛兰西”，或“克罗齐派唯心论的葛兰西”，以及任何一种葛兰西的原因。即便是由对他的各种盗用而产生的“自由主义葛兰西”这一称呼，也时常是由这样一种想象引起的，即：人们可以返回到那些不连贯的笔记本中，并且从中重构出一个唯一“真实的”的葛兰西。无论这一情况发生在何时，这些笔记本都会变成一个欢乐的、有希望找到自己所需事物的地方，人们从中获取“重要的”内容，并舍弃那些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当然，每一个人都指责其他那些人，认为他们

尚未识别出“正确的”片段及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或者认为他们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而强调某些细节的重要性。

认为人们能够终结这场游戏是毫无希望的。即便是对葛兰西手稿最为仔细认真、精确完整的复现都将不能解决这一争端，或者说它仍然不能满足重构一个“真实的”葛兰西的强烈愿望。然而，只有通过接近并阅读札记的完整文本，才能够获得对强调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的全面评价。札记的不完整性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支配其创作的“文献学”方法造成的。“文献学”要求对细节给予仔细的关注，它试图去弄清具体事实的特殊性。构成笔记本内容的许多条札记都正是这么做的——它们记录了历史的无限变化和多样性。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细节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且它们反过来又形成了普遍的概念和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领导权”。但是，如果这些片段之间的关系被永久地固定下来，那么这些概念和理论就会有形成教条的危险。为了确定构成《狱中札记》的片段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放弃遵循居维叶原理的“文献学”。人们将不得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即建立一个能够在其整体之中进行思考研究的总体性结构，从而将每一个片段置于与其他片段的必要而且固定的关系之中。但是在札记中，历史是作为“经验”而不是作为沉思被呈现出来的；而且，“实践哲学奠基于其上的经验不能被图式化。”

在第一个笔记本开始的几页中，对居维叶的间接提及包含着一种含蓄的提醒和引导。它提醒人们，匆忙下结论是存在危险的，并且引导人们关注具体事实。葛兰西在无数的情况下，重复着这种提醒和引导——手稿中充满了诸如“这需要被检查”、“这需要进一步研究”、“人们需要弄清楚这个事实”等等这样的短语。笔记本八和笔记本十一开头的几个段落着力强调了札记的暂时性，以及其中表述的某些结论也许完全错误的可能性。1929年12月30日，也就是在写下了关于“居维叶的小骨头”这篇简短札记的几个月之后，葛兰西以如下的评论来结束致妻子朱丽娅·舒赫特的一封信：

“我的一些判断也许是，确切地说，很可能是夸大的，甚至是不公正的。对于居维叶来说，从一小块骨头中复原一只大地懒，或者乳齿象非常合适，但是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人们从老鼠的一条尾巴最终却造出了一条海蛇。”(LC, 314)

狱中札记指出,避免这一类错误的方法就是,要始终保持忠于批判的和文献学的方法。正如它们在札记中被运用的那样,这些方法同时作为抵御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神秘化的武器与盾牌而发挥作用。在札记中形成的理论和文献批评实践本身,构成了对详细阐释反教条主义的实践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贡献。✂

2016 年第3期
总第3期

